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牙利]安德拉什·赫格居什 阿格妮丝·赫勒 玛丽亚·马尔库什
米哈伊·瓦伊达 著 ● 衣俊卿 文长春 王静 译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ISBN 978-7-81129-836-9



定价：39.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 主编

社会主义的八坦上八 ——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牙利]安德拉什·赫格居什 阿格妮丝·赫勒 玛丽亚·马尔库什
米哈伊·瓦伊达 著 ● 衣俊卿 文长春 王静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 (匈) 赫格居什等著；衣俊卿，文长春，王静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11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836 - 9

I. ①社… II. ①赫… ②衣… ③文… ④王… III. ①社会主义 - 人道主义 - 文集②新马克思主义 - 学派 - 匈牙利 - 文集 IV. ①B82 - 061②D0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7014 号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Allison & Busby, Great Britain, 1976

Copyright© Andras Hegedu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is book's right of translation abou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deputized by 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Telephone: 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翻译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电话: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SHEHUI ZHUYI DE RENDAO ZHUYI——BUDAPEISI XUEPAI LUNWENJI

[匈牙利]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 著

衣俊卿 文长春 王 静 译

责任编辑 佟 馨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36 - 9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一、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1984年至1986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šić)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①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②,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

^①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②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以及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的。应当说,过去30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2010—2015年,“译丛”预计出版40种,“理论研究”丛书预计出版20种,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

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 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ć,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 1931—2010)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 1934—)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外,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ć, 1914—1991）、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 1930—1997）、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 1930— ）、达迪奇（Ljubomir Tadić, 1925—2013）、波什尼雅克（Branko Bošnjak, 1923—1996）、苏佩克（Rudi Supek, 1913—1993）、格尔里奇（Danko Grlić, 1923—1984）、苏特里奇（Vanja Sutlić, 1925—1989）、达米尼扬诺维奇（Milan Damnjanović, 1924—1994）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1936— ）、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1922—1999）、吉什（Janos Kis, 1943— ）、塞勒尼（Ivan Szelenyi, 1938— ）、康拉德（Georg Konrad, 1933— ）、作家哈尔兹提（Miklos Harszti, 1945— ）、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 1925—2003）等。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也考虑到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的限度，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

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1948年至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

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 1964—1974)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vska ljetnja Škola, 1963—1973)。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

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①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

^① 例如, Agnes Heller, *Lukács Revalu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3; 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J. Gru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Essays for György Marku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等。

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①、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

^①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

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

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①,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②。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II、III),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1988、1992年版。

②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①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

^①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①。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stička revolucija—Očemu je riječ? Kulturni radnik*, No. 1, 1987, p. 19.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①,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

^① 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4页。

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

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35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10篇——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①1970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②。1974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

①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② Adam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0, p. ix.

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①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1978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10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②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1988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5位东

^① Mihailo Marković,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vi.

^② Gerson S. Sher, ed., *Marxist Humanism and Praxi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①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②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③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④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

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

① Tom Bottomore, ed.,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8.

② 例如, John Burnheim,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1994; 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 A Moralistic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等等。

③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④ 其中,沙夫于2006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刚刚于2009年去世。

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①，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②，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③，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④，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20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

①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9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52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③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0~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④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

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比较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

“理论研究”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我始终相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 中译者序言

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视域中的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这部题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集是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体发展和自由共同体所写的几篇代表性研究成果,于 1976 年结集在伦敦出版英文版。如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早期作品一样,该文集的理论定位和价值取向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所不同的在于,这本文集没有停留于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规定性的一般理论阐述,也没有停留于关于社会变革的微观理论视域的一般性理论描述,而是从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几个主要侧面入手,揭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建构的具体途径和内在机制。因而,虽然这本文献由于距今已有约半个世纪,其中所讨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使用的一些具体材料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过时,但是,从研究方式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文献中具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这部文集所收录的十篇论文来自布达佩斯学派的四位成员,分别为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1922—

1999)、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1929—)、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1936—)和米哈伊·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①其中,赫勒、瓦伊达和玛丽亚·马尔库什^②都是卢卡奇的学生,也是布达佩斯学派最活跃的和核心的成员,而赫格居什既是一位著名理论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曾于1955—1956年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后来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定位,也由此成为布达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从这部文集作者们研究领域的定位也可以看出这本书在研究范式上的特点,其中赫勒与瓦伊达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而赫格居什和马尔库什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因而,他们从日常生活人道化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人道主义建构两个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微观理论视域和具体建构途径。

一、社会主义改革的微观视野

应当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之一就在于,其很多代表人物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马

^①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匈牙利,姓名的书写顺序与中国一样,应当是“姓”在前,“名”在后。按照这一习惯,在本书中,作者的译名应当是赫格居什·安德拉什、赫勒·阿格妮丝等等,包括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的姓名应当是卢卡奇·格奥尔格。但是由于布达佩斯学派的这些代表人物长期活跃在欧美学术界,其成果也以英语、德语等多种文字发表,因此,在我国的各种文献翻译中,也常常按照欧美的习惯来翻译匈牙利理论家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以及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的其他著作的翻译中,也就遵从这个习惯来翻译这些作者的名字。

^②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与乔治·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为夫妻,他们都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

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改革思想时,都自觉地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的开启。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深刻内涵的把握方面。

众所周知,革命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被简化为单纯政治意义上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观。这样单纯的宏观政治革命的理解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遭遇了各种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卢卡奇和葛兰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的革命观进行了创新。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传统革命观强调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内涵,而习惯于把意识和心理等层面的转变视作政治革命与经济变革的产物和伴随现象。而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则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成一种总体性的革命。他认为,从内涵上讲,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改变现存的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而且要从根本上扬弃物化,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它必然涉及人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从途径上讲,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经济变革来完成,在缺乏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的情况下,单纯客观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引发实质性的革命,因此,以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自我教育为内涵的意识革命就成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

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内涵的阐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特别是彼得洛维奇就自觉地推动马克思的革命观从以宏观革命为核心向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的转变。实践派哲学家认为,不应把马克思设想的革命归结为一般意义上的

政治革命,尤其不能将之等同于一般的暴力夺取政权。这是因为,政治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本身并不必定导致社会关系和人本身的根本变化,还不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不仅如此,如果不能及时地使革命深入下去,那么无论是这一政治革命本身,还是其结果(无产阶级政权),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走向反面,由手段变成目的本身,从而断送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变革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彻底的社会结构变革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不仅如此,这是一种作用十分有限的手段,不能期待凭借政治手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蕴含的一切。因而,必须揭示革命的丰富内涵,革命是实践的超越性的集中体现,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以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为核心,因而,彻底的革命表现为一种文化革命。对此,彼得洛维奇在《革命的思想》中做了一段十分精练和精彩的概括:“彻底变革现存社会,消灭一切剥削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对社会结构的改建。没有人的改变就不可能有社会结构的变革。变革社会和造就新型的人只有作为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才是可能的。因而,只把‘革命’术语用于这一统一进程的一个方面是不合理的。‘革命’是人和社会的彻底变革的标志。充分意义上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要扬弃自我异化,创造真正的人道的社会和属人的人。”^①

同实践派哲学家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布达佩斯学派也是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理论定位和价值导向,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影响下,他们也高度重视异化理论,积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布达佩

^① Gajo Petrović, *Mišljenje revolucije*, Zagreb: Naprijed, 1978, p. 64.

斯学派相对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们在与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道对当代人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的异化和物化现象的批判中,以及对现代理性文明危机的全方位批判中,特别注重在人的存在和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上推动人本身和社会的人道化变革。在这些文化批判中,包含着他们对马克思革命观的新阐释。与实践派哲学家一样,布达佩斯学派也反对把革命局限于宏观的政治革命,也关注革命的文化内涵。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推动传统的宏观革命观向微观革命观的转变。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布达佩斯学派所关注的人类需要革命、日常生活批判、个性伦理建构等方面。而在20世纪后期,布达佩斯学派越来越强调后现代的文化批判精神,显然也与这一微观革命的探索密切相关。

布达佩斯学派的这一理论定位与卢卡奇的直接引导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主义,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之前,就一直关注20世纪的文化危机。在早期的《小说理论》、《心灵与形式》等著作中,卢卡奇是从源自古希腊的古典人文主义关于完整的人的文化理想出发,对现代社会的普遍物化和异化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后来,在1963年发表的《审美特性》中,卢卡奇进一步拓展了早期的文化批判主题,致力于以艺术对象化和审美批判精神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消除拜物教。他把个体与类的统一理解为艺术的本质,理解为历史的真理。在这里,卢卡奇提出了现存世界中艺术和科学同日常生活的分离问题。他设想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改造而形成一个没有神话、没有宗教的自由世界,使艺术“重返故里”,不再是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自由王国,由此而使艺术所体现的个体与类的统一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卢卡奇的这一理论探讨对于赫勒等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理论定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赫勒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显然是继

承了卢卡奇的这些思想。

赫勒对于当代人的存在和现代社会的结构从多方面进行微观的文化批判,她系统阐发了马克思的激进需要理论。赫勒的需要理论的宗旨是剖析和批判人类需要结构中的异化,她认为,对于他人的需要不应当带有偏见或独断,除了一种需要,即把他人当作纯粹手段的需要外,所有人的所有需要均应得到承认与满足。赫勒说,“有一种需要对于全部需要满足构成了困境,如满足这种需要则要求人成为其他人的需要如剥削或压迫的纯粹工具”^①。除此以外,人的所有其他需要都应具有平等的地位。用赫勒的话来说,“除了那些其满足将使人变成其他人的纯粹的工具有的需要之外,所有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承认和满足”^②。与人类需要结构的人道化密切相关的是日常生活结构的人道化。对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无疑是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宗旨。在他们看来,要实现现存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需要两个层面的变革:在宏观层面上,需要推进激进民主制;而在微观层面上,则需要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同人类需要论是密切关联的两个领域。在她看来,要真正实现人类需要结构的转变,即实现基本需要的革命,仅有社会调控系统的改变,即社会决策领域的民主化尚不够,同时必须有微观层次上的改变,即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赫勒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日常生活批判的宗旨时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微观革命的理解:

日常生活如何能在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

^① 凯特琳·勒德雷尔:《人的需要》,邵晓光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② 凯特琳·勒德雷尔:《人的需要》,邵晓光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的方向上得以改变是本书的实际争端。本书提供的答案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织部分。^①

在被收入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部文集集中的两篇文章《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日常生活的革命》与《从人的需要的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中,赫勒同样阐述了激进需要和日常生活人道化的理论范式,以此为理论基础,她提出了在微观层面推进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的意义。赫勒是从对革命的基本理解入手展开自己关于微观社会历史范式的观点。她不是一般地解析革命的理论界定,而是结合人的实践的创造性的和超越性的本质,在具体的社会运动和人的实践活动中来解析革命的丰富内涵。赫勒把各种革命活动界定为具有不同内涵的改革和实践活动,具体说来,她认为有四种基本的变革活动:一是局部的改革(partial reform),也就是“把改变个别的领域、机构或者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任务的活动”;二是普遍的改革(general reform),这种改革“把通过局部的改革而实行对整个社会的改革作为自己的目标”;三是政治革命运动(politic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这些运动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激进变革,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赢得政权”;四是总体性革命实践(total revolutionary practice),它“包括生存方式的革命”。^②在赫勒看来,前三种实践活动,即局部的改革、普遍的改革和政治革命运动,还都是建立在从属于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结构之上的,也就是

^①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② See András Hegedű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p. 62-64.

马克思所描述的政治革命的范畴中。所以,赫勒特别重视总体性革命实践,在她看来,这种意义上的革命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体现为人的需要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普遍的人道化:

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马克思关于总体性社会革命的纲领,正是基于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必须开启新的路径。这一道路必须是生存方式意义上的总体革命,通过这一革命形成的新的生存样式和新的需要结构,要渗透到群众的生存之中,从日常生活到最复杂的人类活动。只有自觉地在共同体中组织他们自己的人民,才能使这一新的需要结构得以形成。^①

赫勒把这种意义上的总体性革命实践也理解为一种社会运行的微观机制,即日常生活的内在机制和图式的变革。她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狭义的日常生活占据社会生活的主要画面,在这种条件下,人被自在自发的活动图式所支配,是以特性为生存的核心,缺少个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人从那种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资本和市场的驱动机制虽然调动了人的主动性,但主要是最大限度激发了人的特性,而没有发展起人的自由自觉的个性。因此,赫勒认为,必须着眼于日常生活的革命,当然,我们倡导的并非是废除日常生活,而是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的和异化的特征,创造以个体自由和个性发展为核心的非异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赫勒在社会运动和日常生活之间辩证的交互作用机制中概括了以日常生活人道化为基本内涵的微观革命。她指出:

^①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 74.

我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转变过程是否能**自发地**满足那些使得这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使得积极的和非异化的人类关系规则成为可能。真正的自由社会所需的各种人能够完全通过政治和经济活动而被创造吗?如果我们**自觉的革命意图**能以日常生活的变革为方向,那么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异化的力量结构向地方的和社会层面的自我管理形式的转变就能够得以实现。这些因素是相互决定的。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革命性的重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统治关系的崩溃是不能设想的,反之亦然。^①

这样一来,赫勒就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宏观变革与人在日常生活和需要结构层面上的微观变革结合起来,她强调这种总体性革命实践的落脚点是个体自由和自由的共同体。赫勒指出:“我们本身可以按着对异化的积极扬弃的方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重建我们的社会;但是,只有当我们在给定的可能条件下能够扬弃主体方面的异化,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为变革机构,而且要为重塑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塑造那种可以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并且同时能够树立起典范的共同体。”^②

布达佩斯学派其他成员也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着眼点落脚于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以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自由共同体。玛丽亚·马尔库什与安德拉什·赫格居什在其所撰写的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

①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p. 7-8.

②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 51.

走势》和《共同体与个性》的文章中,把个体和共同体的辩证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题。他们一方面反对那种简单地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抽象化的做法,另一方面反对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简单视作对现实的辩护的做法,即那种认为“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统计学展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的简单化做法。他们认为,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积极的社会功能,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不否认理论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理论不是构建有关现实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是制定未来发展的可能路线。他们认为,这种倾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基础,其核心是关于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扎实的建构。“社会主义革命对私有制的废除,开启了一条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但是这只是为新型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条件以使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能够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分析以这种倾向来看指导着应对最新发展的设想的选择。它有利于社会实践并且使社会能够衡量其达成目标的程度,以及评估其必须设定的未来目标。”^①

这样,从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哲学理论视野,以及以个体和共同体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微观理论视野,从这种理论范式出发,他们在本文集中主要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两个大的方面,阐述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实践的理解。

^①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 133.

二、家庭关系与自由共同体

从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解出发,赫勒等人首先是在家庭关系的视域中,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探讨个体的平等、个性的生成和自由的共同体的建构。这里,他们主要探讨了未来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家庭类型、未来的两性关系和妇女的解放问题,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家庭关系层面的自由共同体的核心要素。

在《共产主义和家庭》一文中,赫勒与瓦伊达表达了试图把“人道化的”社会微观层面的变革的中心确立在家庭中的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建立全面的人类个体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达到这一理想的社会情境,即赫勒所称的“人道化”的社会的手段便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反复提及的主题:废除私有财产和摧毁集体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实现真正的自由社会,不能完全通过政治和经济革命,除此之外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革命。他们认为,日常生活变革的主要承载者之一便是:家庭。家庭是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是人们之间最理想的关系的集散地。

赫勒和瓦伊达考察了当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指出目前资产阶级家庭存在的危机和所面临的问题。随着性革命运动的发展,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了挑战,婚姻中男性权威减弱、性道德标准转变,传统大家庭消逝,当代资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功能在衰退。另外,从社会功能来说,资产阶级家庭也不能塑造出与“人道化”的社会相适应的个性类型。在塑造个性心理和道德性格中,资产阶级家庭有着不可克服的负面影响,例如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权威关系、日常生活中

共同体的缺乏,以及一直以来历史地与现代家庭绑定的某种习俗标准和某种价值取向。于是赫勒和瓦伊达把希望寄托在能够指向否定这些习俗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家庭的革命性变革的共同体(community)——公社(commune)。

赫勒和瓦伊达视域中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家庭类型的公社,它与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或其他相似种类的公社不同,它仅仅具有家庭功能,其目的在于创造适合人道化的社会的人,实现个性的转变。这是一个自由选择共同体,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个人个性的所有形式都被充分尊重,私有财产和集体权威将被消除。由于否定了男女互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意识,公社可以避免因一夫一妻制解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儿童的生活和成人的心理等问题。在公社的框架内,人们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从而增加了更多的个人时间去发展积极的和文化的素养,促进了个人的发展。除此之外,公社的最基本优势体现在儿童共同体中。儿童摆脱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权威因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形成了民主的心理性格,这将鼓舞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在这种意义上,未来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以自由自觉的个体的关系为核心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赫勒和瓦伊达强调:

公社是一个**自由选择的共同体**:成员们选择属于它,并且能被这个共同体其他的成员所接受。个体进入公社,而且进入公社的每一个家庭成人成员都作为一个个体而成为公社成员。^①

为了深入地研究微观领域的人道化进程,赫勒又在《两性关系的未来》一文中,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背景讨论了未来

^①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 20.

社会性和家庭关系的最佳可能性。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的？能否有人道化的可能性？赫勒从性行为、性道德以及未来两性关系的构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赫勒认为，在文明化之后道德伦理规则和性习俗在两性的交往关系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所有权为中心的异化的社会里，女人同土地、牲畜一样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两性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排他主义个性和与此对抗的道德原则在人道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两性关系的人道化中势均力敌。性道德规则通过内化等方式仅仅导致了个人的部分的人道化，它同时保持了排他主义的本能需求。赫勒认为，从理论上说，基于一种心理和自然本能需求的两性关系是两性间联系的不可避免的基础，它不可能被消除，只能被人道化。道德规范或者使得性本能需求人道化，或者压抑性本能需求。

赫勒从人类历史中找到了性本能需求被人道化的可能性。基督教道德一方面声称男女的平等以及道德规范的平等，另一方面却对性快乐等性行为极为鄙视，前者促进了两性交往的人道化进程，后者压抑了人的性本能需求。在这方面，资产阶级道德至少部分地代替了基督教道德，但对女人的不平等也成为了一个原则。于是，女权主义者开启了“性革命”运动，试图通过性革命手段来实现人道化社会的可能性。赫勒指出，在异化的社会条件下两性关系的人道化是能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个体的爱和规范，甚至在20世纪共同体纽带破碎和松动的世界里，最商业化的两性关系也表达了人类本质的一部分。

对于性道德而言，赫勒认为，在两性交往中所有违背性道德的态度和行为都违背和损害了类的普遍价值。因此，赫勒认为未来专门的性道德规范体系将消失，而且未来两性的

交往也将由人类其他领域的道德标准来进行评判。那时,男人和女人的不平等将结束,异化的两性关系也将结束,生活不再以财产为中心,占有欲将从两性关系中消失。人们按照人道化的道德标准去处理两性间的关系:平等、互助、自由选择并拒绝把他人当作手段。赫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人道化社会的未来景观:每个人根据人道化的标准使自己的本能需求人道化,两性间关系的深度和价值直接地依赖于人的深度和普遍价值,一种新的、真正和谐的人性感的共同体将被创造。赫勒的人道化景观第一次允许了人道化的男女关系的存在。

无论如何,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两性间的不平等问题,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追求妇女独立、追求两性间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追求妇女工作权利的女权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似乎处于停滞状态,对于此玛丽亚·马尔库什在《妇女和工作:走入死胡同的解放》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目前妇女解放运动的现状、困境及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玛丽亚·马尔库什认为,就工作而言,妇女运动进入了僵局。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在争取妇女政治和法律的平等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妇女工作人数增多、在经济和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升高等等,但这仅仅体现了数量的变化,为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强度却大大缩减,妇女依然保持着一直以来的工具性的地位。

有关女性劳动力职业和雇佣结构的数据显示,工作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明显不同,妇女普遍从事较低身份和声望的工作领域与职业,同时,女性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男性,甚至经常同工不同酬。人们认为妇女不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劳动力阶层,因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使她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实

现好其他的社会角色,妇女的“第二个班”就是事实和问题所在。日常生活的一些数据和事实证明:无论是否结婚、工作,妇女与男性相比都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家庭琐事上。

那么如何调和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呢?玛丽亚·马尔库什考察了北美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种趋向。北美模式是妇女可以做全职妈妈,等到孩子长大再重新工作;社会主义模式是大多数的工作女性在生养孩子期间得到单位或国家的迁就和照顾。二者各有优缺点:北美模式给孩子的早期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减轻了妇女的双重负担,但长时间的停职取消了女性与男性价值均等的机会。社会主义模式虽然使得有偿工作成为女性生活的一个永久特征,但是长久的工作和大量的家庭负担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任何一种模式都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除了上述的主观因素,妇女解放运动停滞不前也受着传统态度的强烈影响。传统文化中妇女的生养孩子和保持家庭内部和谐的传统观点,仍然支配着公众的观念。因此,玛丽亚·马尔库什认为,社会应在财政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等方面,创造普遍的条件以使得更多的妇女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的妇女解放还要走很远,只有解放全人类,妇女才能解放自身,只有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机会选择最适合他或她的个性、兴趣和能力的职业环境的存在,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三、社会生活与自由共同体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赫勒对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比劳动过程的人道化更为重视,在她看来,劳动过程的人道化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劳动过程的人道化不能顶替或者等同于

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只有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和需要结构的变革,才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扬弃异化。赫勒由此指出:“我相信,那种认为只有首先是劳动过程人道化才能创造人道化的生活共同体的想法是乌托邦。在今天的工业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在那些其工业化水平更低的国家里,绝大多数职业都是在贬损人的条件下从事的,而且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在特定的条件下,劳动过程的人道化当然是计划方案的一部分;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寻求最优化的努力必然把劳动过程的人道化作为一个目标,但是不会幻想把这一点作为整体生存人道化的尺度。这种幻想很容易把运动导向巧妙的操控的工具。生存的人道化的核心计划方案位于劳动领域之中,但是外在于劳动过程:在于真正的(而不是被操控的)‘参与’,在于工作场所的责任性和民主。”^①

在这一点上,玛丽亚·马尔库什与赫格居什同赫勒的观点有些差别。应当再一次强调,在总体上,布达佩斯学派对于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和劳动过程的人道化都是十分重视的,把二者都作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建构的重要内涵,但是,相比之下,赫勒更加重视前者的基础地位,玛丽亚·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更加重视后者的地位。例如,这种细微的分歧,也体现在他们关于家庭与共同体(或称之为公社)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赫勒和瓦伊达试图产生一种新的家庭类型——共产主义公社不同,玛丽亚·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在《共同体与个性》一文中考察了劳动世界中不同群体的共同体功能,以寻找一种合适的共同体结构来发展类价值和个性。在他们看来,建立在家庭和邻里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共同

^①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p. 54-55.

体在现代人类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而劳动场所的组织机构却提供了共同体成长的主要环境,大量的调查数据显示,工作的性质和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生活的方式和志向。

玛丽亚·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分析了五种具有共同体功能的群体:一是能够促进成员超越特性、实现个性成长的人道化共同体,这导致了人的类存在的实现。二是使个体完全服从于社会、服务于进步目标的集体化共同体,它们不能促进个性的发展。三是非人化的共同体,它们把成员固定在共同体中,并使成员和共同体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共同体的目标与人类的类存在的进步相反,产生了扭曲的个体。四是准共同体,它们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表现出服务于成员的特性。五是补偿性的共同体,它们在某些边缘领域提供一些公社的经验,并常常联系着一种业余爱好。^①

玛丽亚·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对工作场所的集体化共同体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种共同体中,集体化原则作为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占据统治地位,从而不利于促进个人个性的发展。这种共同体在国家建设初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旦国家进入稳定期,这种集体化共同体的功能便被“准共同体”的等级和官僚机构所代替。那么,在工作的王国中能否产生这种人道化共同体的运动呢?为此,他们研究并考察了德国的国营农场和其他现代工业企业劳动管理类型,尽管它们为人道化的社会的建立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是它们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真正的人道化的运动,甚至被认为是最好的团队也经常隐藏着准共同体的特征。可以说,具有官方结

^① See András Hegedüs, Agnes Heller, Maria Markus and Mihaly Vajd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 92.

构的事实严重地阻碍了团队的联合体和公社的特性。

玛丽亚·马尔库什和赫格居什通过对工作场所的人道化共同体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人道化共同体必须与真正的社会控制运动紧密相连,所有有利于集体化的进程都不能脱离社会本身,它们是社会改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道化的公社的功能不能仅限于生产活动,而应以一种或其他形式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的目标不是建立某种新的状态,而是建立一个动态的社会控制的过程,并产生一系列社会条件,从而使人们持续地参与社会事务,决定自己的命运。

与此有关,玛丽亚·马尔库什与安德拉什·赫格居什在《自由时间与劳动分工》一文中,还结合劳动分工探讨了涉及人道主义核心的自由问题。他们认为,自由时间的世界与劳动的世界是密切相关的,仅在一个领域而不触及另外一个领域就做出意义深远的变革是不可能的。经验表明,将“自由王国”的达成完全限制在劳动工作之外的时间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通常,在现代社会,在自由时间里进行的活动,并没有增加人的自由,也没有改变人们的既定生活方式,而是被用作赚钱,这是既受到劳动分工也受到现有工作机构的负面影响所致。

劳动分工将人束缚在特定的职业或专业上,从而限制了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自由时间与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不断增加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需要以及其数量和用以满足之手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生产领域并没有将个人的天赋与才能考虑在内,这些因素促使人们通过牺牲自由时间去达到目标。这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恶性循环。当劳动力的官方价格与自由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异时,消极怠工出现了。经验证明,如果官方工作时间的减少不紧跟着一个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的话,如果自由时间不能有利于

自由发展的话,那么它就只是提供了一个自由增加的错觉。自由时间变成了一种商品,自我实现纯粹与自由时间的增长和重组相关的期待变成了幻想。社会学研究表明,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决定了人的一生,包括他度过自由时间的方式。当前的劳动分工形式,已经愈来愈构成了人们实现自主性的严重障碍。

玛丽亚·马尔库什与赫格居什认为,为了摆脱劳动分工纽带的强烈束缚,必须进行技术培训。结合匈牙利当时的情况,他们认为,只有适合技工培训的学校是不够的,需要引入一种所谓“提高水平”的教育。尽管满足工作要求的所需知识可以在一个比较短时间内学到,然而教育并不足够有效,因为它无法遵循实践。在培训熟练工人上,应从获得特定技能转向更一般的技术知识,从而给予技术工人一个比受限的专业化更广泛的基础。为了避免将个人的一生附着在劳动分工上,允许他不断地发展与创造,激励他自由地择业,一般的学校培训系统与工作领域之间的机械关系必须打破,发展一种既能组织生产又能组织学校培训的联合系统是可能并且必要的。必须明确的是,提供一般教育的学校系统首要任务就是教育人们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不得不适合劳动分工的工人。换言之,它的任务是使人们做好准备以便能控制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及不断地塑造他们自己的命运。

应当说,玛丽亚·马尔库什与赫格居什关于自由时间和劳动分工问题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劳动过程的人道化和工作场所的民主机制的建立,这将成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扎实基础。他们主张在实现一个真正的开放的社会时,实行过度训练,可以在现存的劳动分工基础上激励人们更加独立地择业与就业,能够更好地自我实现与更明智地利用其自由时

间。我们主张,构建一个现代化形式的劳动组织,提供给个体工人以更大的自治,责任与决策能力,使工人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一个崭新的工人阶层将会成长起来,从而实现对于行政机构的真正的社会控制。

玛丽亚·马尔库什与赫格居什还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的分配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来探索社会运行层面上劳动者的个性的普遍培育。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其目的在于创建一种社会主义新的生活方式。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新文明,必须制定符合社会主义特色的分配与消费模式。这成为玛丽亚·马尔库什与赫格居什的《价值在分配与消费的长期规划中的作用》一文的主题。文章强调价值的作用与地位,指出要关注长期规划制定的方法论问题。唯意志论与“科学主义”作为最为常见的方法论,却对长期规划构成了威胁。前者无视真实情境,为一种不考虑现实的计划制订敞开了大门;后者仅仅依赖经验数据,从而失去了自觉的价值选择,所以它会使规划变得贫乏枯竭。

为了准确地预测未来,外推法(extrapolation)和插值法(interpolation)被广为采用。前者利用其过去的经验勾画未来,后者依据发达国家的趋势规划前景。无论是外推法还是插值法,以及依赖于它们的预测科学,毋庸讳言都必须服从于既定的价值体系的批判反思。外推的活动进程并不是被某种一般规律所预先决定的,而是自觉的价值选择的结果。如果机械运用它必然会造成失误。插值法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预测方法不但要回答“如果……会发生什么?”的问题,而且要回答“应该发生什么?”的问题,后者涉及到价值观。发展一种社会主义的文明模式,不单意指经济效益上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意指建立一个新的,更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长

期规划目标应该在于经济优化的目标和社会生活人道主义的目标之间的平衡。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优化以及人道主义目标则被推到背景之中了。战后重建期结束后,人道主义的任务和目标却被看作附属于经济效益,被机械地等同于生活水准的提升。

其次,规划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与差异的分化问题。分配差异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日趋严重,引起社会不公的社会问题。必要的社会差异必须被严格地置于控制之下,以确保它们不被代际继承。

再次,玛丽亚·马尔库什与赫格居什认为,为了有效地制定分配与消费规划,必须区分两类私人的消费,即基本的和差异化的消费。“基本消费”,是为每个人提供的最低保障,这必须是一种社会目标。“差异化消费”,是比基本需求方式或水平更进一步的消费。两种类型的消费都是动态的,基本决定于既定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价值体系,正是在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能够区分它们。社会主义社会既要保障年轻人的基本需求,又要创建满足差异化消费的机会均等条件。在匈牙利,为了确保起点平等,基本消费包括健康生活方式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能仅仅使用货币的分配方式,而要创建与扩大福利形式。满足基本需求的无论是教育还是住房都应该免费分配。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未来激励人们工作的首要动力就不再是满足基本需求的必要性,而是快速增长的差异化需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需要表现为以个人主义和商品为中心,这是对过度集体主义的一种反应。需求不但受制于技术和经济因素,而且受制于社会的传统、习惯、规范、价值系统的影响,但这都是间接的影响。而国家则可以通过意识和价值体系的自觉形成发挥直接影响。只有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才

能改变人们的消费与需求模式。如果建立一种可以允许工人有真正发言权,对生产和分配拥有决定权的社会机制,那么这会彻底地提升一般文化水平与改变消费方式。因此,长期规划的制定应该有益于新的生活方式达成。

基于上述分析,赫格居什从整体上反思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的机制建设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建设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繁重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必须促使社会主义形成积极的自我批判精神,不断改革和完善自己的发展机制。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赫格居什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欧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都需要社会主义本身展开内部分析和自我批判,这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所在。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评:现实性与必要性》一文中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评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首先,欧洲社会主义变化的本质就在于社会的内在批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这均源于欧洲社会主义内部分析。社会主义的诞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否定的结果,它坚信能够比资本主义创造更好和更多的人类条件的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建立起来。1917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俄罗斯的胜利,同样是对坚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发生在最发达的国家并且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信仰的超越。当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达到以后,对于新社会的真正分析即自我批评开始变得不可能了。社会主义的概念随之变为本质上僵化的,无可争辩的信念,例如苏联模式就被奉为“理想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说,这是符合当时的政权巩固的历史情况,但所有其他的有关新制度的优化

和人道化问题就被忽视了。

其次,赫格居什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的幻想,即大胆的预想的作用。即使对于未来的预测更加准确,也无法替代幻想的作用。正是由于人们对于“新秩序”的幻想,才促使人们为之奋斗。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奋斗过程中,这些概念可能会僵化为纯粹的教条,会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若没有关于构建更好、更优、更人道化的秩序的幻想,那么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产生。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幻想的进步作用,尤其是那些支撑着为胜利和新秩序的巩固而必须做出超乎常人的自我牺牲,而果实往往只能由后来者品尝的自我牺牲的幻想。随着现存社会主义的新秩序的巩固,幻想开始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角色。这些幻想不再与未来相连,不再涉及参与其中者正在寻求达到的秩序,而是履行一个根本不同的功能,就是为僵化的制度形式做辩护,旧有的幻想的进步作用转换为对进步的阻碍。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以后,幻想应当集中于对现存的改革,当掌权或弃权之间的选择开始让位给那种新系统的优化与人道化问题时,一个真正的和必要的任务被提到历史的议程上。

再次,赫格居什认为,社会科学需要在实证分析抑或反思批判的两难困境中进行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科学研究的功能无外乎一种政治实践的宣传,是一种“合法”的形式。诚然,在苏联的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作用。但是,这个社会角色同时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这种情形阻碍了意识形态和科学发展之间的交锋,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交锋。而社会学的发展证明,它一方面是自我批评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代表社会的最直接的科学仪器获取其自身知识和

使社会条件进行实时分析的社会科学的分支。因此它既是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发展进一步前进的工具。然而,目前社会学的工作却不得不在提供信息和数据以维护既定的形式,抑或通过批判地分析它们以克服这些形式之间进退维谷,无法同时承担两种功能。欧洲社会主义的自我剖析程度已经成熟为历史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有必要增强自觉的反思批判能力。

因此,在赫格居什看来,我们需要审视社会主义“自我分析”的成果和考验。就社会主义而言的分析或“自我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局部分析和部分建议的水平上,而应刺激到更深远的、更全面的概念,才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内部分析和自我反思,需要更进一步涉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广泛的领域,进行更加全面的社会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等。这种积极的内部分析、自我批判和改革探索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总之,如前所述,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这本文集所探讨的内容和所主张的具体观点,有不少已经显得过时,还有一些分析,例如,关于未来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探讨等,则带有一定的不切实际的特点,此外,也有一些观点,如坚持计划经济,忽视市场机制等,在我们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影响这本书的价值,无论是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关于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探讨,还是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微观建设思路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在今天读起来都依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部文集无论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 20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还是对于我们反思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集的第一、二、五、六篇由王静翻译;第七、八、九、十篇由文长春翻译;第三、四篇和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由衣俊卿翻译。此外,衣俊卿还对全部译稿做了审阅和统校。由于该文集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语言表述各有差异,所论述的主题既包括抽象的理论问题,又涉及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肯定存在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和翻译错误,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衣俊卿 文长春 王静

2014年10月1日

目 录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1
中译者序言 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视域中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1
一、共产主义和家庭 ... 阿格妮丝·赫勒、米哈伊·瓦伊达	/1
二、两性关系的未来	阿格妮丝·赫勒/21
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日常生活的革命	
.....	阿格妮丝·赫勒/36
四、从人的需要的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	
.....	阿格妮丝·赫勒/53
五、妇女和工作：走入死胡同的解放	
.....	玛丽亚·马尔库什/72
六、共同体与个性	
.....	玛丽亚·马尔库什、安德拉什·赫格居什/87
七、自由时间与劳动分工	
.....	玛丽亚·马尔库什、安德拉什·赫格居什/102

八、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走势	
..... 玛丽亚·马尔库什、安德拉什·赫格居什/120	
九、价值在分配与消费的长期规划中的作用	
..... 玛丽亚·马尔库什、安德拉什·赫格居什/135	
十、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评:现实性与必要性	
.....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156	
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171
英文版编辑说明	/177

一、共产主义和家庭

7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米哈伊·瓦伊达(Mihaly Vajda)

与乌托邦不同,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特征,因为从他的观点来看,正是人们自己,通过人类活动和社会斗争来塑造人类关系;预先把未来社会的具体结构固定下来将意味着理想不得不遭遇现实。然而,对共产主义社会详细特征的省略不应当使我们认为,马克思根本不去设想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的实现,共产主义甚至无法构想。这些价值拒绝异化的人和异化的社会关系,但是它们并不是纯粹的否定。马克思是在积极的价值假设上建立了他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否定:主要目标不仅仅是用新的社会形式取代现存的社会形式,而是要建立更加全面的人类个体关系和社会关系。废除私有财产和摧毁异化的集体权威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反复提及的主题,是这些积极的价值设想的一种功能。废除私有制和摧毁异化的集体权威本身都不是目标,但是二者都是产生“人道化的”社会的手段和过程,因为私有财产和国家的灭亡是消除下列问题的基本前提,(1)消除把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的拜物教,(2)消除人对他人的依附(劳动的社会分工),(3)消除人把他人仅

仅作为手段的关系。既然社会规则的某种形式必须总是存在,那么这个目标就只能通过详细说明各种新的人类关系才能实现,很明显,这要以生产力的相对较高水平的发展为前提条件。

- 8 我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转变过程是否能自发地满足那些使得这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使得积极的和非异化的人类关系规则成为可能。真正的自由社会所需的各种人能够完全通过政治和经济活动而被创造吗?如果我们自觉的革命意图能以日常生活的变革为方向,那么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异化的力量结构向地方的和社会层面的自我管理形式的转变就能够得以实现。这些因素是相互决定的。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革命性的重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统治关系的崩溃是不能设想的,反之亦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这个问题,其间他指出,私有财产的废除和国家的消亡必须同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解体同时进行。他争辩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还会是婚姻关系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又说因为新形式仍然需要被详细阐明,所以不能提前确定地谈及这种发展。

为什么我们认为家庭是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呢?很清楚,人类的再生产并不仅仅在家庭中进行,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量的活动并没有在那里发生,也没有与它相联系。然而正是家庭孕育了新的一代,并且教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活动;事实上,这种日常生活活动的转变是家庭中教育的最重要的一面。另外,家庭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活动的“运行基础”(base of operations):我们“离开”它,我们“返回”到这里,并且那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的家。最后但绝非不重要,家庭是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最

理想的关系的来源和目的地。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写到的：

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①

9

一直以来有一种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建立由国家或整个社会组织的托儿所，并把它们作为教育新生代的基本单位，从而有可能把抚养新一代的任务从男女这种永久的亲密关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这种想法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而且表明人类生活至少在一个绝对重要的方面是贫困的。首先，这种想法是与共产主义设想相对立的：因为它或许意味着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核心关系，作为人类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将可能消亡。而且，这种设想引入了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出现了正在分离出来的教育者阶层。然而，在反对这种观点和反对相反的即儿童必须一直要在一夫一妻制的资产阶级家庭内部抚养的观点之间，有某种联系。

（一）资产阶级家庭

这里我们不需要考察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因为我们正在讨论共产主义社会，并且从这种视角分析资产阶级家庭的功能和它的当代危机就足够了。资产阶级家庭最初被整合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185页。——译者注

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整体结构中。尽管像 C. 怀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① 所说, 小资产阶级家庭 (petty bourgeois family) 虽然不仅对整个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在减弱, 而且在数量上也日趋减少, 但是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 是主要的家庭类型之一。上层资产阶级家庭 (haute bourgeois family) 是另外一种主要的家庭类型: 它在生产组织之外, 尽管它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保障资本主义财产的平稳运行: 这项任务通过教育一代或更多代的子女去掌管工厂或商业而实现。这两种主要的家庭类型的基础都是通过继承的形式转让私有财产。

这两种资产阶级家庭类型的原初结构正在演变之中。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 大多数资产阶级家庭不再围绕生产而是围绕消费组建起来, 因此, 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的经济功能也在削弱。经常被冠以“家庭的解体”和“家庭变迁的危机”的那些资产阶级家庭的特征或许与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相联系。

这些特征如下: (1) 一夫一妻制在这个术语的严格的意义上消失。离婚在法律上已经被普遍接受, 或者至少在事实上被人们普遍接受, 尽管注意力一直被集中在它的社会的否定性影响; 这一特征在瑞典和丹麦找到了最具标志性的表达, 在那里已经有人提出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应该在法律上被废除。(2) 婚姻中男性的权威在法律上几乎彻底消除, 并且事实上在逐渐减弱; 这与“妇女的解放”、妇女可得到的工作的逐渐增多、妇女政治平等所获得的成就等等相联系。(3) 与性相连的道德标准的转变, 这提升了妇女的状况并与离婚率的增高有关。(4) 大家庭实质上的消失, 缩小为“核

^① C. 怀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1916—1962), 美国社会学家, 著有《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译者注

心”家庭。

从自由选择人类联合体的基本价值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积极的,即使它导致了一些社会不能解决的冲突,甚至当社会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试图去消除那些冲突时也无法解决。如果社会运转很好,财政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这个问题不像由于离婚而产生的许多儿童生活的问题那么严重。资产阶级家庭演变带来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孤独感的存在:核心家庭减弱了紧密的、多面的关系的能力——在大家庭的人类联合体的社会里,这几乎是专门的、唯一的¹¹功能。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老人依靠自己生活。如果老人与核心家庭生活在一起,在很多方面,他们或者扮演了一种仆人的身份,或者是核心家庭的负担,而且如果他们不与核心家庭共同生活,他们就会处在完全的孤独中。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离婚的家庭中,尤其是那些抚养孩子的妇女——这一工作显然使她们很难进入新的社会关系。

性革命既作为一种口号,又作为一种运动,表达和激励着婚姻的解体过程,即便它的主要目标是形成自由的人类关系。对于这个目标,性革命谋求资产阶级家庭的全部解体。当然,就所有的人类关系而言,性关系的自由选择 and 保持选择性关系的自由是个性发展和普遍化的基本前提。但是,性革命把建立人类联合体的计划限定到性伙伴的自由选择上:它没有分析性和其他种类的情感联合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性革命没有对如何形成新社会的基本单位的问题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而只是单方面地对性关系做了限制性的分析。因为它起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上可知道的各种性关系都不是自由的,所以它认为随便的性关系会更好,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最持久的、亲密的、多边的人类关系,比如爱和友谊,起源于夫妻生活中。在性革

命的口号背后潜藏着一种设想,认为性和家庭的最紧密的联系纽带一直产生对“正常”的性关系的抑制,而且人们必须把性从对其他社会关系的隶属中解放出来。当然,与基督教传统相比,这是一种革命,因为在基督教传统中性仅被限于生育。对性和家庭紧密联系的回答必须一起来考察,但是在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家庭中考察它们,将会是一种退步。

- 12 除了经济功能,资产阶级家庭基本的社会功能就是塑造一种保证资产阶级社会没有冲突地运转的个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设想,在个性结构和社会关系整体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并自然地认为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变革将创造一种适应新社会的人。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并没有对塑造与社会条件相一致的个性类型的专门结构做研究,结果它忽略了没有在生产组织中发挥基本作用的家庭这一组织类型,只是把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一个环节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家庭基本功能的考察一直受到法西斯主义做法的很大促动:它们已经揭露,除了家庭正在改变的经济功能外,家庭的基本作用就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其功能,塑造需要的典型的个性类型。正是家庭创造了人的个性的方方面面,使人们适应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状况和政治条件,并且使这些条件作为一种“自然的”条件而显现。对于这种定位,最初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调查是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①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这种观点坚持了赖希的理论,尽管我们在某一点上不同意它。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在家庭中塑造合适的个性类型并不必然需要由自然主义的弗洛伊德的原则来解

^①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美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著有《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性革命》等作品。——译者注

释；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性压抑能够参与到资产阶级个性类型的塑造中来，人们不需要为了解释正常的（被理解为典型的）个性的“生产”而歪曲性问题和性压抑。

首先，我们想在细节上考察以前所说的观点，即家庭是资本主义个性的首要的生产单位，其次，我们想对这一过程的相关因素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人的基本个性在婴儿早期就作为先天固有特点的结果被塑造和固定下来。我们把这种个性称作“心理性格”。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的或明确的信念之一是，人的整个个性在一生的时间里要经历持久的和根本的变化，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感觉论（*sensualism*）的继承。能变化和经常变化的是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但是，即使道德品格也不能独立于心理性格而发生变化（例如，一种消极的心理性格排除了任何基本的道德净化的可能性）。因此，心理性格主要是在家庭中塑造的，这也把基本的道德优先权传递给了孩子。然而，这些道德优先权后来是可以通过选择改变的——不像心理性格不能被改变。资产阶级家庭必须保证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心理性格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要求。很自然地，这种要求不能被有意识地实现：而事实上，这项任务经常是能被实现的，即使有些家庭的显著的思想意识是公然反资产阶级的。道德品格的构成并没有与资产阶级社会结成一体，因此，这些要求很难对心理性格奏效，除非有较高的智能水平，否则这是不可能的。

父母构成了幼儿成长的基本环境，托儿所和育儿中心的教育总是再次转回到家庭。孩子爱他的父母超过其他任何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父母“必须”被爱和被尊敬——社会期望这样。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他最深的情感联系仍然是他的父母，而且他必须在他们中寻求其道德理想：幼儿机构

和后来的学校提供了其他的道德理想,但从来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连,也从来没有指导儿童的行动(事实上这些理想不代表对儿童的关系)。如果我们暂时设想有一些例外的例子,父母做出了积极的道德榜样,但是仍然会出现父母的道德和心理性格都不与儿童的特殊禀赋相一致的状况。这种对儿童选择的限制或许会导致儿童时代早期的性格扭曲(例如,就像最终变为失败者的伟大人物的孩子那样)。如果子女把他父母的心理和道德性格作为他的理想类型,而不考虑他自己的特殊的天资,那就会引起不正常的内部焦虑,甚至导致意志的薄弱。然而,如果他选择背叛,那么他的反叛就会采取一种非理性的形式:他会让父母对所有不利于他的事情负责,即使有些事情不是由父母引起的,而且有时他们只是不太融洽。在一些情况下,父母的一方或双方具有人们普遍认同的消极的道德性格,但是社会要求子女应该全身心地爱这些父母(尽管存在一些例外的案例,牵涉到公然残忍和犯罪的父母,在那种情况下社会是不要求子女全心全意爱父母的),我们仅仅需要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孩子是完全无家可归的:他不属于任何地方。

资产阶级家庭是独裁者,它不是一个共同体。甚至在今天,在相当多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由于传统和男性的社会地位使得男人成为权威,他可以用各种手段自由地行使这种权威。有一些家庭,妇女因为其自身在社会的地位或强烈的个性而具有这种权威,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家庭是独裁者。结果,现代家庭并不适合教育儿童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和行为。即使父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他们的这种完全和谐化的生活也不能成为社会行为的楷模,因为他们的统一是个例外,并且在较大的社会单位背景中,原则上是不可能的:甚至父母之间最和谐的关系也不能培养适合民主

的社会行为的儿童。并且,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这种功能才能在儿童自己的各种关系中实现。儿童总是和父母关联在一起,而且儿童的冲突也经常靠父母的权威或父母的直接介入而被解决:因此,我们甚至不能谈及相对独立的儿童的共同体。有一小部分儿童,对他们来说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些例外的情形中,在有很多孩子的家庭中,孩子们不处于同一个年龄,年龄的差异造成了一种“自然的等级”。这是因为年长的儿童经常成为父母的代表,并且儿童的独裁的社会行为也由这种结构产生。甚至在一些因为父母能够自食其力,所以思想意识具有反权威特征的家庭里,如果儿童的服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基本价值的话:“好孩子”是对“服从的孩子”的委婉的表述,那么发生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不管孩子是否承认父母是正确的,他都必须为他的错误行为祈求原谅,因为从他的观点看,奖赏和惩罚(无论它们是否公平)都来自于权力的地位。在家庭中属于劳动分工的任务也以一种权威的方式“自然地”被分配。¹⁵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家庭中成为一种渴望拥有的东西。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财产共同体的基础上的,无论如何它也是一个生产单位,或者它拥有能够带来收入的私有财产。家庭的权威结构意味着,对财产的使用要依靠家庭权威的决定;这或许导致我们产生有关家庭内部财产使用的斗争,同时为了捍卫家庭的物质利益而反对所有其他家庭和群体。为了物质产品的内部斗争不一定必然发生;这里观念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它要求相当高度发达的智力水平。同时,除了思想上的优先权之外,在以家庭结构为基础的社会里,想要避免为捍卫家庭财产而反对他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例如,在一个原则上拒绝私有财产的家庭里,也不可能

同意孩子失去所有的玩具和衣服：在某种观点上，它将必然产生“这属于你”的争论。因此，现代家庭再生产出财产的意识与自然共同体的重要的“为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

最初，无产阶级家庭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家庭。在马克思的年代也不是，那时，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阻止它去发展“正常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前提。在那个年代，无产阶级家庭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成人和儿童同样要工作并以他们的收入为生，对于一个家庭供养者来说，他的工作，使得他¹⁶没有任何机会自动地成为家庭的权威。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到14个小时之久，他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去发展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真正的纽带，子女是在大街上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逐步提高使得家庭结构资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同时刺激了主要的家庭类型，即一夫一妻制资产阶级家庭的发展。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①赞同这种观点（每个人必须作为“资产者”而被培育），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一过程和工人运动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以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们，为了保证更高的生活标准，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社会，而只是尽力地去改革它。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时期，在小资产阶级家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只能是一个反叛者：这种类型的人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而且如果没有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法西斯主义永远都不会成功。

当然，在塑造心理性格和道德品格中，资产阶级家庭的负面作用看起来并不完全依赖家庭结构。这种限定尤其适用于“所有权取向”（proprietary orientation）和“为我们意识”

^①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著有《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译者注

的特性。然而,首先,不能克服的因素在固定的家庭结构中明显存在着,例如在子女和父母之间基本的权威关系或日常生活中共同体的缺乏。其次,也是关键的一点是,某种习俗标准和价值取向一直历史性地与现代家庭以这样一种方式相连,以至于看起来按照现在的情况,把它们从家庭中排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以这些习俗标准和价值的否定为直接指向的家庭的革命性变革看起来提供了更多的希望。

(二) 革命、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把整个社会进程和心理性格的塑造看成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有一种信念认为,前者的改革机械地导致后者的转变。起初,布尔什维克持相反的观点:在紧接着十月革命后的日子里,似乎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体生活的基本形式所发生的基本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主要是因为共产主义力量的产生和统治阶级的消除并没有自动地导致这些变化。有关家庭的法律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并且主要尝试彻底地改变日常生活。国家启动了一些试验的公社,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①的小说《赤恋》里描写的相似;这一时期对这一现象最乐观的描述就是马卡连柯(Anton Semiohovich Makarenko)^②的《生活之路》,作品优美地描写了公社生活与精神构成的关系。人们经常提到,这个试验成功的一部分原因是马卡连柯公社里的儿童最初不是在资产阶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然而,在20世纪30

^①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 1872—1952),俄国女革命家,主张对俄国传统的社会习俗和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著有小说以“恋爱之路”为题名的三部曲《赤恋》、《三代的恋爱》、《姊妹》。——译者注

^② 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Anton Semiohovich Makarenko, 1888—1939),苏联教育家、作家,著有《生活之路——教育叙事诗》等。——译者注

年代开始流行,并且恢复了第二国际许多理论观点的意识形态,重新引入了社会的民主的家庭观念。这种理论有意地采取措施去重建和加强资产阶级家庭,尽管他们或许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这强化了这个体系的权威的特征。当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时候,家庭的变革肯定不在议事日程之中,而且他们关心的只是与整体的社会紧密相连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那些方面:本质上仍然没有触及家庭的理想类型。新社会所必须形成的新人的塑造,作为教育内容(社会主义原则和集体生活规范的归纳、启蒙的世界观、道德影响等)的一个问题完全地按照启蒙的模式来进行。

然而,另一种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已经得到发
18 展,而且目前在西欧左派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这种想法,新人的塑造不只是“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这个目标也不只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机械的后果;更进一步说,它着眼于与社会生产单位的民主的转变相关的新的心理性格的发展。这些观点被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最详细的方式加以阐明,但是他的观点并不独立于十月革命后那段时间的社会经验。当然,生产场所结构的民主变革也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有如下几个原因。(1)一个社会越发展,个人进入生产的阶段就越晚,因此年轻人就越是会带着一种稳定的心理性格和道德品格开始他们的生活。(2)一个社会越发展,它花费在生产上的时间就越少;事实上,工作时间的缩减只是其中的一个目标,因为想单独在生产中(或者单纯在生产的组织中)构成多方面的关系是不可想象的。(3)即使职业和技能可以被自由选择,从个人的视角决定生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规范对于进入生产中的个人来说已经成为自

然,那么在生产基点上的民主只能是摆脱操控。在资产阶级社会,普通人接受权威的指向;他不寻求去解决跟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一般说来,他都可以被操控。很明显,纯粹的政治民主对于塑造人们新的心理性格毫无用处:即使在有直接民主的地方,后者的基本单位也不等同于社会生活的中心点。这在现代社会与像斯巴达那样的古代城邦共和国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激进的家庭变革才能解决。新家庭必须面对的标准是:(1)公社必须是民主地构成的,在那里能尽早地学会民主的倾向;(2)必须保证多元的人类关系,包括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3)必须保证个性的发展和实现,对于此,最基本的条件是甚至在儿童中间都必须保证人类联合体的自由和重新选择;(4)必须排除因一夫一妻制和一夫一妻制解体而产生的冲突。这是一种能够在新型家庭中找到的解决办法,我们称之为“公社”。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这种能够实现与它的价值设想相符合的社会条件的能力,依赖于现存社会已经存在的趋势。只有当背景不是一些想象的“理想的”社会,而是指向对现存的社会需要,甚至那些眼下还没有大规模地存在的需要的满足时,何种家庭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提出。我们已经指出,资产阶级家庭不能满足那些正在成为普遍的需要;而且指向家庭变革的某种积极的需要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和数量不断增多的公社试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积极的需要。如果这种新的需要仅仅把自己定位在脱离日常物质问题的圈子中,那么这肯定并不表明这种需要其他地方不存在,或者说一场指向需要发展的社会运动不能把它们公布于世。

(三) 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家庭类型的公社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将勾勒出对共产主义社会家庭结构的设想。描述这些细节毫无意义,因为通常的事实在于,未来的组织模式不可能是先前的计划的简单实现;而且就像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一样,集体家庭或公社也将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事实上,种类可能会更多,因为这是配置一种远比一夫一妻制的资产阶级家庭复杂的结构的²⁰问题。这种公社是资产阶级家庭的“继任者”,因此,它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的经济或政治细胞。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完全独立于公社,公社只是集体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因此,我们的公社与傅立叶^①的法伦斯泰尔或者其他作为生产单位功能的相似种类的公社,或依赖于分享共同生存空间的共同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公社仅仅具有家庭功能,我们的公社的实现不独立于社会政治条件,也不独立于共产主义的全球实现;它将通过创造适合共产主义要求的人而有助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转变。尽管公社的直接功能是解决目前讨论的冲突,但是公社提供了共产主义经济和政治结构转变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们是不可逆转的。这并不意味着公社组织必须“等”到共产主义转变的开始:相反,这两个过程必须同时开始,而且如果形势允许,在整个过程实现之前过渡到公社或许是可能的。

公社是一个**自由选择**的共同体:成员们选择属于它,并且能被这个共同体其他的成员所接受。个体进入公社,而且

^①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建立一种以“法伦斯泰尔”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译者注

进入公社的每一个家庭成人成员都作为一个个体而成为公社成员。当然,会员全体必须足够小,这样才能保证公社事务通过直接民主就能实现。个人个性的所有形式必须被尊重。公社运行所必需的条件如下。(1)工作是强制性的:所有强壮的公社成员都必须工作,并参与社会的劳动分工。例如,在公社里,即使是在当前的背景下,一个具有高收入的男人或许也不会支撑一个与他有着稳定关系的女人。(2)没有人被免除公社的集体任务。(3)公社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参与公社儿童的共同体,无论这些人是否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除了这些必要的条件,共同体并不介入他们成员的生活、工作、自由时间和人际关系。当然,像在所有的²¹共同体中一样,都存在着更好的人类行为的模式,但是除了在极端的事例中,道德偏爱的事情不会成为道德命令:在极端的事件中,公社或许会驱赶有关的成员。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公社在性关系方面没有价值优先权。目前在文明化的社会里,这种价值优先权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权意识: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或者(用更加现代的版本)男人和女人是彼此的私有财产。第二个因素是儿童需要被照顾。因为,公社以对私有财产关系的拒绝为基础,所以,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不再有效。就第二个因素而言,方法是与公社连在一起的,公社照顾那些出生在公社或属于公社的儿童,即使他们父母中的一人选择不同的伴侣或离开公社。公社对于性的价值优先权的缺失的具体意义是,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无论是一生的夫妻关系还是混乱的关系都是可能的。公社并没有使这种混乱的男女关系成为一种义务:这是重要的,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相似的组织不仅选择混乱的关系,而且还把组织直接建立在其上。然而,这是对个体的自由发展的限制,如同一夫一妻制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的解体不仅不会使儿童的生活受到干扰,而且还能消除离婚对成人的负面影响。这不是一个减轻离婚的痛苦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由生活方式引起的),而是当关系已经结束,离婚双方还能留在最初的共同体并不至于独自一人的可能性问题。公社解决了除离婚以外的其他情况的孤独问题。单身的人们能够找到一个具有结婚的人们的公社:倘若现在的家庭结构,有时结婚的双方也是孤独的,而且因为时间的缺乏或空间的分离等等,结婚的人们会被剥夺多样的和多边的人际关系,即使他们会幸福地与他人交往。当然,老人的孤独感和多余感在公社消失。公社生活缩小了仅仅建立在习俗和例行公事上的人类关系的范围。在现代家庭,人们经常彼此忍受并继续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此,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因为他们尽力避免离婚将带来的问题:在公社,这些问题都会消失。公社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不会阻止它之外的更加丰富的人类联合体的形成;外面的联合体将自觉地发展起来,因为公社既不是一个生产单位,也不是一个政治单位。就公社大量地存在而言,公社成员在它们中自由流动将是很自然的。

很明显,公社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意识形态,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彼此自由选择组织起来的共同体会有某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尤其因为公社在一个非常基本的方面(至少在现在)指向了生活的革命性变革。结果,公社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可能将引发内部的冲突。

看起来在可预测的未来,解除家务劳动是不可能的;服务性产业的增长不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家务劳动的现代化也不是,尽管这有助于减轻家务劳动。然而在公社的框架内,即使假定在当前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降低大量花费在

操持家务的时间却是可能的——较大的家务劳动是更经济的,因为它比较适合使用机器。从本质上说,这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时间,作为回报,人们可以在公社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时间。在一夫一妻制家庭里,带着小孩的父母被束缚在家里,但是在公社,“家”本身可以使得以不同的方式花费自由时间成为可能。甚至“在家里”的自由时间也不该被限制在消费上,而应该是积极的和文化的,这促进了个人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不能提前被确定,但是这种文化的框架将可以使得共同体取得进步。(这可以用历史的例子来描述,例如,在以前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工会联合体的文化影响。)当然,这种进步只有在共同体没有限制个性发展的状况下才能发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原则上做了阐述。²³

我们已经指出,公社的最基本的优势体现在对待儿童的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包括“已经完成的”人,对于他们,公社保证已经存在的问题将被解决。然而,导致资产阶级家庭毁灭的一个原因是如此根本,就在于,它排除了许多决定心理性格塑造的否定性因素。在我们考察这个问题之前,重要的是描述公社的儿童共同体。儿童不是在公社里“集体地成长起来”的,他们属于真正的儿童的共同体。对儿童行为的判断、参与劳动分工、奖惩的分配,也就是说儿童的关系原则,是年龄层次的一个功能,它对成人来说不是个任务,但是对儿童的共同体来说却是一个任务。这并不意味着成人和儿童的关系不应该是亲密的和多边的;但是成人不是简单的权威,像他们在资产阶级家庭那样。儿童应该知道他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导致了早期民主倾向的发展,这样儿童就能在相当早的年龄成为成人共同体的完全的成员。在涉及到幼小的儿童被关心的

情况下,成人和儿童之间关系的权威因素还是不能被消除,但是至关重要,公社里的每一个成人和年长的儿童,不单是幼儿的“生身”父母,并且都应该以某种或其他方式与幼儿联系起来;用这种方式,固定的情感从孩子出生就不存在了。当儿童长大以后,他们越来越趋向于选择那些被他们吸引的成年人和那些他们通过内部的联合体而联系的成年人,相反的也是事实。公社的成年成员不必要更多地被²⁴“他们自己的”孩子所吸引,因此,他们可以选择那些脾气、性格和智力都最接近或最吸引他们的儿童。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不是必须爱某个人,他们也不是必须“最”爱某个人:像每一种其他的情感,爱也依赖于选择。这消除了情感层面的“我的”和“你的”的二分法。然而,和出生在公社的儿童相区别,情感联合体的自由选择对那些带着孩子加入公社的人来说,是一种幻想。尽管这或许给那些在旧有家庭类型中抚养起来的儿童创造了冲突,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感觉到如果儿童能在他们的环境中成长,那么他们能把这些儿童“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的人们的经验。相反,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父母不能面对自己子女的缺点,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这些缺点暴露出来,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留下(后者在今天、在有很多孩子的家庭,情形不总是这样)。

很明显,公社的共同体对儿童的共同体有一定的要求。对儿童的要求是相同的,例如,有工作(或学习)的职责和参加共同体的共同劳动的义务。即使成年共同体在这种形势下被迫显示出权威的特点,他也不能像“家庭的领导”那样做,因为成年人所要求的,是履行如同他们自己的任务一样的义务。儿童的共同体不仅减少了“我的”和“你的”二分法的重要性,也阻止了所有权心理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不同,所有的个人的财产都被消除:现存

有很多儿童的共同体,它们证明了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儿童的心理性格,将鼓舞民主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将永远不会接受那种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是自然的情形。同时,他们也不会发展压迫其他人的需要。人们可能争辩,现存的儿童的共同体以冷酷的事件而著称:然而,这些共同体是由资产阶级家庭抚养起来的儿童组成的,而且他们试图表现出对权力的自然的需求,这些是在家庭中发展起来并同时受到压制的。或许会有更为严厉的反对意见,认为儿童的共同体可能阻碍了个性的发展。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公社必须创造一些条件,即一旦儿童完成了公社的义务,不仅成人而且儿童都可以跟随他们自己的愿望和喜好。每一个儿童都应该以他希望的方式玩耍,以他喜欢的方式阅读,并按照他的喜好花费他的自由时间。同时,如果儿童与众多的成人相联系,那么他们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将大受鼓舞。如果成人拥有一个本质上积极的道德品格,那么儿童就有机会在那些心理和道德性格都适合他们的特殊天赋的成人中,选择他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理想形象。

实现社会功能的公社都会有明确的物质前提。首先,公社不能是封闭的:每一个个体,只要他喜欢,无论何时都有权离开公社。第二,如果有必要(这个前提必须被保证,对于离开的成员,社会必须提供居所),公社必须有权开除成员。另外,公社正常功能的实现要求一定数量的物质财产:在贫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社一定会土崩瓦解,至少在欧洲的条件下是这样。然而,建立公社并不要求大量的财富,尤其是当个人的开销由于共同的家务管理、共同的图书馆、集体育儿等等而大量减少时。只要在商品生产的社会框架下,公社还在运转,那么物质问题就必须被认真地安排好,以尽可能少地制造冲突。既然公社不能同作为整体的社会相分离,

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靠降低收入差距来解决：只要共产主义对报酬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实现，地球上所有的公社在本质上就会再生产出更多的问题。

26 在公社里仍然存在着产生变化或解体的其他冲突。因为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心，所以，现存的非共产主义社会就会阻碍公社的发展，并试图使它们解散。我们已经描述的公社的理想类型本质上充满了冲突，但是它们不是一个依据所有权而建立的社会冲突：它们是“真正的人”的冲突。但是现存社会的影响或许再生产了旧有的冲突和结构，人们可以希望在具有强烈的特殊认同感的个体公社内的发展，这种认同感或许是人们之间竞争甚至对抗的原因或结果。或许会产生其他的重要的问题，由于独特的公社或许倾向于由那些在社会的劳动分工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人组成，这可能会在各种公社之间的生活标准上产生很大的差异，结果，文化的差异被保存了下来。

认为只靠公社就能解决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或许是乌托邦。不可能存在本质上是最终的，或者能阻止先前的社会结构被再生产出来的单独的政治或经济变革。例如，车间的民主很容易变形为被操控的民主。家庭问题的独自解决方法也不例外：如果公社保持孤立，肯定会变样。因此，公社成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任务就是帮助共产主义的变革在每一个社会领域中产生；相反，除非在家庭中实现革命，否则指向共产主义的结构转变就不会是不可逆转的。新的心理性格的塑造只能在革命化的家庭产生：这是对个体进行的大众教育的唯一的地方，个体将积极地参与运转中的社会事务，不仅是在伟大的社会危机的时刻，而是“每一天”。

二、两性关系的未来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有几个原因使得我们要对未来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家庭之中的关系做出预言是不可能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和社会条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不能孤立地加以分析。我们只能以未来某一点占优势的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通过询问人们期待哪种性关系和家庭关系,来思考这一问题。其次,即使以未来的社会关系状况的设想为基础,仍然很难做出预测。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面对几种不同的社会选择。哪种选择能被实现,在事实上依赖于人们的决定、行为和实践:因此,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从目前社会趋向的推断而做出回答。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从现存社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被给定的状况和潜力出发,我们就能描述一个最佳的,至少是值得拥有的社会发展的变体,并且我们也能够预测性和家庭关系的可能性发展,因为它们依赖这些最佳的,至少是值得拥有的变体。

当然,这种描述本身包含一种选择的因素。我们根据在社会冲突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和态度(这两种事情在实践中是

整合在一起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了一个未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而且这暗示着一种对目前人类已经发展的价值的坚定的态度。在讨论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未来时,我们应该把它们描述到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背景当中,因为这是我们已经选择的价值体系,包括我们时代潜能的最佳实现。这不排除可能有不太值得拥有的,甚至会令人反感的解决方案,也不排除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会产生悲观情绪的可能性。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共产主义视角的那些可能的解决方法,将成为判断未来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评判尺度。接下来,为节省篇幅,我将主要探讨最佳的可能性。

文艺复兴期间,就已经有大量关于性的和道德的规则与习俗。性道德的规则被作为启蒙时代社会风俗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特点的一个普遍例子而被引证。除了变化的问题,我们还关心接下来的问题。首先,从先前的某种历史观点来看,在广泛变化的道德习俗中,有没有某种经常显现的、被作为普遍的人类价值的固有的价值,也就是说作为“类存在”(马克思语)发展中的因素,同时在其积极的价值内容中指向了对自身的超越?另外,性道德观念的普遍的意义和功能是什么,什么东西使得它们在作为整体的道德习俗复合体中那么特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我们关于未来性关系和家庭关系所形成的设想有一种深远的影响。

在文明化与阶级社会发展之前,性习俗比后来任何时候变化得都多。这里没有篇幅来分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我们应该简要指出,这种表面的富有隐藏了真正的贫穷:事实上,它表达了部族世界的有限性。它反映的不是普遍性,而是普遍性和个性的缺乏。只有一种与性关系相关的价值,它在原始社会就差不多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并适应于文明化

社会,这种价值仍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乱伦禁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规范成为本能的了(至少作为一种社会规范):²⁹ 同一家庭的成员甚至不能彼此有情欲。由于这种规范的存在,人类作为一个类社会调节和规范自己的兴趣。因此,最初的普遍化,也就是说,第一个适合性关系的历史性的永久的价值不仅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目标追求的结果:即使人类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正在做的是什,事实也是如此。这是对马克思来说与性本能需求有关的“突破自然的束缚”(pushing back of natural limits)的过程的开始阶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过程在这个特殊的领域被极大地限制起来。

从文明的发展开始(重复一下:历史上,这与阶级社会的产生同时发生),道德伦理的变化在两性间的交往领域呈现出新的形式。因此,在同一个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出现了某种变化。同时,依据私有财产,以及男性和女性在性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的社会不平等,婚姻机构产生了。私有财产在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影响下产生了永久性的特征,这一点在每一个现存的习俗结构中都能找到;然而,尽管它们存在,它们也不能代表普遍的人类价值,因为它们是扎根于异化的过程中的。异化是人类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冲突:人类物质力量的发展是以牺牲人类个性本质和整个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为代价的。这在不同形式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关系革命中,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每一种异化的社会形式都具有的一个普遍的永恒的特征(这不只影响了家庭关系)在于,在私有制条件下,生活是以所有权为中心的。只有被我们占有的东西,才能被认作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因此,对所有权的渴望成为一个基本的欲求和动机,这不仅表现在对物上,也表现在对人上。如果一个人是我的财产,他或她就不

30 能属于其他任何人,就像我的土地,我的牲畜,我的工厂或我的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弥漫着所有权的动机。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让我们讲清楚,对于统治性的和家庭关系的所有权的欲求,不应该与在每一个爱的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强烈的愿望相混淆,这种爱的关系体现为我想要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我爱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这种混淆应该被避免,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追求所有权的“本能”独立于性欲和情感。男人对犯有通奸“罪”的妻子和她的“引诱者”进行报复,只是因为她是“他的”,即使他从来没有爱过她,对她没有性欲。这是一个不能从一直作为他的财产的某种东西中剥离开来的“荣誉”的问题,而不管他是否需要,也不管他对这个物或人的需求程度。当然,应当补充的是,对获得所有权的渴望与那种认为所爱的或想要发生性关系的人应该属于自己的渴望是紧密相连的。追求所有权的动机在这种关系中也是压倒一切的,它深刻地影响了欲望本身。这是一个男人拥有尽可能多的妇女的声望问题,而且如果所涉及的妇女是“难以得到的”,那么这种声望就会被加强;相反,妇女的声望则依赖于她们的崇拜者的数量和社会等级。

一般说来,在阶级社会,不是人与人相面对:而是在劳动分工中占有某种地位的人面对占有不同地位的人。只有人们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相似的,那么他们才是平等的。这是一种不平等之间的平等,因为它没有依据平等的人类价值。当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相似的人们之间出现一种真正的平等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在异化条件下,依据平等建立起来的有意义的关系是可能的。但是在大量的例子中,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在同性别成员之间,并且主要是男性朋友中,这种有意义的关系才是可能的。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

绝对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是,妇女不是依据她自己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是按照她的父亲或她的丈夫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受到评判的。只有在19和20世纪,这一领域才发生了许多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不是十分重大的。因此,两性间的关系被指责为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因而,它们反映了类存在的异化。³¹

这种不平等在两性关系的每一个方面都清楚地显现。它在性的方面被表达出来,因为只有在特殊时期,性快乐的互惠才被明确地作为一个普遍的目标。很明显,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对男人允许的事情对妇女是禁止的。在脑力劳动和司法领域也能看到这种情况:后者通过男人和妇女在家庭中不同的法律地位而得以展示。而且异化的主观方面是对这种不平等的默默承受;对于这一不平等的反抗通常发生在普遍的社会革命时期,或是作为这些革命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代,早期浪漫主义时代,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普遍的社会异化也以其他方式,尤其是通过道德异化的媒介延伸到性关系之中。

以财产为目标的态度预设了一种排他主义的个性,一个在给定条件下努力维持自身,如果有必要还会损害他者的个人;一个情感定位于以自身为主宰的个人——嫉妒、猜忌、虚荣和自我主义的个性;这种人不能以一定的距离审视自己或者说不能客观地看待他自己,他不加批判地把自身与他自己的情感和兴趣相一致。一种其功能是引导排他主义者的要求,并使它们服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和利益的道德形式,与排他主义个性的成长平行发展。道德命令并不是纯外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们就是不道德的)。个人把道德命令内化,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大程度地内化了道德律令,把道

德律令作为其自身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及他的内部规范。良心作为“内部的判断”是“外部判断”的表现状态，也就是公众的观点和它的道德判断在个性中的显现。

很明显，总的来说，道德原则在人道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两性之间关系的人道化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以它们异化的形式）。同样，很明显，道德规则 and 个人的排他主义趋向之间的对抗，同维持排他主义和促成它的人道化之间的对抗至少在程度上是相同的。

这里，我们只是处理有关性关系的问题。性道德的规则仅仅导致个人的部分的人道化，它同时保持了排他主义本能需求和道德规则（或许它们本身就是排他主义的）之间的矛盾。猜忌、自我主义和对所有权的欲求没有被消除：它们只是被疏导到与社会规则没有冲突或冲突被减弱的地方。例如，一个不可以殴打他上级的男人，可能通过打他的妻子来弥补这一缺陷。有几种施虐和受虐的变异，官方把它们贴以性变态的标签，事实上它们只是排他主义者对所有权欲求的一种发泄方式，它在可允许的限度内实现（当然，这不仅仅适用于性——人们只需要想一想战争的施虐，在那儿反抗敌人的任何事情都被允许）。

然而，在涉及到两性道德和性关系的时候，存在一个必须分别来加以解决的特殊的问题。当我们指出在文明产生之前，乱伦禁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说过这是突破自然束缚的一种表达。但是，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在两性关系中，突破自然的束缚以不同于人类交往的所有其他形式出现，主要因为它是依据一种生理的（自然的）本能需求的人类关系。当然，食物滋养也是一种生理需求，但是同它相比，人类的交往就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在母婴关系中起作用的自然需求按照定义（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不平等的一

种。在母亲和成年儿童的关系中,自然限制越来越不奏效。现如今,如果成年儿童还黏着他们的妈妈,那么,这通常是建立在社会和道德基础上的关系:换言之,他们同母亲建立起独立于生理上的血缘纽带的关系。母亲也以同样的方式与她的成年的孩子们相处。另一方面,性本能需求是两性联系的绝对的和不可避免的基础。它不能被消除,只能被人道化。

这是道德异化在两性关系的规则中的特殊功能的起源。实际上,道德规范或者使得性本能需求人道化,或者压抑性本能需求——没有第三种选择。弗洛伊德伟大的优点在于他把道德规范和性本能需求之间的对立,以及由压抑性本能需求所产生的所有变态公开化。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把异化的社会条件看成是人类的永久命运,因此他没有考虑第二种选择,人道化的可能性。然而,这种选择的几个方面我们从人类的史前时期已经可以看得到。

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是决定道德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在两性交往的人道化中,同时也在压抑性本能需求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异化道德的双重作用将在这里被最清晰地考察。让我们首先思考人道化。基督教接受并声称上帝面前男人和女人的平等,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趋向和意识形态。教堂会众中的妇女相信妇女和男人平等,尽管她们被排除在能把死者封为圣人的神职人员的职位之外。道德规范也是平等的:童贞是男人和妇女共有的一种美德,通奸是一种罪。(这种道德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的事实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在意识形态水平上的平等,现代爱情——来自于激情的爱——将不会存在。然而,基督教伦理在面对性关系时却是极为矛盾的。在古代,两性间交往的人道化程度反映了道德发展的程度,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却出现

相反的关系：道德的力量越大，性压抑就越大，性甚至在意识形态水平上被看作是某种“兽性”的东西。即使性行为本身对类的再生产是被允许的，色情享受和性快乐，尤其是对享乐的膜拜，都是违背宗教的恶行，并伴随着罪恶感。在这方面，资本主义道德至少部分地代替了基督教道德，尤其是对女性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与基督教相反，妇女的不平等成为了一个原则。妓院成为一个与一夫一妻制相连的资产阶级的机构。

因此，众所周知的“性革命”成为反抗资产阶级道德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并不是偶然的。“性革命”已经经历了几次浪潮，但是没有一个像在西欧学生运动中爆发的那个，影响那么大。当然，这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而是几个趋势聚集在一起形成的运动。然而，我们要区分两种主要的趋向。第一种趋向把曾经在道德标准变弱时期的所有被实践的事情都抬高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则；它把人性等同于“排他主义”的个体，并要求绝对的满足。这就是性变态，尤其是性虐狂（我们已经指出他们的排他主义性格）成为他们的理想的原因。从我的观点来看，另一种趋向也是重要的。它的盲目支持者把性革命作为结束异化的一种手段，这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对声明所有人拥有享乐的权利并不满意（这是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主题之一），但是却公开相信男女之间在性关系上的平等。进而，他们试图从这一关系中寻求对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也就是说对所有权的欲求的消除。那些寻求通过性革命手段来达到这种目标的人声称建立一个人道化的社会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理想和实践有些荒谬，甚至有些天真。

35 我们已经指出，两性关系的各种人道化形式甚至表现在异化的条件下，尽管仅仅是作为一个过程中的例外。在这方

面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个体的爱和规范,一段时间以来它一直支持婚姻应该以爱为基础。与此相连,就会有关于性爱的培养、夫妻的同志关系(comradeship)和友情关系(friendship)(这两件事情并不相同),以及个体学习如何克服对占有权的本能需求和如何与猜忌做斗争的尝试。生活和文学都提供了一些例子: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的日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对猜忌的斗争,这在他的作为整体的革命态度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所有趋向类存在的发展的积极因素都可以呈现出非人的形式,并在其他方面扮演一个毁灭性的角色。这是有关同志关系和友情关系的真实描述:麦克白夫人^①把与丈夫的关系等同于同志间的关系,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好的道德范例。这种堕落常常也伴随着爱的关系。强烈的、充满激情的爱经常会扫清所有的障碍(包括有生命的人)。但是激情本身并没有罪,有罪的是深深扎根于人类心灵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体系,它们在激情的路上设置了障碍[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例如,在拉辛(Jean Racine)^②的《贝蕾妮丝》,或《费德尔》中激情的占有欲]。爱情并不独立于产生爱情的整个社会和人类框架的其他方面:人们常常会爱上那些能够满足他们利益的人。在阶级社会,超越社会界限的爱情是罕见的。乔治·伯纳德·萧(Bernard Shaw)^③的戏剧《鳏夫的房产》证实了这一点。爱情关系和金钱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①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描写了麦克白在人性上走向堕落的过程。长久以来,麦克白夫人都是作为诱导、唆使其丈夫走向堕落的因素出现,被人视为文中的第四位女巫。——译者注

② 让·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③ 乔治·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萧伯纳,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译者注

无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卖淫中,女人经常是被男人供养的。在20世纪,爱情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习俗,一个几乎具有“良好举止”的必备的“义务的”因素。大众传媒和电影院操控了以营利为目标的爱情,就像它们操控了性一样。

36 显然,爱得浓深或浅薄仅是人的本质更加深厚或更加肤浅的一种表达。充满激情的爱情的相对流行历史地与积极意义上的人类主体性的发展相一致,并伴随着现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诞生(现代爱情诗就是这种转变的最美妙的表达)。一个个体所拥有的(在情感、伦理和文化领域)价值越多,他就能爱得越丰富。个体被剥夺得越多、异化得越多,他的爱就越没有价值,爱也越肤浅,越没有人情味。

然而,人们不能把20世纪对爱和性的狂热崇拜仅仅看作是故意操控的一件人工产品。事实上,在一个共同体纽带日益松动和破碎的世界里,人们是孤立的、无助的,爱(和性一起)是一个人能够遇到另一个人的仅有的直接的、人性的关系。甚至最贫穷的爱通过搭建一座两个心灵间的桥梁,也拥有一些找到另一个人的快乐,而且至少暂时地削弱或消除了孤独感和孤立感。因此,即使最商业化的两性关系也表达了人类本质的一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对人类本质的保护。

现在让我们简单讨论所谓的“性道德”。如果我们再一次提出某种“性道德”的存在是否是一个持久的价值问题,我们的答案一定是“不”。这不单单是因为所有偏见或被限制的道德(的确如此,不仅对于性道德,而且对于“商业伦理”或“政治道德”也是如此)的存在是一种道德异化的表达。相当大部分的公众观点仍然坚持认为,凡是反对普遍的性习俗的都是“不道德的”。与此同时,不道德的概念经常用来描述对性习俗的违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类存在的

发展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这是未来趋向的问题),那么,很明显,在两性关系中损害普遍价值的唯一因素就是那些损害所有其他道德领域的因素。靠社会的势力打破另一个人的意愿、有意识地误导他们、把他们仅仅作为达到一个目标的一种手段、破坏另一个人的生活、对互谅互让和平等的拒绝:这些都是两性交往的态度和行为,它们不可挽回地、在最大程度上损害了普遍的人类价值。但是,很明显,这些态度和行为不是专门违反某些性道德的特殊规则,因为它们是人类关系的所有领域也违背了类。³⁷

因此,我们有关未来的第一个观点是,专门的性道德规范体系将消失,而且未来两性间的交往将由与人类关系的所有其他领域同样的道德标准来判断。

我们已经设想了一种没有异化的未来社会,而且我们预见到,就像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所有其他领域所分析的那样,异化的两性关系也将结束。我们对这些关系有什么样的图景,它们的前提是什么呢?

首先,男人和女人间的社会不平等将结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将结束,因为人类的不平等也不能在其他领域被消除。我们说社会不平等的结束,不仅意味着社会形势和生活的原初条件将是平等的,而且意味着那些由于几千年来我们已经习惯,因而显得是“自然的”的特性的区别也将逐渐减弱并消失:例如,男女之间有关性快乐、性伙伴的选择,他们的智力活动,以及如“自然的韧性”的情感和道德特质的不平等,男人的理性与女性的“自然的”柔弱和情感丰富的天性的不平等,等等。

总的来说,如果生活不再以财产为中心,占有欲就将从两性关系中消失。“他人”将不再是声望、身份的对象,把他人作为一种手段也将结束。在真正的自由个体间的关系中,

38 他者总是他或她自身的目的。如果情侣中的一方感觉不再需要对方,恋爱关系就得结束,正如只有相互的需要才能使它产生一样。很明显,这并没有消除痛苦。得不到回应或不平等的性欲或爱情将一直是痛苦的源泉,有时也会造成悲剧的发生。但是,对占有欲的渴望的挫败所带来的精神的痛苦将会消失。被抛弃的个体将会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完全是个人的:它不会是受伤的空虚,受损的“荣誉”,或“某人的财产被偷”的情感。不再有由于性道德的败坏而产生的悲惨结局,正如没有罪恶,没有由于违反一些性规则而引起的负罪感。因此,对爱的失望将成为一种人类值得拥有的痛苦。

在一个非异化的世界里,占有欲的倾向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人们也不再以排他主义方式构成。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个例外的个体的个性,将成为社会的典型。道德规范不再对抗一个被认为是排他主义的,好像是某种“异化的”东西的个性。由于他自己的天赋(天生的能力、才能和鉴赏力),个性将能做一些具有价值指向的决定,而且能使这些倾向人道化而不是去压制它们。

我们已经看到,这在性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自然的本能需求虽然不能被消除,但是必须被压制或者被人道化。个体不必再压制他的生理需求,因为这些需求被人道化了。我们已经提到了这种人道化的标准:平等、互助关系、选择的自由和拒绝把他人当作手段。因此,如果它满足了这些标准,甚至一个纯粹的性吸引都是十分人性的,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些标准,就像今天,即使最“高尚的”恋爱也是非人性的。因此,人性和非人性的界限不在传统(主要是基督教)道德引出的地方:它在“纯粹的生理”和“高尚的”性行为之间不起作用。

如果我们说所有的人都将成为个体,都能使他们的感觉

人道化,我们肯定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将平等地并且具有同样 39
强烈程度地去爱或欲求。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根据以上提及
的标准使自己的本能需求人道化,而且这些本能需求能够被
多样化。但是充分发展的个体为了把他们的本能需求引到
一个人性的方向,并不需要“性道德”的规范。每个人都非
常清楚什么关系或哪些关系最适合他们。我们已经看到,在
文明开始之前,两性间的关系以超乎寻常的多边性为特征。
这种多边关系在氏族和部落中发展,因此,没有什么普遍的
东西。在未来的社会里,这种多边关系将再次出现,但是这
次是以个人为基础,因此,它将普及全世界:个体将在他的生
活方式上直接地体现这方面的类的普遍性。

迄今,我们仅仅讨论了两性间关系的丰富的类型。我们
必须还要说一说这些关系的内容。我们已经谈到两性间关
系的深度和价值直接地依赖于人的深度和普遍价值。情感、
道德和知识文化越丰富,感觉的强烈程度就越无所不包,那
么两性交往中情感和知识的关系也就越丰富、越深刻。

我们概括的观点毫无疑问暗示了以异化为特征并建立
在财产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消失。这种一夫一妻的
形式是几个世纪以来官方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了生活
而同居的认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解体是一种我们已经看
到正在发生的现象。这是我们时代的事实。但是,一夫一妻
制的简单解体绝不意味着新的和更好的关系将必然出现。
为了这一点,发生一场社会运动是必需的,它的一个目标就
是排除所有形式的异化。只要男人和女人不是真正的平等,
婚姻的解体就将包含对女人来说更大的不利,至少在一段时
间内是如此。只要我们仍然等待着一种新的、真正的和谐
的人性感的共同体被创造,一夫一妻制的解体就只能导致孤 40
独,并因此更痛苦,即使它没有使孤独感增强。尽管一夫一

妻制的解体、异化的婚姻会给人们带来痛苦的冲突,但是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指向美好未来的一个过程。它削弱了在两性同居和婚外关系中所有权和金钱关系的作用,并且因此减少了卖淫行为的发生(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尤为真实)。当然,只要“自然的被给定的”劳动分工(使用马克思的话)存在,对于财产和金钱的考虑就不能从两性关系中移除。但是这些因素的动力将减小,事实上正是这样做的。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恩格斯和倍倍尔(August Bebel),预见到并支持异化的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方面的解体。恩格斯和倍倍尔所没有预见的是伴随着这种解体的冲突和矛盾,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开始就是由相互协调的群体所组成的社会类型。

我们再次强调,未来的人们将依据个体的基础来选择他们关系的类型和内容,同时他们的本能需求不会因为性道德的禁止而被束缚或压制。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说行为人是他的行为的唯一的判断者。甚至最发展的个体也能做一些与普遍价值要求相反的错误的决定,或者有时也能做一些与人性深处的东西相反的行为;而且,永远也不会达到这一点,即所有的个体都平等地发展。因此,总会有一个法官和一个判断,也就是共同体的公众观点,它建立在自由的和平等的人类关系之上。然而,这种公众的观点将与以前所有的公众判断不同,因为它不是依据与个体相敌对的排他主义规范,而只是依据习俗。它将根据具体事件和形势来判断。它唯一的标准就是发现,经过思考的决定是否对在给定的类

⁴¹ 存在发展水平上获得的普遍价值有害,是否可能——无论多大的代价——不伤害个体。因此,公众观点的判断,不会产生压制个体本能需求的结果,反而会使它们人道化。

傅立叶和他之后的马克思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衡量一个社会人道化的标准。这里,我们已经概括出一个人道化的社会的景观,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允许人道化的男女关系。但是我们并不否认(事实上我们在开始就已经指出),不同的景观也是同样可能的。在一个向所有种类的操控开放的世界里,今天指向价值创造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产生一个截然相反的而且不受欢迎的结果。例如,如果一夫一妻制的解体或性革命指向了一个更人性的未来,那么它们也同样可能指向人性已经逐渐建立起来的价值失败的开端。由排他主义动机操控的个体,在与异性的关系中陷入虚假关系的程度,要比压抑自己本能需求的禁欲者或盲目地追求情感而不考虑他人的浪荡者更深。有关性生活的伪科学和文学闲聊、“专门的”同时也是墨守成规者的建议、依据“每个人都做”的原则,使人们降低了因性活动的羞愧而感到有罪的痛苦程度。(为了避免被误解,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言论不直接反对性教育!)事实上,这种操控使个性虚假化,而在两性关系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个性,无论它涉及性,或禁欲,或爱。

如果让我们做一个有关社会冲突的选择,同时选择两性关系的某种特定的未来的话,那么我们会选择自由和平等(当然是个体的)的关系,选择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没有任何占有欲的倾向,而且以他们的财富、渊博的学识和诚挚的品格而著称的关系。

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和日常生活的革命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过去20年,日常生活概念在多位彼此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中出现。按照这个问题出现的历史顺序,我们可以提及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卢卡奇(Geörgy Lukács)和科西克(Karel Kosik)。这一概念是作为对于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回应而出现的(如同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的每一次丰富时那样),尽管其中的一些问题并不那么明显。革命实践的这一新形势既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在社会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它是与伴随着法西斯主义失败而出现的乐观主义和幻觉时期的突然终结相一致的,这一时期推翻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带来一个新的,以左翼为定向的欧洲。不仅如此,这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称为“道德上的善的时代”时期的终结,在那样的时代,反对压迫和彻底不人道状况的集体斗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体的观念,一个直接的战斗目标和道德立场,并且提供了如此多的英雄主义和团结的重要范例。资产阶级新“成就”(establishment)恢复了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世界,而且事实上是加固了这个日常生活世界。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使得一

直被视为革命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他们的需要被满足程度的提高,工人阶级开始接受这一社会提供给他们⁴³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对需要操控和对舆论操控的相对的和暂时的成功使得日常生活与日常思维的批判具有极端重要性。在社会主义世界,同样的问题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变得紧迫。在这里,十分清楚的是,虽然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废除是建立一种人道化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还远不是充要的条件。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这一政权的消除(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但是社会主义生存方式的建构功能的问题,像其他一些问题一样,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毫无疑问的,同时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事实是,马克思不仅把革命视作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把所有这些(即对私有财产的消极扬弃)只是视作对私有财产,以及对异化的积极扬弃过程的先决条件。这也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彻底重构。同样地,毫无疑问的,同时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事实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的个体存在把他的环境视作“已经给定的存在”;他自发地占有习惯体系,并操控他的环境;他的行为是实用性的(因而对他而言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确保特定的行为的成功);他的概念是最低的公共标准;他的知识,按照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仅仅是意见(*opinion*)。不仅如此,事实上日常生活是由各种异质的行为类型构成的,这些行为类型从不与作为整体的人的实践发生直接的关联。我们的问题如下。如果我们承认所有这些结构要素都是真实的,并且把它们视作我们的基础,那么日常生活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异化的?——并且,因此,在保持日常生活的结构要素连续性的前提下,对日常生活的彻底重构是否可能?

个体为了再生产社会,就必须首先把自身再生产为个体。日常生活就是那些通过个体再生产而使社会再生产持续可能的活动的总体。没有个体再生产,任何社会都不可能⁴⁴存在,而没有自身的再生产,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存在。因而,每一社会都有日常生活——否则就没有社会了。同样的,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前文明的历史时期,存在的只有日常生活(尽管是在特定意义上),因为那时维持类(species)的过程和维持个体的过程还几乎很难分开。社会整体的主要对象化(objectivations)——劳动(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活动)、科学、政治、法、宗教、哲学和艺术——是在私有财产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的过程中分化出来的。因此,日常生活和符合类的对象化的分化代表了两个在历史上是同步发生的,但是在原则上并不连接的过程。其中一个进程是符合类的直接关系的相对自律发展;历史地看,这个过程是决定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另一个进程则是类存在(species-being)与个体的人(来自一个团体或者阶级的个体的人)的分化,因此也是第一个进程以**异化形式**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如果断言历史的发展将使日常生活再一次把对象化与类直接整合起来,显然是一种倒退的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和与类直接相适应的对象化之间的异化被视为决定性的这一现状的角度出发,承认对这一未来可以有不同的替代,将指明革命理论的任务。不仅如此,这也是每一种技术统治论世界观的问题,尽管其概念并没有完全清楚地阐述出来:这种世界观相信人的命运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生产能力、科学的增长和人们日常需要满足程度的增加来加以解决。同时,人们也可以把任何一种寻求通过把日常生活总体提升到

与类直接相适应的活动(也就是对象化)领域来消除这一矛盾的革命要求视作是乌托邦的。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人类(humanity)(而且原则上也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其中个体不必再生产他们自身,这一再生产不要求相对更大领域的个体活动。不存在,也永远不会有这样一种人类,其中个体会给那些与他们自己的存在和他们在特定需要体系中的活动相关的活动提供哲学基础。人们在肉体上根本不可能(并且也绝不会)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在其中他们对已经给定的和已经建立的所有东西加以质疑,或者他们在其中——在他们的部分日常生活中——不是依据普遍化的范畴、类比或者冲动而做出决定。我相信,日常生活异化的本质根本上不是根植于日常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而在于个体与他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得以形成的方式,在于他能否以独立的方式把这些行为方式划分为不同层次,或者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事实上,这种能力取决于个体对于非日常的,也就是对各种与类相一致的对象化拥有什么类型的关系。⁴⁵

在自己的史前时期(prehistory),至少作为一种趋势,人类建立起所有那些可以成为它自己的“真正的历史”的基础的价值。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类历史,就可以得出结论,日常生活的主体,也就是过着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体,可以区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特性(Particulativity)和个性(Individuality)。需要澄清一点:这是两种极端的类型,它们之间的过渡类型还有许多。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

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①

- 46 这样,人的自觉的本性,也就是与他的类相一致的特性,同时又成为取消(revocation)他的类存在的手段,因为它把他的存在(Wesen)转变为他的生存的工具。正是这一点形成了特性的、异化的人。特性的人(particular person)的目标是对他自我的维护:他自发地把自己与那一使他单纯的自我维护成为可能的,摆脱冲突的和“舒适的”习俗和规定体系等同起来。然而,并非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毫无例外地,并且在同样的程度上实行这种目的和手段的替换。总是存在(或者可以存在)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把他们自己,他们的个体存在视作与类相一致,作为类存在去行动而斗争;这样,从与类相一致的观点,也就是从与某个时代达到特定程度的类相一致的观点出发,他们把他们自己视作对象,他们并未把他们自己无条件地与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等同起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生存能力用作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的手段。个体是这样的人,他的生命自觉地成为他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自觉的类存在。

正因为个体具有与类相适应的自觉的关系,因此他也有能力以这一自觉的关系为基础(当然这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可能性下发生的),“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个体是这样的人,他在自身之内“综合”他的个性的偶然的独特性(chance uniqueness)和类的共同的普遍性(universal generality)。

“综合”的表述非常重要。当然,每一个人同时既是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译者注

特的,也由于与类相适应而是普遍的。但是,纯粹的特性的
人无论对待他自己的独特性还是对待类的普遍适应性的对
象化规范(也就是对待直接的环境,共同体及其规定),都像
对待一个“超越的给定性”(transcendent given)那样。个体
的生成开始于这一伪超越性(quasi-transcendence)终止之
处——但是是在**双重**关系上。我可能仅仅对自己的“命运”
不满,或者我可能仅仅对自己本身不满——但是,这并不必
然导致我成为一个个体。对这一伪超越性的克服,意味着个
体和他的世界之间的**经常的交互作用**。每一个人都塑造自
己的世界,由此也塑造他本人。然而,世界和他自己的重构
(以及二者综合的实现)并非是每一个人的动力(motiva-
tion)。当它成为重构我自己和我的世界的动机,成为我对象
化自己的能力,并且把向我开放的那些领域中形成的与类相
一致的能力和行为方式都吸纳到自我之中的动力时,只有那
时,我才走在成为一个个体的途中。

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我的 - 意识**(I-consciousness),正
如他也具有关于与类相一致的知识。但是,只有个体才具有
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自我意识是被关于与类相一
致的意识所中介了的我的 - 意识。无论什么人,只要具有了
自我意识,就不会自发地与他自己的自我等同:他会与自己,
因此也与他的特性动机、态度和给定要素保持距离。他不仅
或不主要“培育”那些帮助他在其直接的环境中(作为一个
特性的人那样)获得更好的定位和尊重的东西,而是也培育
那些他认为更有价值的,与那些从与类相一致的对象化中,
从社会需要体系中选择的价值等级相适应的东西。

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对于一个人而言,为了能够从事他的
日常生活,只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定位于特性就足够了。
然而,任何人要想成为一个个体,他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超越

单纯的日常：他与“我”(I)的自觉关系和与类的整合不会仅仅发生在日常的框架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在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总是发挥作用，或者有时发生示范性作用。个体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他给日常生活打下了个性的印记，这一个性源自于个体给定要素和与类相一致的要素之间的综合。在由社会分工所给定的可能性、生活方式的框架，及其所运行的价值体系的范围内，个性发展了与特定生活条件之间自觉地塑造的关系，按照歌德的说法，我们应该把这种生活条件称为“生活准则”(life-conduct)。

可以把个体的日常生活置于“生活准则”的标题之下。但是，虽然“生活准则”是日常生活可以划归的范畴，唯一能够胜任“生活准则”的人，也就是能够把自己综合为个体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和与同类相一致的对象化(及其他任何一种对象化)保持着一种自觉的关系：也就是，他是一个自觉的类存在。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基本范畴不再为个体而存在。同样的范畴和结构存在着：但是在生活准则的综合中，它们具有其他的意义。个体如同特性的人一样，出生于一个由各种限制条件和习俗构成的给定的体系之中。而且，处于向个体生成过程之中的人也要把作为社会关系体系和操控体系而发挥作用的习俗规则作为给定的而接受下来，并且也使自己适应于它们。他没有一丁点关于语言学的知识，就学会了说自己的母语。他使自己适合于各种习俗和各种事情的处理。特性的人和个体都开车，使用电梯(这是他们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完全没有任何金融理论知识，就可以在商场花钱购物。他们之间“仅仅”(merely)有一个差别(而且“仅仅”一词事实上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就在于，对个体而言，“给定的”世界的总体并不具有

伪超越性的外观；相反，与他生成为个体的程度同步，这一外观持续地消解。于是，个体能够或者可以变得能够在日常生活已经给定的结构之中，辨别那些妨碍他与类相适应的发展的因素和要求，那些成为纯粹礼节形式的，或者那些隐藏着具有负面价值内涵的渴望和兴趣的东西：这些正是他要摆脱的、拒绝的或者躲避的东西。让我们再重复一遍：绝不应该把这视作是对日常生活结构的躲避或者否定。个体用以在日常活动的结构中做出选择的意识形态因素，就是他的世界⁴⁹观(Weltanschauung)。

世界观不只是意识形态，它是一种个体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人用以在实践总体之中安排自己的个体活动的世界图景(归根结底是由哲学的和伦理的概念建构起来的世界图景)。在这种程度上，也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能断言个体的日常生活具有哲学特征，他的生活准则是由世界观“引导的”。

迄今我们一直讨论个人(无论是作为特性的个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个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我们是从日常生活在其中流淌的框架的那些具体的整合之中进行抽象的。由于个体和整合是十分复杂的，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并且带来许多超出我们这篇论文框架的问题，因此我们简要地把我们的讨论限定在紧密切合我们的主题的问题上，也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革命重建的问题^①。

特性的个人自发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个体则具有被自己的世界观所引导的生活准则。然而，世界观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而且(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个体的意识形态，它旨在平息冲突，并且定位于现实的重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分析，请参见 Agnes Heller,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Social Praxis*, vol. 1, no. 1.

建或者保护。这一重建当然可以涵盖十分宽广的范围；它可以具有伦理的特征，或者具有革命实践的规定性。从所有这些可以推论，只有在一种情形中个体的生活准则可以同时也是“个体化的”（individualistic）：这就是，在被确定为生活准则的世界观成为提升到原则层面的效用之处，在被转换为世界观的“占有”（possession）本身就是效用原则之处。这种态度是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成员的典型态度。另一方面，当“占有”原则没有被确定为生活准则之处，没有共同体，个体就无法存在：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中，共同体是永远存在的。特性的人可以生存于纯粹中介的世界，因为他总是从被视作为超越性的中介了的关系，以及从他出生于其中的整体（民族、阶级、阶层等等）来选择任何契合于他的眼前利益，他的自我保存和他的舒适的东西；他是一个在公共中活动的存在，但他不是一个公共的存在（a communal being）。然而，个体则反对对世界的拜物教；他的世界观是选择，并且这一选择正在于他对共同体做出决定。形成生活准则和选择共同体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共同体并非简单是一个政治的联合体（association），尽管它常常也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共同体是一个中介的世界中人的直接关系的的同时的和突然的创建。人的这些直接关系的创建（我们只能在相对的意义谈论直接性）使它可以承担一个具有不可分割性质的任务：以这样的方式来重构现实，以便我们据此可以沿着配得上人的存在的方向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总体。（只是因为现时代的个体的生成，我们才能谈论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自由选择的共同体。古代的和中古的个体，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形中，产生于一个共同体之中。）

现在我愿意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只要我们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把创造一个非异化的社会作为我们

的目标,我们应该倡导的就不是废除日常生活,而是要创造非异化的日常生活。并且这不仅是一个倡导的问题,而且是(在给定的可能性中)去实现它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重复席勒最初在关于美学教育的话题中勾勒的幻想(illusion),即把在个体中塑造一种优秀的生活准则作为在经济和政治重构之前必须首先完成的计划。我们把那种认为为了能够使人的日常关系人道化,我们首先必须扬弃经济和政治异化的观点,同样看作是一种形而上的幻想。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幻想,被启蒙的君主的观念必然属于这一类幻想,这是那些⁵¹从事准备工作和“引入”变革的立法者的乌托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前景。我们本身可以按着对异化的积极扬弃的方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重建我们的社会;但是,只有当我们在给定的可能条件下能够扬弃主体方面的异化,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为变革机构,而且要为重塑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塑造那种可以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并且同时能够树立起典范的共同体。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作运动。作为运动,共产主义是消灭剥削和私有制的持久的斗争。它作为运动的特征不仅包括持久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不断地超越特殊的目的,而且还包括每一个参与到这一运动之中的个人的活动。作为运动,共产主义允许每一个参与到其中的个人自觉意识到其与类相一致的目标;共产主义的个性的人,作为运动的成员,只能是个体,或者他们必须至少处于生成为个体的过程之中。反过来,今天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一个人才可以发现并且发展起一种同时具有大众特征的个体的生活规范。眼下,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忘记了马克思所确立的目标:他们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运动,而是采取了传统政党的形式,并且不顾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需求正在增长的事实。我要重复的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激发人们对传统日常生活形式的不满,推动人道化的社会的创建。

如果观察一下近些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学生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很大,但是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定位于改变世界。这些学生运动并不同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联。在运动的背后隐藏着对日常生活的不满,同时,与这一不满不可分割的是一种对个体生活准则和人的直接关系的诉求。在这里可以提及柏林的公社实践(communes)^①或者科恩-本迪特(Cohn-Bendit)^②对萨特的采访。如果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想要理解这些运动,特别是如果他们想要以积极扬弃异化为目标,那么只提出几个政治口号是不够的,不管这些口号多么进步。问题在于(当然,这也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吗?并且,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生存方式?这在资本主义中和在社会主义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前者目标是改变社会制度,而在后者是努力指向改革。

在这篇论文的范围我并不想去在这一方向上构想出一个方案。无论如何,我不能这样做。我只不过是想指出从这一语境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之中的几个问题。

① Communes(公社、社区)是欧洲近现代文明中经常出现的共同体形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强调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和集体劳动的理想共同体或理想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德国的公社实践具有比较长的历史,19世纪在生活改革运动(Lebensreform)的激励下,就开始了理想共同体的实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出现了100多个理想共同体,其中许多具有共同经济。20世纪60年代后,德国的公社运动又开始复兴,尤其在柏林出现了一大批公社(communes)。——译者注

② 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 1945—),德国政治家,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中的学生领袖。——译者注

一个问题是理想的问题。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在今天各种追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青年运动中,切·格瓦拉(Che Guevara)^①站在理想等级体系的最高峰。格瓦拉站在这一巅峰的事实不仅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令人满意的情势(state of affairs)。我只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格瓦拉作为一个理想典范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特性,因此在理想典范中不存在多元主义。我们不需要浪费笔墨去描绘格瓦拉持久影响力的不可思议性和令人满意性。他不仅离“家”(我们这样形象地说)以便献身革命,而且后来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选择:他放弃了权力,单纯作为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而战死。格瓦拉成为一种理想典范这一事实也表明一种对于革命前途的承诺。然而,一种运动不仅需要象征性的理想,而且需要真实的理想。甚至革命者也不是,并且不能够仅仅体现在一种态度之中。我们只要看一看列宁,他的象征性革命本质是只有通过许多年扎实的行动才展示出来的,与格瓦拉不同,列宁代表革命获取了权力。对于一个决定献身革命但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情形外无法重复格瓦拉命运的年轻人(或者甚至老年人)而言,格瓦拉是一个象征性的理想典范。在大 53
众规模上追随格瓦拉就如同基督徒追随耶稣那样是不可能的。神秘化理想的独裁是与现实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就在于那些自己接受了这一理想的人,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倾向于以一种无法获得的形象的虚假外观而行使他们的生活。克尔恺郭尔提出一个悖论,一个人可以追随基督的脚步,却没有人能够理解基督,因为就“外在的”表象而言,人像个庸

^① 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军事家和国际政治家,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后来他辞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在玻利维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后被捕牺牲。——译者注

人(philistine)而生存。这并不单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尤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工厂中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或者在医院作为一个医生的德国青年或者法国青年,原则上无法过着格瓦拉式的生活。并且,如果他没有多元性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他将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然而,如果有可能“从外面”把一种意识形态引入到运动中去,那么我相信这对于理想也是有效的。我想提及某个在我看来代表着一个真实的理想典范的人物,C. 怀特·米尔斯。米尔斯构想和阐发的行为方式在于,当一个人生活在非民主的环境中,他应当像仿佛生活在一个真正民主体制中那样思考和生存。这一生存方式的基本的勇气不是军事英雄主义,而是公民勇气(civic courage)。无论是谁对占主导地位的成见和压迫性权力说不,并且当对于公共舆论而言是必要的(而且这常常是必要的),通过他的生活和他的生活姿态(life-conduct)来践行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具有公民勇气美德的人。当然,怀特·米尔斯和公民勇气只是一种例子,只是一种真实的理想。我重复强调的是:需要有多多样性的理想,因为缺乏这一点,对于日常生活不满的运动就会导向彻底失败。

另一个必须简要地涉及的问题是性的崇拜(cult of sexuality)。眼下我不想涉及性的操控问题,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我要涉及的是那种来自于重建生存方式的真实需要的性的崇拜。这是一种已经存在数十载的现象,并且它的共同特征也同样有数十载的历史:对一夫一妻制的反叛,对与财产和占有相关联的思维方式的反抗,以及对流行的成见体系的反抗,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浪费笔墨对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加以阐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新的内容和动机被增添到上述这些现象之中。作为一些被现代工业发展所设定的具体的方式,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直接的人际

关系被从生活领域中“挤出来”(squeezed out)。天然共同体,即那些不是被人们选择的共同体,失去了它们的亲密关系(只有在儿童时代,家庭仍然塑造了亲密共同体的气氛),而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变化使得在劳动过程中直接塑造这种共同体越来越不可能。然而,对人际关系的亲密性的需要已经失落了,这一要求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得到满足。但是,直接的人际关系的贫乏也在具体的爱情生活的内容上留下印记:归根结底,只有爱情,毕竟使直接的结合成为可能。没有什么东西比使这一进程与父母的告诫相遭遇更加荒谬的了。人们不应当简单地宣称“性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东西”;而应当(在这里我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创造一种人类共同体,在其中,全新的生存方式,包含着无数种直接性和摆脱了占有本能的性能够得到发展。

在人道化的生存方式之外,既不可能形成消费“自由时间”的合理的方式,也不可能在这一自由时间中形成合理的消费和享受的组织。同时,我相信,那种认为只有首先是劳动过程人道化才能创造人道化的生活共同体的想法是乌托邦。在今天的工业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在那些其工业化水平更低的国家里,绝大多数职业都是在贬损人的条件下从事的,而且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在特定的条件下,劳动过程的人道化当然是计划方案的一部分;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寻求最优化的努力必然把劳动过程的人道化作为一个目标,但是不会幻想把这一点作为整体生存人道化的尺度。这种幻想很容易把运动导向巧妙的操控的工具。生存的人道化的核心计划方案位于劳动领域之中,但是外在于劳动过程:在于真正的(而不是被操控的)“参与”,在于工作场所的责任性和民主。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必须承认对于新的生存方式的要求和对于共同体的需要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应当助推那些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社会,旨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人们的运动。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劳动过程的人道化在这里不是真实的出发点。在我看来,真实的出发点具有伦理的和政治的性质。这一问题的伦理内涵在于人们必须推动构想一种旨在反对基于所有权的生存方式和基于所有权的心理学。马克思描写阶级社会的“特性的”人时指出,这种人把自己的全部意义都归结为“占有”,并指出,新的共同体必须反对“占有”,必须反对基于所有权的心理学和对“物”的崇拜。人们必须明确阐明和澄清占有(possession)和享有(enjoyment)之间的界限,并且由此而宣布一种引领“善的生活”而不陷入唯美主义之中的方案。

所有这些伦理要素,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共同体建构的性质,即使如此,作为结果的共同体也只能持续较短的时间。对于旧的生存方式的伦理学批判,只有基于一种统一的世界观,才能够具有持久的、共同体建构的作用。而在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中,政治的承诺持续地发挥着核心作用。对新的生存方式诉求的构想在任何地方都是与采取某种关于政治问题的特殊立场相关联,这绝不是偶然的。近年来这些决定性问题之一是越南战争和第三世界的团结。更为成问题的和更不清晰的是这些非常异质的和完全不同的运动,同它们本国的政治特点之间的关系。通常它们没有确定的政治纲领(人们也不能期待从它们那里得到这种纲领),它们并不总是具有一个政治目标,但是,它们总是同政治具有某种关系。在它们的口号和模糊地表达的诉求的背后,总是有镌刻在法国大革命旗帜上的纲领:自由、博爱、平等。许多团体强调自由,而其他团体则强调平等。但是,如果没有相对具体的、确

定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的政治工作,持久的、塑造生活的共同体就不可能存在,这些活动使得超越对自由时间的单纯调节(即消费),以及获得一种由世界观决定的生活姿态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必须通过分析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创造自由和平等的可能性的真实的方式,并由此为形成一种通过非异化社会的规范来引导各种共同体的日常生活的世界观奠定理论基础,从而在这方面以一种示范性的方式而活动。

我相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完全依赖于推翻其制度,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完全依赖于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关于这最后一点,我们还要略加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为自己设定了重建现实和他们自身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思考创建这样的制度,以不仅保证个体的自由权利(资产阶级民主也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远不仅如此,要创造可能性,使社会的活动在整体上以其自身直接奠基在人的关系之上的共同体为基础。我不相信直接的民主已经过时,甚至在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上也是如此。毫无疑问,社会整体的决策形式(我强调“形式”这一词)绝不可能是像在古代城邦国家中那样的直接民主。然而,我坚持认为,有可能以制度的方式制定这样的形式,它们会在社会整体水平上产生直接的民主影响。诚然,在任何地方,直接民主的条件总是具有相对平等的资源。因此,我相信,那种不关注平等的纲领的形式自由的口号,是一种危害自由的口号,即是说,它危害那种事实上通向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真正的自由。⁵⁷

回到我们的初始问题:日常生活的持续革命化是目标,但是,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先决

条件。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伴随着他们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提供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才能是革命的和示范性的。

四、从人的需要的观点 理解理论和实践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

理论和实践总是从属于同一个生产单元(unit)或者社会单元(结构),作为其建构性的要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中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在内容上是不同的,而且在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并且因此理论的功能也是不同的。有相当多的社会单元(我们甚至在所谓的20世纪的“原始社会”中也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其理论和实践是没有区分的,而是以一种一体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因而,从这里提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绝不应把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简化为共同的特征。在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中,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同质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其一致的或者发散的目的,除了其他因素外,主要是由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驱使的。直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降临,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一般性问题才开始出现。即使这一问题出现了,它所提出的问题也不过是:为什么个人和人民团体不能实现他们的原则。然而,这一点对我们的问题而言不是十分重要的;充其量它只是我们的问题的次要的成分。

由此,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一般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这一结构表现形式的产物。因此,正是当这一问题被以它的最一般的形式提出时,我们应当特别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其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也可以认为,这一任务是同确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无论这一历史时期有多长和多重要。

- 59 我从一开始就需要澄清的是,在我的论证过程中,我不涉及自然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尽管从伽利略开始兴起的自然科学构成了我所讨论的进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下文中我将把自己的分析限定在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提出,其本身是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后果和表现。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即作为以“生产”理论为工作职责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创造理论的社会力量和实现这一理论的社会力量是相互分离的。甚至理论家也直接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这也是真实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甚至完全不同的理论都会服从于商品生产的模式。无论他们是否直接表达特定阶级的利益,理论在任何条件下又总是终结于市场。并非所有产品都能到达市场这一事实如此显而易见,以致不需要任何分析验证。由于这样的事实,在上述情形中——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视作事实上的样子——即使理论产品也没有机会转化为实践。因此,我将从我们手头的问题的视角讨论这一方面。

理论进入市场的基本形式是出版。通过这种方式,理论变得有效了,可以吸引消费者。还有第二种形式,例如宣传活动,这些宣传活动或者被个人的行为所调节,或者像目前

不断增长的趋势那样,被大众传媒所调节,或者被二者共同调节。在自由市场体系中,理论也来到自由市场,人们接受它或者放弃它、使用它或者不使用它,都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在被操控的市场条件下,理论的自由竞争也被禁止。大多数理论产品在市场上的传播是外在地设计的,以便根据预先确定的方向操控公共舆论。不仅如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反对的,甚至革命的理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必然循着同样的路径,因为这一理论也被社会的结构所引领。马克思关于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著名论断也意味着——至少在一些想象的出发点——群众的存在也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影响,以及被一种没有群众的革命理论所影响。⁶⁰

作为现代分工的结果,理论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社会学家并不重要)是一种能够向市场提供自己的理论的人。由于我们都同抽象的形式打交道,让我们把理论家的各种动机都悬置起来,假定所有这些“理论人”带着他们的理论产品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中的观点视作真理。让我们假定,这些理论家在出售自己的理论时并不是为赚钱和获得更高地位的欲望所驱使,而是希望他们的观念的传播和接受会影响社会,按照他们视作更好的方向整体地或者部分地影响社会。显而易见,在大多数事例中,情形并非如此,但是,为了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这里出现的任何不同的动机都应当悬置起来。在这一点上,问题在于确定这一商品的“买主”的身份,他们为什么要购买理论,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们去获得他们所要的。

众所周知,即使对特定理论的占有已经在大规模的群众那里得到实现,那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论本身通过这些中介

而找到了进入实践的路径。大多数遵循某种理论的人是普通的消费者,他们消费一种理论就像消费一种牙膏一样。这种消费模式就是所谓的“普通的文化”(general culture),是从属于一个给定社会阶层的必要条件,正如使用某种品牌的牙膏一样。当然,消费水平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这能够表明这些理论正以自己的方式被转变到特定阶层的实践之中,因为对于这些理论的市场需求通常在增长。同样,市场越是被操控,这种理论可信度的指数就越低。

61 由于我在这里是从实践的观点来分析理论,因此我必须忽略这些只是作为上述意义上的消费者的“买主”。相应地,我不得不把我的研究限定在那些从实践的观点来购买理论产品的人,以及他们的动机和他们获得理论的方式。

然而,这一研究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实践,以及理论的实践效力的先在的规定。有可能获得和使用一种相当一般性的实践概念,它包括了每一种类型的社会活动,并且归根到底,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概念之一,但是,当我们刚好是从实践和理论的交互作用中来分析实践时,这一概念则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从如此宽泛的实践定义出发,那么所有的理论活动也应当被视作实践的活动,这样也就失去了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抛弃一个本体论的实践(*praxis*)概念的情况下,寻找对实践(*practice*)概念的更为严格的定义。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困难,即不可能在狭义上为实践概念构想出一个完整的定义。因为,这种狭义的实践类型只有在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的关联中才能加以阐释。

在我的分析的进一步展开中,我将不考虑那些直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意识形态,并且我也不会涉及使现存社会

保持运转的相应的实践。我不把这些意识形态视作理论,尽管它们一直渴望成为这样的理论。作为虚假意识的直接表达,这些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作伪理论(pseudo-theory),正如相应的实践,即其功能是“使事物保持运转”的实践,是一种伪实践(pseudo-practice)。

各种各样的实践,以及与这些实践相适应的各种类型的理论,它们彼此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在于它们是否或者至少尝试着在群众活动中得以实现,并且,如果它们这样做,它们赖以实现的群众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在这方面,“手段”的问题——特别涉及到是否使用暴力——在我⁶²看来,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事实上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上,那么对于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真正的差别的把握就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抽象的层次上提出这一问题,即使用暴力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否是允许的,是否是必需的问题,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新意的。所有两难问题都必须具体地解决,从其目标的立场,从特定实践的社会运动的和具体的情景的特征来加以解决。一种特定类型的理论和实践在每一具体的情景中总是有自己适当的手段。使用暴力或者避免使用暴力只能通过考察——不是一般地考察,而是具体地考察——它的使用对于其目的和给定实践的运动的实现是否恰当来加以判定。如果暴力的使用摧毁了其目标和运动本身,或者把运动推向同原初的意图相偏离的方向,那么就是不恰当的。

我要重复的是:我认为各种运动的目的和特征是分类的真实的基础。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可以区分出以下各种类型的实践。

第一,所谓**局部的改革**(partial reform):一种把改变个别的领域、机构或者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任务的活动。在这种

情形中,最初的意图实际上就是局部的改革,即不超越给定社会的前提条件的改革。这种改革主义的理论和活动可以指向完全不同类型的领域,例如,指向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司法领域或者教育领域。局部改革在大多数情形中是由专家制定的(他处于一种倾向于改变的领域),尽管并非完全是专家参与这些改革的理论的制定。通常在这些局部改革之前都会发生旨在反对那些被视作是过时的机构的“批判运动”(critical campaign)。在这些局部改革的情形中,实践的群众基础可以是十分薄弱的,主要局限于专家的活动,尽管在大多数的事例中情景是不同的。局部改革所遇到的阻力越大,群众参与的程度就越高,他们部分地通过施加“压力”,部分地通过直接参加改革的实现(例如,考虑一下意大利负责离婚事务的机构)。同样,在这些事例中群众的活动是偶然的,而当改革实现后他们的活动就停止了。以局部改革为目标的运动非常容易成为操控的工具(甚至当它不再是他们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的意图时也是如此),这不过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通过把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引导到具体的(个体的,局部的)机构的改革,创造出一种特定社会秩序的可改变性(transformability)的表象。

第二,普遍的改革(general reform)。这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把通过局部的改革而实行对整个社会的改革作为自己的目标。普遍改革运动的理论家的基本特征是对整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不是专家,并且即使他们是专家,他们也不是作为专家而行动。他们更多地是作为运动的领导者,或者说他们呼吁涵盖整个社会的运动。普遍的改革运动——至少在其理想的类型中——是具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的运动,他们不会实现了局部的改革就停止存在,而是持久地保持“在活动中”。这种类型的实

践的例子是1914年之前的社会民主党的运动。

第三,政治革命运动(politic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这些运动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激进变革,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赢得政权。这一点可能被这些运动视作它们的终结目标,尽管对大多数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言,这只构成了出发点。政治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在规模上可以有很大差异。如果这一基础从一开始就是受限制的,那么胜利的可能性就会很小。然而,胜利的政治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双重的。引领运动的力量在大多数案例中都是少数的,已做好准备从事任何行动,准备冒任何风险:一个革命的精英集团,但是它同时又享有积极的群众的支持。可是,从获得政治胜利的时刻起,“潮流开始按其他路径流动”,群众的活跃性开始减弱,并且后来转向消极。这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中成熟起来的所有政治革命的进程(而且政治革命只有在这一社会范围中才能成熟)。这种政治革命最纯粹的、最经典的例子是法国的雅各宾主义。⁶⁴

为了解释这一动力机制,我必须提及马克思关于人分裂为“有产者”(bourgeois)和“市民”(citizen)的著名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然的”存在是作为有产者的存在,即为他自己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私人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因为它(最重要的是)放弃改变社会的尝试。就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活动而言,市民的存在也同样是异化的:政治领域的活动首先是同其他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分离,但是也同市民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分离。在政治革命的定向中,以及依据这一革命的实践中,这一二分法并没有消失:人们的生存方式没有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赢得政权后,群众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并且完全消失。大多数人转回到有产者的生存方式,而少数人固化到市民的

异化存在之中。我们引用恩格斯的一个说法：理性的王国转变为资产阶级的王国。

第四，总体性革命实践（total revolutionary practice）。这第四种实践形式也包括生存方式的革命。如果生存方式发生了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就会变得持久。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之中，而且正是由于人们的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历着改变。那就是为什么生存方式的革命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总是不可逆转的。生存方式的革命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基督教历史中。

然而，当我强调总体社会革命包含着生存方式的革命时，我同时并没有说生存方式的革命总是包含着总体社会革命。相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历史上迄今还没有一种生存方式的革命，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图的，包括经济、政治领域和文化在内的总体社会革命。

但是，当马克思讨论共产主义运动时，他思考的是这种类型的总体革命实践。当然，他的概念并不是建立在历史类比之上的。当无产阶级运动在资产阶级领地上成熟起来，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政治革命的要素，即赢得政权的必然性。但是对马克思而言，政治革命只是一个台阶，人的解放是与政治解放相对照的。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强调一点，马克思所设想的总体社会革命，从这一运动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意味着超越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结构。上述所分析的所有三种实践形式——即局部的改革、普遍的改革和政治革命运动——都是建立在从属于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结构之上的。

让我们研究一下，在前三种事例中，“理论的产品”是如何被购买的，它的实现或者尝试实现是如何进行的，并且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

对某种“理论产品”持续增长的要求表明具有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环境——如果我们不考虑对文化的纯粹消费——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理论把握和表达了一种现存的（而不只是理论地假设的）需要。

如果遵循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必须分析“社会需要”的概念，这特别是由于“需要”的概念虽然人们经常使用，但是它是不清晰的、模糊的，并且是完全经验的概念。

需要是一种自觉的渴望、强烈的愿望和意图，它总是指向某一特定的目标，并且激发着行动。所谈论的目标是社会的产物；它是否是一个商品、一种生存方式或者“另一个人”等等，这无关紧要。社会对象化（objectivation）和需要是相互关联的：前者确定了在给定的社会中从属于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个体的需要“框架”。需要总是个体的（因为只有人⁶⁶能够自觉地去渴望、愿望和谋划），但需要同时也是社会的（因为需要总是在社会对象化中得以“提出”）。“自然的需要”是不存在的。例如，空气并不是需要的对象，而是我们生存的条件，虽然我们更喜欢新鲜的、纯净的空气，而不是被污染的空气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是一种需要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对所谓的“生存需要”或者“生存条件”和真正的“人的需要”加以区分。

“生存需要”或“生存条件”在本体论上是第一性的，建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之上。它们首先包括对食物的需要、性需要、社会交往与合作的需要、活动的需要。甚至这些需要也不能说成是“自然的”，因为在其具体形式上——作为需要的恰当的形式上——这些需要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联中才能得以解释。甚至对食物的需要也无法用“生物学上的精确性”加以解释。例如，只要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足够了，在一些非洲共同体中，卡路里的饮食摄入在相当程度上

低于公认的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但是,从维持社会动态平衡的视角来看,他们并没有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只是作为社会平衡骚乱的结果才出现。一般地,我们可以断言,原始社会的结构也能保证一定水平上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这一满足的限制是自然:由于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死亡是自然灾害的结果。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样的社会,它运用自己的社会结构使全体居民的所有阶级都每日为了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而斗争,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起,直到20世纪的欧洲,直到今天的第三世界都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说成是“没有需要”的阶级,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方面被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

与“生存条件”不同,正当的“人的需要”是指向对象的,⁶⁷ 它不是一种由自然本能驱使的欲望。例如,它们更多地是由创造物而不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东西构成,包括文化活动、成人游戏、沉思冥想、友谊、爱、对象化之中的自我实现、道德的需要等。它们也包括人的异化需要,像金钱、权力、占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对工人阶级争取满足自己纯粹的生存需要的斗争的限制相平行,异化的需要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变化(至少在欧洲和北美是如此)就在于,人的异化需要的主导地位占据越来越宽泛的阶层,也包括工人阶级在内。

人的非异化的需要具有质的规定性。它们的发展不是以实践上为满足需要服务的对象的无限积累,而是以它们不断增长的多方面性为显著特征,马克思把这种多方面性称为其“财富”。在这一点上,我要强调,生存需要和人的非异化的需要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人的非异化的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吸纳一些生存需要:例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相互需要。

然而,异化的需要具有量的规定性。它们的积累过程在实践上是无止境的。如果我们单纯考虑量的需要,那么很难确定在哪个点上它们能够达到“饱和水平”。只有质的需要的出现和占统治地位才能阻止量的(异化的)需要的无限积累。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十分清晰:共产主义是不断拓宽人的质的(非异化的)需要的主导地位,压倒人的生存的和异化的(量的)需要的社会进程。

在做完这一题外话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回到理论和实践的多种类型上。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理论的实际效用取决于它“切中”(palpate)真实的需要的能力。但是,为什么需要必须被切中?

特定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是由那一社会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对象化所“提供的”。这些对象化划定了需要的动力机制⁶⁸的限度。归根结底,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和对象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远比之前的非“纯粹的”社会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这背后的一个理由:从早期资本主义开始,纯粹量的需要的单纯积累就取得了彻底的支配地位。相应地,这本身就是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的一个要素的结果: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本质上动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可供消费的商品的总量凭借着生产节奏的惊人的加速升级而持续增长,而且新商品和新的商品种类也不断被发明出来,结果对于这些商品的需要也被创造出来。进而,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其中需要——在给定的对象化条件下的需要——不会只“预留”给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或者阶层。如果对一个对象的需要在对象化中产生,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不管是否所

有人都占有满足实际上的需要的手段。这对于所有的需要都是真实的,而不只是对于那些作为量的需要。因此,不仅人们可以整合由相对同质的对象化体系所“提供”的需要结构,以及相应的价值,而且,至少在理论上,人们可以从由异质的对象化所“提供”的需要中加以选择。这样,不同个人的需要的层次结构的形成成为可能的。进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一个没有建立在有机共同体之上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的“共同体”是商品关系。在早期社会中,需要的层次结构是在共同体之中发展起来的,个体或多或少地接受共同体为他所建构的需要的价值。自从资本主义取得了自己的存在,这就不再可能了——从这一观点来看,某种相对直接的东西替代了具有两重性的中介体系。

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不会被强迫去“切中”需要。他只不过是知道他的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如果他具有一定的理论能力的话——他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带有或多或少的深度以及或多或少的一致性来表述这些需要。当他表述另一个共同体的需要时,他能够以在一个共同体中已经清晰地表达的需要为基础。这也是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和在柏拉图那里的情形。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机共同体已经不再存在,理论家——作为知识工作者——在甚至更大的程度上屈从于劳动分工,并且因此以稳定的对象化为基础的需要的类似的直接表述不再可能。于是理论家就被迫去预见社会结构,从他自己个人的观点去详细阐述他的理论,而且只有在事后,才能搞清楚他在自己的理论中自觉地或者自发地表述这些类型的需要时是否成功地切中了真实的需要。进而,由于需要是被异质的对象化所“提供”的,理论选择的领地至少在原则上变得越来越大。

自觉的价值选择(在这个事例中:个人的价值层次结构,

或者偏爱特定需要而不喜欢另一些需要,偏爱特定阶级的需要而反对其他阶级的需要)在理论是否能够被购买,理论是否能够被应用,以及,如果应用理论,哪个社会阶级或者社会阶层会应用它等问题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社会结构,特别是深层的和多维度的社会结构的洞悉,可能导致矛盾的结果,即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在所讨论的理论中承认自己的需要,甚至在这一理论事实上适合这样的阶层的情形中,也不承认。这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除了其他书以外)的命运。它也可能导向同样矛盾的境地,例如,当理论的特定方面被转变为实践,并且掌握群众(因为这些理论内容适合群众的紧迫的和基本的需要),而理论整体却处于这一进程之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以来的命运:因为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量的“人的需要”和蜕化为量的需要的纯粹生存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因此正是这些理论(或者这些理论的某些方面)表达了量的和纯粹生存的需要,或者诉诸那些最迅速地找到进入实践之中的理论。

70

我现在将概括总结一下上述所分析的四种实践类型同各种需要,以及表述这些需要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局部改革的理论和运动通常与那些已经得以清晰地表达、构想和阐述的需要相关联,其目的是满足或者引导这些需要。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理论和运动的功能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分流特定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不满,或者消除在这些不满中显现的社会失灵。它们总是诉诸生存的或者量的需要,但是只有在这些需要得以自发地或者以别的方式显现出来时。因此,如果这一类理论是孤立地存在,那么它将会与特定社会的防卫,以及与保持这一社会运转的实践有机地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形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思想库”的模式只是这一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遵从着商

品生产的结构。如果存在着对局部改革的理论的需求,那么它一定是功效性的需求:那也就是,它具有或者可以有满足这一理论要求的恰当的物质基础和力量手段。

普遍改革的理论同样与已经显现的和清晰地表达的手段方法相关联,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通过使这些需要得以普遍地表达,这些理论的运动和宣传活动——也就是,它们的特殊的对象化——为大多数人“提供”迄今为止在他们的生存中还不曾出现的需要,主要是为那些尚未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满和不平的人们提供。这些同样的对象化,正因为他们提出了改变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调节新的需要。然而,这些新的需要并没有构成一个整合的、有机的结构。理论通过阐发需要和阶级(或阶层)的生存之间的矛盾、需要和无法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动员者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理论所诉诸的需要首先是生存的需要, 71 只有在第二位上才是量的需要或者某些质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完全遵从商品生产的结构(“智囊团”在这一类运动中没有作用)。需求的增长和拓展倾向于或多或少地吸收理论,并且主要使之满足生存的和量的需要。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结构并没有被超越。这就是这一类运动与第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非常类同的原因所在。普遍改革的最初理念在局部改革的实施中消失于直接的行为背后。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曾是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典型历程。

建立在有产者和市民的现代分裂基础之上的政治革命理论和运动,在其对需要的阐述中也展示出内在的双重性。它们并不超越被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需要水平而通过运动来努力发动群众。对于群众的发动建立在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发展起来的需要结构的基础之上。同样,最主要的强调

点是对热情的调动,其所指向的目标是快速的和积极的转变。但是,被调动起来的热情(主要是群众维度上的热情)只能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热情。这一事实本身——呼唤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的需要和热情——是导致我们上述分析的典型进程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赢得政权之后群众运动的衰退。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政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市民精英集团。这一精英集团只有通过至少暂时地放弃满足自己方面的需要(即生存的和量的需要),才能保持自己的行动能力。这种牺牲——革命的苦行主义——可以激起最大的英雄行为,这些行为赢得人们的尊重。革命政治实践的对象化意味着改变需要的层次结构,但是这一改变具有它的不利方面。首先,双重标准并没有被克服,而且相反,它强化了有产者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其次,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内发展起来的需要体系——至少最终——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在市民之中情形也是如此,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需要的满足被投射到未来。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呼吁使一种量的需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方面,改变需要层次结构的目标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这就是对权力的需要。那就是精英集团的苦行主义无法克服异化,进而,尽管有其英雄主义,但事实上还依旧维持异化的原因所在。⁷²

所有一切都有助于表明,甚至政治革命运动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结构。理论又一次建立在现存的需要之上,并且如果它试图发展新的需要——甚至是量的需要——其尝试都像是在普遍改革的运动中那样是偶然的。这一理论也没有能力阐发一种所偏爱的整体结构。无论在群众运动还是在精英集团,都注定要遵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发展起来的需要,即使其形式经历

了变化。雅各宾意识形态是这一模式的显著的和经典的例子。这就是政治革命不可能在日常生活和群众的需要体系中引发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原因所在。

总体性社会革命运动既不可能以这种形式组织,也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获得它们的“胜利”。我对胜利一词加了引号,因为总体性革命运动的胜利不可能最后确定在某一明确的点上。它不是一个行动或者行动的组合,而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过程。甚至在更宽泛的尺度上,这一过程的载体是人民。在总体性革命运动中,人民本身在不断的对象化过程中改变他们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结构。在这里,理论不再“遵从”群众现存的需要,即那些已经形成或者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需要,它并不诉诸需要和生存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有机的——结构性的——群众运动本身之中发展和得以形成。

73 在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的意义上,革命是一种总体性社会革命,它假定或意味着要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结构,并从总体上克服资本主义的需要结构。

这可以解释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的实现是如此复杂的事情。总体性社会革命必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发展,其结构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分工的基础之上,并且因此,在这一社会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作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是通过市场作为一般的实践的中介而出现的。需要和价值的普遍重建不得不在一个虽然工人阶级在其中已经“感觉不快”,但异化依旧无所不在的社会中去实现;不得不在一个群众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不是生存的就是量的需要的社会中去实现。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政治革命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是它本身没有能力把这一彻底的新结构变成现实。马克思反复地,首先是通过“激进的需要”的概念,来尝试解决这一难题。工人阶级的需要是“激进的”,因为正是这一阶级

的需要原则上无法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得到满足：这一阶级的需要的满足必然要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结构，并相应地也要超越其需要结构。工人阶级只有同时解放全人类，只有激起旨在积极扬弃对私有财产和消除异化的社会动力，才能解放其自身。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激进的需要”并不是这一术语的日常意思上的那种固有的需要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激进需要不是现存的需要，并且不是现存的需要的发展，因为它们假定工人阶级已经发展起关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按照卢卡奇的术语，是“必备的意识”(imputed consciousness)]，并且按照这种意识来决定和行动。这样，与此类比，我们可以把“激进的需要”称为“必须具备的需要”(imputed needs)。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表明，缺少或者终止了资产阶级生存方式和资产阶级结构，这种“必备的意识”无法在群众中发展起来，相应地，“激进的需要”⁷⁴也无法发展起来。正是他们对这一情境的判断，而不是对马克思的原理的“编造”，导致工人阶级运动中各种诉诸现存的需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形成的或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的需要)，主要是生存的和量的需要的各种趋势。

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马克思关于总体性社会革命的纲领，正是基于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必须开启新的路径。这一道路必须是生存方式意义上的总体革命，通过这一革命形成的新的生存样式和新的需要结构，要渗透到群众的生存之中，从日常生活到最复杂的人类活动。只有自觉地在共同体中组织他们自己的人民，才能使这一新的需要结构得以形成。但是，如果“激进的需要”在这一阶段之前不是特有的需要，是否还存在着组织这样的共同体的真实基础？这样一种纲领不是乌托邦吗？

我相信，实现这样一种纲领的条件已经发展起来；这些

条件可以在不断增多的人们行为中加以解读。的确可以说,越来越大规模的人们感到不满足,在量的需要世界中茫然不知所措,因而自发地寻找一种量的需要在其中不再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最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许多青年团体,以及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员,放弃冰箱、汽车和他们父辈的声望;许多学生,同样是最优秀的学生,出于类似的理由而放弃了大学;新的家庭形式激增,取得了共同体的形式。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超越现存需要结构的需要的兴起。不管这些旨在遏止量的需要的质的需要的性质如何,它们表明,一种发展激进需要的共同体运动不再是,至少不再必然是一个乌托邦。

很显然,总体性社会革命——如果这一革命要想实现——并不否定局部改革、普遍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活动,而是把它们保存为自己的要素,当然,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75 培育拥有更广泛群众的共同体,在质的需要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使需要得以重建,就落到了社会主义运动身上。只有这样一种运动能够消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精英和群众、市民和有产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两重性。

在一个总体性社会革命中,理论和实践的结构关系将会是什么样?由于它将包括有机的共同体,即由于建立在个体自由选择之上而区别于旧式共同体的共同体,因此,它不再是理论和实践会面的“市场”。那将是共同体自身——它们的热情和需要——去生产理论,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深刻地或不够深刻地、一致地或不够一致地表达这些热情和这些需要,并且,共同体自身通过它们自己行为的调节而持续地控制和修正这一理论,在其中,理论家的活动将构成一个组成部分。理论将从日常实践中有机地产生,这显然并不意味

着理论不能够修正或控制生产它的实践。但是,这将不再简单是理论把自己的影响施加到实践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共同体的实践和相应的理论影响其他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因而,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问题本身——如我们上述所言,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问题——就将失去其合法性。

五、妇女和工作： 走入死胡同的解放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在整个进程中,以及在几乎每一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男性和女性间的不平等;然而,只有在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事实才真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并成为社会运动的基础。这里,我只谈促成“妇女问题”发展的许多复杂因素中的两个主要因素。

一个因素是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伴随着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把重点放在了追求平等上——至少是正规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平等,并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信条。然而,尽管妇女地位的某些传统的方面在新的、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背景下成为社会的反常现象,但是它们仍然存在。

第二个因素是,随着工业化的成长,妇女的经济角色发生了转变。以前,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里,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又是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男人和妇女在家庭的范围内一起生产物品,主要是为了家庭内部的消费,也为了出售或交换。例如,妇女除了作为家庭主妇织布外,还做蜡烛,帮助饲养家畜,等等。尽管妇女的劳动不像男人的劳动价值那么高,但是尽管如此,她是一个经济的生产者,并享

受着一些那个地位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当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和专业化程度增加之时——以城镇化运动、行会的成长、商业企业和强大的商业阶层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工业化为特征，所有的这些都逐渐转变。商品的生产以前主要发生在家庭圈子内，现在移到了家庭外部，进入了工厂和车间。男人也走出家庭，继续作为直接的经济生产者。然而，妇女则保持落后的状态，不再作为经济的生产者，而是作为孩子们的喂养者和抚养者，做一些家庭琐事。这意味着，现存的性的二元性呈现了一种更多的经济偏见，而且这种偏见的表现是妇女在经济上彻底地依赖“养家糊口的”男性这一具体的事实。

主要因为社会对妇女的不公平以这种强烈的经济独立为基础，所以，在19世纪兴起的为妇女解放而战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仅要求政治和法律的平等，而且要求工作的权利。这种要求，一方面与迅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对廉价、无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一致，另一方面也与最贫穷家庭补充不充足的家庭收入有关。

然而，在妇女运动看来，妇女工作的权利不只是一个经济解放的问题，而且是能使妇女实践人类选择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那些受马克思理论鼓舞的运动特别强调了这一要求，因为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保证人类特性发展和实现的基本方式。

（一）僵局

无论如何，就工作的事情而言，发达和半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妇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这些是这里正在讨论的问题）。

78 一般说来,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目前的形式平等——政治的和法律的平等——而言,为解放而战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尽管在几乎每一个国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未解决问题和法律上支持的不平等。对雇员的统计数据显示,一直以来妇女运动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毫无疑问,今天比以往来说,更多的妇女在工作,更多的妇女在经济和公众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更多的妇女在接受教育。

尽管如此,这个领域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数量的增加,正如我们从相关数据的粗略分析中所看到的,它不能显示妇女状况的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它们甚至不能给我们不远的将来不公平问题将得到解决的希望。

使这种形式变得更糟的是,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妇女组织,但是为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强度相对于上世纪末和这个世纪早期来说,已经大大降低。看起来,绝大多数妇女接受了目前的远离平等的状况,或许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可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妇女保持着一直以来她们在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的工具性的地位:她们是保证补充人口和抚养孩子的工具,是服务于家庭需要和使男人性满足的工具,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她们是满足国民经济多变的、对低级劳动力的需要的工具。

我必须指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目前有关妇女解放的矛盾和困境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尽管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事实,但是国家已经在各种领域(托儿所、幼儿园和寄宿机构,它们由国家或企事业单位支持;保护工作妈妈利益的法律;等等)采取措施;如果使效率最大化的努力和保证有一个更人性和更

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努力能在这些国家更紧密地协调起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为充分的解放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现今,在第三世界之外,大约每三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是⁷⁹带薪受雇的。除了在某些没有多少工作机会的传统农业区,未婚妇女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则。在离开学校到结婚的这段时间里,只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的那种妇女正在逐渐消失。同样地,在世界各地,结婚并有家庭的妇女中工作妇女的比例也在增加。然而,当我们审视妇女劳动力的职业和雇佣结构时,这种普遍有利的情景发生了值得注意的转变。

相关数据清楚地显示,工作妇女与男性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反而被认为是一个不够资格的、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她们普遍处在恶劣的条件下,做着最不重要的工作。因此,根据1960年的数字统计,在匈牙利所有雇佣人员中35%是妇女,而她们在所有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中只占有20%的比例,仅占技术工人的15%。然而,56%的低级管理人员和商业雇员,43%的半技术工人和42%的无技术工人都是妇女。

与妇女普遍较低级的工作身份相连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经常只有在一些社会声望较低的领域和职业中,她们才做一些需要具有高级训练背景的工作。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两个显著的方面。第一个是这样一种倾向——这几乎在所有国家都能被观察到——对于某种具有高声望和高收入的职业,只要妇女接管它们,这种职业的声望就会极大下降、收入也会相对减少。第二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的必然结果:只有由于某种社会和经济过程,当某种职业的声望开始下降、收入相对减少之时,妇女才能大量地进入这些行业。例如,这是教育行业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且在一些国家,与药店、医疗实践的某种分支相关联的行业也能看到相似的倾向。

80 甚至在这些行业中,工作妇女的总人数与处于责任岗位的妇女人数之间存在严重的差异。在美国,80%的小学教师是妇女,然而只有50%的小学由女校长管理;只有9%的中学校长是女校长。在波兰,在普通学校教书的妇女中有10%承担领导的职责,而男性教师中则有40%承当领导职责。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妇女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男性;这种情形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被加强,即与男性做同样工作的妇女经常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报酬。这些日子人们所听到的那种认为妇女不能胜任那种要求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工作,以及要求具有做出决策和制定方向的能力的工作的歧视越来越少了——尽管在一些地方这种论调仍然存在。人们更可能听到这样的争论,即妇女不是一个稳定的和可靠的劳动力,因为她们的角色是作为具有家庭责任的生养孩子者,这不允许她们像男人一样把更多的思想和精力投入到她们的工作中;因此,人们一直争论,从实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她们的工作不能与男人的工作价值相同。

不可否认,从目前的情形看,这种观点有一些道理。对它更多的支持就是广泛传播的大众的态度,即认为所有的妇女,从她们的生理特征上看,不管她们的个人才能和兴趣怎么样,她们都注定只适合一种角色,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角色必然使她们没有能力去实现任何其他需要精力的社会角色。

(二) 妇女的“第二个班”

这些事实和观点引发了众所周知的“第二个班”问题——妇女在办公室或工厂上第一个班,然后在家上第二个

班,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等被特别视作属于她的日常琐事。正是这个目前无法解决的两个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妇女解放运动目前还处在停滞状态;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它背弃了传统女权主义运动的较高期望。⁸¹

让我们思考一些最近的事实和数据,它们显示出做那些家庭琐事需要消耗多长时间。米达尔(Gunnar Myrdal)^①和克莱因(Lawrence Klein)^②引用的一些计算数据显示,整个瑞典企业每年仅仅工作12亿9000万小时,与此同时每年花费在购物、准备三餐和洗涮上就需要23亿4000万小时。

表1 家庭中每天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

国家	男性			工作妇女			未工作妇女		
	结婚	未结婚	平均	结婚	未结婚	平均	结婚	未结婚	平均
比利时	0.6	0.4	0.6	3.3	1.5	2.7	6.0	3.4	5.6
捷克斯洛伐克	1.5	1.1	1.5	4.3	3.0	4.4	6.1	4.6	5.8
法国	1.2	0.9	1.2	3.7	2.4	3.1	5.8	2.5	5.5
联邦德国	1.1	0.8	1.1	4.5	2.3	3.6	6.3	4.6	6.0
匈牙利	1.5	0.8	1.3	4.3	2.4	3.8	8.0	5.4	7.7
波兰	1.2	0.4	1.0	3.6	2.1	3.0	6.4	4.0	5.9
苏联	1.1	0.7	1.0	3.5	2.4	3.1	6.3	3.4	4.7
美国	0.6	0.5	0.6	3.2	1.9	2.6	5.1	3.8	5.1

表1(依据维也纳社会研究院所做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显

① 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瑞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 著有《美国的困境: 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等, 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②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 1920—2013), 美国经济学家, 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人, 著有《凯恩斯革命》、《美国的一个计量经济模型》等, 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示了各国男性和妇女每天花费在家务上的平均时间。这些数据不包括花费在孩子或购物上的时间,那样将普遍增加这里所给的数据,就结婚的工作妇女来说,至少每天还要增加1小时。

根据传统女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家务职责应该被“社会化”——主要由社会,比如说私营或国营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机构来接管。人们认为,在所有家庭成员中更加公正地分配剩余的家庭琐事将容许妇女平等地在工作的世界中扮演她们的角色,并有充分的机会选择最好的,适合她们个性、兴趣和能力的的生活方式。这些希望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一点被表1中的数据所证实,也被日常经验所证明:无论是否结婚、是否有工作,所有的妇女与男性相比,仍然要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家庭琐事中。在数据中发现的额外的证据显示,一般说来,在大城市的妇女花在家庭琐事上的时间要比乡村妇女多得多;人们原本一直认为,可获得的服务越多、家用电器越多会导致与上述相反的情形。

可以认为,有两个因素在抑制家庭职责“社会化”达到理想的程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一个是经济因素:就家务劳动只是有限的机械化这一事实而言,随着工资的增长和广泛传播的工业化,相关的服务费用相对提高。因此,如果妇女,尤其是那些低资历和低收入的女性——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女性——想使用有偿服务(饭馆、洗衣房等)来代替她们自己在家庭中的劳动的话,那么她们自己的收入是不足以支付这些费用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女性们做的低收入的工作不允许她们把自己从家庭职责的任何重要部分中解脱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第二个班”的负担阻止她们做为了做更好报酬的工作而进行的提高资历的事情。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经济原因是不充分的;因为,在高收入阶层中,妻子在家庭中仍然做着与她自己不成比例的

数量的家务劳动，尽管很多已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能性已经可以减轻家务劳动。甚至在那些具有高资历的妇女中，很大一部分（国家与国家之间会发生变化）会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她们的职业，尤其是在孩子出生之后。除了养育子女外，似乎还牵涉另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因素。

家庭日常活动的表现和功能与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紧密相连。他们的生活是以家庭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围绕着高度个体化的活动——吃、放松等——来实现。缺乏人情味的、纯粹的功能性的关系会给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施加很大的压力，经常会有人格解体的危险。因此，通过目前对与此相连的任何功能的排除和通过对家庭个体的保护——这是以牺牲妇女为代价的，来自觉地抵制家庭被社会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很难用数据来证实，但是实际上对日常⁸³的观察也表明，这种抵制在许多社会阶层都是广泛存在的，这些阶层的成员几乎没有机会冲出家庭的樊篱，自由并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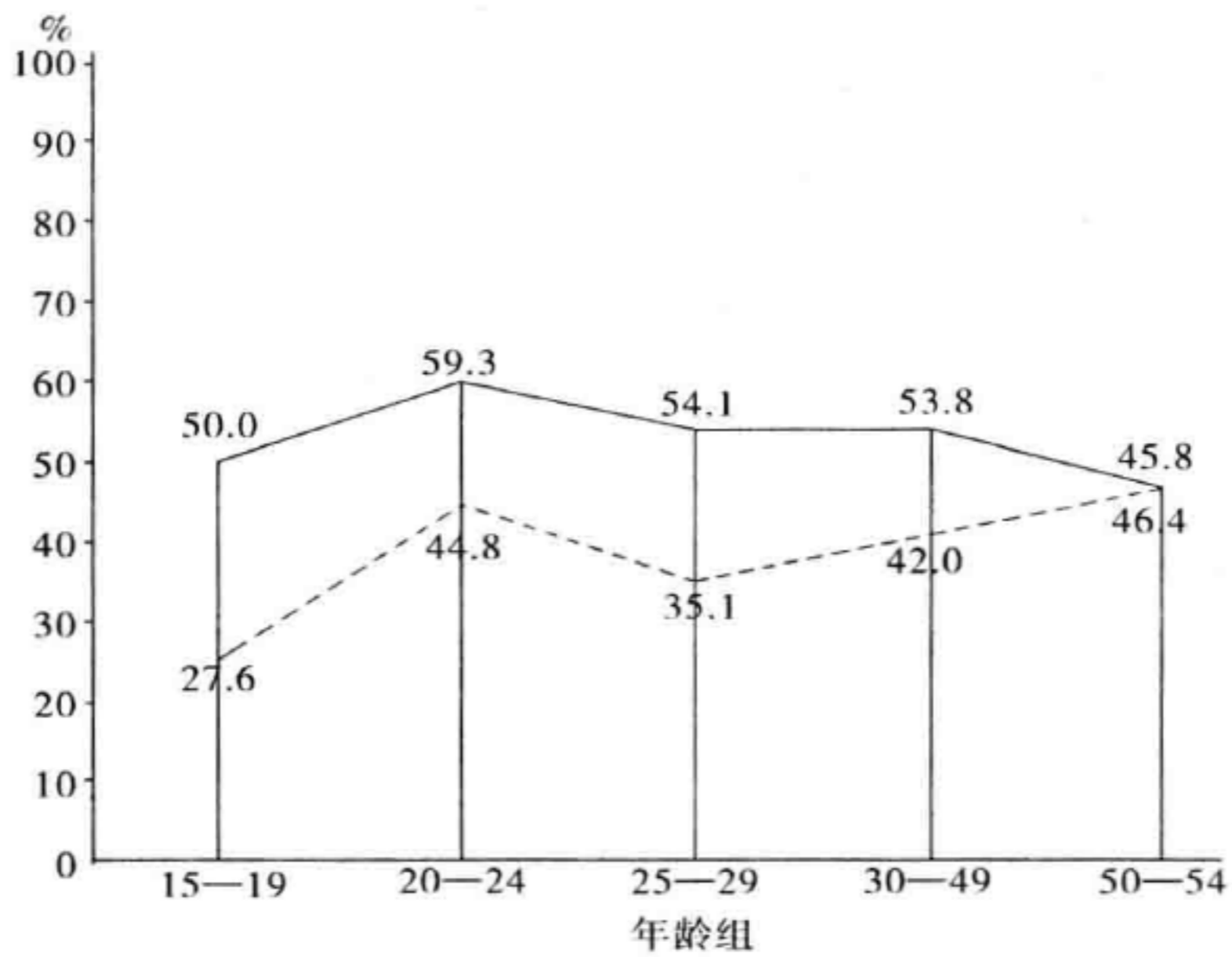
（三）调和家庭和工作：两种趋向

今天有可能区分出两种差别很大的、旨在调和现代妇女生活面临的交织的现实的趋向，其主要在于使妇女在保住家庭之外的工作的同时，继续延续作为家庭主妇，以及作为孩子们的生育者和养育者的传统。一种趋向以过去十年左右在美国建立的模式为代表，另一种趋向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每一种趋向都有优点和缺点，没有一个能为问题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

北美模式的特点是女孩儿一直工作到结婚，或到她第一个孩子出生，然后辞去她的工作；等到十年或二十年后她的

孩子长大的时候,她再重新工作。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的工作妇女直到她们退休一直工作,为了帮助她们,在生养孩子期间,她们获得来自国家和就职的企事业单位的各种帮助和迁就。

图表 2 显示出这两种模式如何不同地影响了工作妇女的比例。



图表 2 匈牙利(——)和美国(---)不同年龄群体工作妇女的比例

对于社会主义模式(以匈牙利为典型代表),工作妇女的比例在所有年龄群体都保持相对稳定,20 到 24 岁年龄群体出现从高峰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北美模式中 20 到 24 岁与 25 到 29 岁之间的工作妇女的比例出现相对急剧的下降,伴随着随后的年龄群体出现比例逐渐增长的趋势,因为当她们的孩子不再需要周密的照顾时,妇女们重新回到了有偿工作的岗位。

许多受到启蒙影响的妇女平等的支持者希望,北美趋向的传播能够提供明确的对妇女双班问题的解决方法。支持者指出,妇女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延长,而且一直以来

普通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已经出现极大的下降，因此，做一个全职妈妈仅仅占用当今妇女生活的15年时间。妇女或许有另外一个20年，来献身于她们的“第二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是她们以前受训或工作过的职业，也可以是一个不同的职业。⁸⁵

毋庸置疑，北美模式在今天的背景下确实有某些吸引人的特征，不只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肯定需要与专门的成人有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家庭提供要比最好的托儿所好得多。从妇女的角度看也有积极的价值：她们在家庭责任最重的时候被减轻了双重负担。

然而很明显，从家庭以外的有偿工作中停职15年或者更少一点时间，这自动地取消了妇女在这一领域与男人价值均等的资格，因为她们正是在生命中最有活力和最有生产力的时期，从工作中辞退下来。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快速发展，使得任何在日常实践中不能跟上步伐的人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因此，持续长时间地离开有偿工作岗位自然地造成了目前的状态，即资格要求不高和经常不太需要创造力、最枯燥和薪酬最低的工作都由妇女来做。

维持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并不暗示着人们可以持有那种天真的观点，认为妇女解放等同于两性间所有不同的废除，也不意味着同意那种认为独特的、有偿的工作是生命的一切和最终目标的“神话”。相反，接受这种情形是协调自己适应这样的观点，即妇女，因为她们的生理结构，天生地就必须总是比男性具有更少的选择。而且，只要作为个人独立的主要基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基础之一的——是有酬雇佣，那么结婚妇女对她们丈夫的传统的经济依赖的情形就会保持下去。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一种可接受的情形。妇女

在很长的时间里退到家庭的樊篱中,这极大地缩减了她们与家庭圈子之外的人们建立联系的机会;这里没有必要仔细考察⁸⁶其对妇女个性的否定性影响的细节。然而,这一事实同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家庭生活是由被排除在人类关系大圈子之外的妇女来组织的,她在很大程度上同社会的大部分割裂开来,因此经常不再对社会感兴趣,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一个狭窄而保守的性格。

可以说,对妇女兴趣范围的这种限制,在现代家庭生活的某种危机中,尤其是在两代人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只有适当的研究才能证明,妈妈长期在家的事实,尽管最初对儿童早期的发展有利,但很难说后来在青春期时不会付出代价。(相似地,“第二个班”的负担如此彻底地占用工作妇女的所有自由时间,以至于它形成了一种结果,妇女待在家里的时间更长。)

那么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可以说,在理论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趋向(这也更符合传统的解放观念)在更积极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使得有偿工作成为妇女生活的一个永久特征。然而,分析当今的实际形势时,我们又不能支持这种主张。

已经很明显,如今对大多数工作妇女来说,长久的工作与大量的家庭责任负担是相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花费在家庭职责上的时间要比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因为它们的技术发展水平和普遍的生活标准较低。尽管国家采取重要的、有意义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照顾孩子相连的财政服务来减轻这一负担,但是家庭负担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大多数的妇女因为纯粹的经济压力而工作,而且做一些低级的工作,那些工作常常是更加枯燥的,条件也比普通工作更加不好。

最近,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或许根据北美模式来塑造妇女的生活。例如,最近匈牙利已经提出,给予妇女在20周的全薪产假之后,离开工作岗位在家待到孩子⁸⁷3岁的权利。如果妇女继续生孩子,这段时间还可以延长,直到最小的孩子3岁。选择待在家里的妈妈在这段期间可以得到每个3岁以下的孩子每月600福林^①的补偿,而且国家保证当这些妈妈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她们将拥有与生孩子以前相似的工作,并且不损失任何权利。这些规则对那些做低收入且无技能工作的妇女特别有帮助,当然这主要是针对能够利用这些规则的妇女。对于那些妇女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只为经济——家庭责任要比普通妇女具有更大的负担。

尽管我们所提及的,与北美模式相关联的保留措施注定要实施,但是,这些措施仅在1967年开始生效,这样,想评估它们对妇女地位的长期影响仍然是不可能的。当然,长期的结果将受到社会本身经济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前文所述,可以说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达到了一种充满悖论的僵局,因为任何早期的方法都没有任何希望。

(四) 传统的角色

我们不应忘记,一直以来妇女希望作为平等的伙伴加入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传统上领导和更多的有事业心的角色属于男人。上面我已经讨论妇女解放目前停滞不前的主观因素,现在我想简单地指出传统态度的影响。

^① 匈牙利货币单位。——译者注

由于(改造一下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的话)我们不是出生于而是成长于男性或妇女的角色中,所以两性的心理和态度大部分是由文化模式和影响这一进程的价值所决定的。传统文化中反对妇女的偏见的陈规旧习对“妇女问题”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和持久的影响,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陈规旧习持续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确实使它们产生了自我证明和自我不灭的结果。

甚至在完全支持性平等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关于由妇女来承担生养孩子和保持家庭内部和谐的主要基础功能的传统观点,仍然支配着公众的观念。或许学校对男孩和女孩给予同等的教育是事实,但是由教育传递的价值体系暗含了对传统两性间劳动分工的支持。

文化的陈规旧习继续存在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方式,能够通过我们的一项研究结果表示出来,这项研究考察的是布达佩斯工人阶级区一个小学的高年级学生。被调查的学生大约14岁。在这项调查中,87%的女孩提到把结婚和养孩子作为她们的主要夙愿之一。而另一方面,男孩把生活中物质上的成功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只有18%的男孩提及把构成一个家庭作为其主要目标。

因此,并不奇怪,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大多数女孩的求知欲出现最明显的削减,因为她们的兴趣转向了其他方面。

(五) 新的建议

妇女的有机体服务于人类的再生产。然而,因此得出的唯一一件事是妇女享有生孩子的人类权利;而且因为这与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社会必须帮助妇女运用这种权利。

提供大量对工作妇女有益的特许权，例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这是帮助她们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尽管如此，不管这种特许有多么大方，它们最终的价值看起来让人怀疑，因为它们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妇女作为一支劳动力大军没有获得同等的价值。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社会不应该只是努力给工⁸⁹作妇女建立“补偿性的”权利。社会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创造普遍的条件以使大量的妇女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明显，这需要一种持续的、反对偏见的斗争，这种偏见阻碍了更多对家庭劳动的分享；但是斗争不仅仅要求这些。

首先，尽管有各种阻碍因素，社会也必须做出一种主要的财政努力，以提供一个更广泛的服务组织和机构网，来掌管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些服务的费用应该对所有妇女来说都足够低廉，无论她们的收入是多少，都能够利用它们。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存在，仅仅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准备在多大程度上集中自己的资源，以建立、保持和发展它们。

或许，以不同的方式使某些家务劳动“社会化”也是完全可能的。今日家务劳动的单调，以及与此相连的低效率和低声望，无疑都主要来源于这一事实，即家务劳动是一种不需受训练的、低技能的职业。难道提供一种训练，至少把一些家庭活动——例如照看孩子——转变成买卖或职业就不可能吗？这样，某些人既能照顾她们自己的家，同时也能为其他几个家庭做适当的工作。因此，这既为那些愿意在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妇女，也为那些想逃离家务劳动的妇女，创造了一些现实性的选择。

这些建议是极其有限的；即使它们能被成功地实施，结果也不过是妇女最终成为这个世界平等的成员，这离解放还

很远。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真正的妇女解放还能走多远。

因为,只要由所有人做的大多数工作在体力上是繁重的、无趣的和枯燥的,只要非人的社会机构无视人们的希望⁹⁰和个性,来调节各种工作并把它们分配给人们,妇女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因为每个人都没有获得解放。改述马克思的话,妇女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也就是说,只有存在着每个男人和妇女都有机会选择最适合他或她的个性、兴趣和能力的职业的环境,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六、共同体与个性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当前社会进步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否可以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这一点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促进个性发展的社会条件和鼓励个体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拓展他们知识结构的志向。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可能超越完全表现为“物”的消费社会的客观化的个体化，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人类价值和个体发展为目标共同体结构(communal structure)以什么方式能够形成，或者是否能够形成。

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的灭亡不仅仅是指生产力的解放和剥削制度的结束，而更意味着个体从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将保证一个真实的人类个性的成长与发展。

这种思考方式不可避免地那种关于共同体与个体、集体性与个性之间通常的分离的观点相联系。马克思意义上个性的成长不能与社会群体的成长分割开来，这种群体的功能如同共同体的功能，能够把个体的日常活动和较大的社会

单位联系起来,因此,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个体的特性。^①

- 92 共同体纽带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对于一种和谐的、多面的和真实的个性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场所。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关心他者或者站在他人的对立面的个体生活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生活状态仅仅存在于像共同体一样发挥作用的社会群体中。

当然,实现共同体功能的发挥不仅要靠机构、组织和小群体,而且要依赖如民族、社会阶层等宏观结构单位,以及它们的兴趣、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然而,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些,首先因为它们大大超出了这篇论文的研究范围,其次因为从我们的观点看,作为一种规则,这种共同体的经验也由较小的群体来传播,在那里直接的个人联系起着较大的作用。

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小群体都能真正地实现共同体的功能,因为它们经常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依赖参与者的有意识的选择),而且,依据它们自己的本性,它们更多地强化了特性的形成。

从共同体的功能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群体:

(1)人道化的共同体,它们在前面所讲的意义上促进成员的个性成长,能够实现超越特性的那种进步,这导致了人的类存在的实现。

(2)集体化共同体,它们服务于进步的目标,但是因为它们使个体完全服从于社会,所以不能促进个性的发展。

(3)非人化的共同体,它们把成员封闭和整合到那种其

^① 术语“特性”(particularity)和“个性”(individuality)的使用参见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美学》和阿格妮丝·赫勒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日常生活的革命》(本书第三篇)。

目标与人类的类存在的进步相反的共同体之中,因此产生了扭曲的个体。

(4)准共同体,它们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服务于成员的特性。

(5)补偿性的共同体,它们在某些边缘领域提供一些公社的经验,并常常联系着一种业余爱好。

所有这些类别都是分析出来的,在现实中永远不会以纯粹的状态显现。个人的社会群体不需要对所有成员履行同样的功能,而且它们最后都能改变它们的特征。

这篇文章考察的是劳动世界中不同群体的共同体功能。⁹³这从根本上使主题变窄,并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代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领域。我们要牢记这一事实,即建立在家庭和邻里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共同体的结构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性,并极大地限制了私人生活,而劳动场所的组织机构却提供了共同体成长的主要框架。这绝不是想限制那些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些实践经验努力在私人领域创造新的共同体和新的生活方式,例如通过产生新的家庭类型和邻里关系。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西德的公社或比约恩·塞尔登(Bjorn Seldens)依据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选择而创造的“大家庭”(large families)的倡议^①。阿格妮丝·赫勒和米哈伊·瓦伊达在《共产主义和家庭》一文中^②讨论了发生在匈牙利的同样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生活的原子化,人用以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方式一般必须在工作的世界中寻找,它不仅直接作为人们劳动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还存在于与此相连的自我管理的和社会控制的领域。除此之外,人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

^① 见 *Neues Forum*, 1969.

^② 见本书第一篇。——译者注

工作上,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已经显示,工作的性质和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的方式和志向。

目前,在劳动场所的共同体生活所面临的问题与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雇佣劳动者之中形成的集体紧密相连,这种集体具有重大意义的特点是把个人吸纳到集体性的公社规范当中。这在根本上与“自然地给定的”共同体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不同,这是前行的重要一步,主要因为在同等程度上它不局限于来自于一种社会“身份”或地位的特性。虽然如此,这种集体性仍然没有给个性的发展多少机会。

94 现代的发展——在工业社会——把这种集体主义推入了幕后。劳动场所等级结构的增强不仅使劳动力分成不同层次,而且同时扩展了个性发展的机会。结果,人们越来越关注与社会地位的升降流动相关的个人目标。

所有这些都一个框架内发生,在那里,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增长扩展了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的确如此,这种自由选择甚至表现为不是对真实的商品的选择,而是对消费品的品牌的选择。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所说:“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个性的证实,而是堕落的表现,它们产生一种明显的个性,它们的存在并不与活动和生产相连,而是在完成的商品中选择。”

这主要涉及消费社会,它假定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生活标准和充足的消费商品供应的状况。在一个已经结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一旦生活标准开始上升,就说明了这是一种最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它的影响都因为缺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新的生活方式而被增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没有积累这种经验,对这些经

验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对未来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们必须从对事物的原初状态进行考察来开始我们的分析。关于集体的特殊的神话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几年就已经形成,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得以形成,主要涉及工作场所的结构。据此,个人的兴趣和个人个性的成长必须服从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和企事业单位等的兴趣,这经常被抽象地表现出来。因此,在那时我们称之为“集体化的”共同体的功能占主导地位。有两种历史环境促成了这一情形的发生。一种是社会主义执政下困难的状况。这自然会使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保卫新制度上,以反对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并与食物短缺做斗争,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在于,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必然使个人化退居幕后,并抑制大规模的个人化的出现。第二种环境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个人化作为一个大众现象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因为革命前的俄国,不发达的社会条件占统治地位,原始的集体主义仍然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存在,所以个人化不可能发展。那里所形成的模式被欧洲国家,包括一些个人化已经到达相当高的程度的国家所采纳,只是对它做了轻微改动。⁹⁵

因此,集体化原则以一种不仅不能促进个人个性的发展,反而作为公众利益的对立面的形式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人的整体阐发类型已经转变成一个原则。

这些是第二种类型的集体化共同体成长的所有动因,而且这不仅体现在工作领域。革命后苏联直接发展起来的、依据“贫穷的平等”原则建立的家庭公社在这方面是很令人关注的。这在其他国家的改革早期阶段也重复发生。一般来说,这种共同体在最初的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一致,在那里统一化趋向是一种规则。社会

还没有成为等级的结构,因为许多因素都阻碍这种可能的趋向。

一旦国家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转变。这时,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社会,个体化和个人的兴趣在经济和实际生活中逐渐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它们的重要性在一段时间内被意识形态所否认。因此,“集体化”的共同体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而且事实上它们倒退了,等级的和官僚的机构代替了它们的地位,作为“准共同体”而发挥作用。匈牙利的有代表性的发展是把由左翼决定的并承诺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学运动转变到学生宿舍。

96 相似的“进步”也在其他许多领域发生,因此,日常的事实和称颂集体主义的态度之间的矛盾一直在增长。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幻象,它设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灭亡在本质上为社会的一体化和公社成员的成长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可以说,这将“自动地”把工作场所机构转变为真实的共同体。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促进个性成长的共同体已经存在。在这方面,无论缺乏什么,只要他们关注到了,他们都把这些问题归因于主观的缺点。然而,日常生活的事实并没有证实这一点,相反,它们证明了通过工作场所的组织机构来发展共同体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是有客观原因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终结并没有给工人集体带来任何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力。它保留了经济组织的各种行政机器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仍然是雇佣劳动,实际上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行政机构。这是集体性企业准共同体本质的原因,因为它的基础是个人的偶然的事情,即买卖劳动力,而不是自由联合的事情。因此,个别工人的利益是通过出卖劳动力的优势而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机构的影响性的

功能表达出来。劳动力的高成交率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描述了这一情况。

匈牙利新的管理体制让人们看到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方面,集体主义的幻象因为不可能十分清楚地直接生产社会需求而被驳倒,因而新体制对那种宣称我们的社会已经克服了雇佣劳动的主张提出一种实际的批评。同时,它提供了有意识地塑造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这将允许这种社会结构的形成,从而促进真正的集体性的成长,至少是在重要的领域。

同时,这种改革动员了某种个人化倾向,这种个人化在⁹⁷动态的经济发展中,也在拓展个人成长的真正机会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个人化的一方面的表现是,认为集体主义已经过时,彻底放弃了集体主义原则,并希望用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和指向每个人自身幸福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它。这种态度经常与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形成的管理上的技术官僚影响的意识形态相连,它认为集体主义是经济活力和经济最优化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这是一个事实,最近的研究显示工人的参与增加了这种经济活力性能)。

当然,很可能,集体主义态度会发现它们自己在特定的时期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与最优化(optimisation)的任务相对立,而且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必须被给予优先权。尽管从长远来看,承诺社会主义要求这种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保证个人个性的成长和服务于经济活力的共同体的发展。

前资本主义和早期工人阶级的传统共同体所具有的整体和垄断的特点在这些共同体中不再发生,也不再严格限制个性发展,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改变它们。积极地参与形成共同体的关系和规范,取代了人们单方面地屈从于公社的规范,这在原始共同体中是一种规则。同时,我们在文章的开

篇提及的人道化的公社功能,不能仅限于生产活动,而应以某种形式渗透生活的所有方面。

问题是产生这种人道化共同体的运动是否可能出现在工作的领域。这不仅引起微观结构(例如工作机构)问题,而且导致宏观结构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在何种程度上超越旧有形式和框架的工作场所共同体问题才能被决定。

98 为了强化这种趋势,并允许它们成为具有新质的东西,社会主义企业机构必须被进行重新审查,尤其是对雇佣劳动体制的本质。目前,国家,甚至合作企业和组织仅仅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就任凭行政机器随意使用它们。为了反对这一点,在技术条件允许的程度上,人们可以以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联合的群体,给他们提供生产手段,并依据工人提供的劳动来决定他们的收入。行政机器的存在主要服务于这种联合体的利益。

现代商业管理,直接回到了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①主义,理想化地把劳动过程分成几个单元,然后由管理专家重新组合,不需要原来做这些工作的人的参与。最近,人们对最初的泰勒原则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些改变没有影响原则的本质,它们只是使垄断松动的策略。无论它们的实际使用是什么样子,它们都不能改变工人们只是做他人交给的片面的任务这一点:不仅他们工作的对象属于别人,而且实现部分工作过程的方式也不是由真正完成工作的人来决定的。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②对泰勒主义提出了尖锐的、合理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提出根本的变化;他努

①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代表作为《科学管理原理》。——译者注

② 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 1880—1949),美国管理学家,行为科学的奠基人,代表作为《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译者注

力要做的就是积累在微观结构水平上生产共同体的经验,改变的不是条件而是管理的方法。泰勒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有影响。20世纪在技术水平的背景下,看起来只有科学的管理体制才能显示出理性的力量。这些方法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利益的增加。但是没有一个人从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观点去批评这些方法。

这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实际结果,并不是要返回到先于“科学的”劳动管理的原始的集体主义精神,而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公社形式的成长。尽管如此,人们必须牢记,传统的共同体在某些生产领域仍然存在,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与⁹⁹关于新的集体主义胚胎的幻想相联系。在匈牙利像挖掘这样的工作领域,相当普遍地保留了那种原始的集体主义的组织形式,在那里工人集体只是为离家的工人提供一种社会化的形式。这些形式经常显示像家庭共同体一样的规范,这增加了他们紧密联系的特征。这种共同体直到今日仍然存在,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像这样要求工人离家的工作类型有油田、国家农场和森林的季节性劳动,当然也有工地施工。

我们曾有机会调查一个工作在跨多瑙河地区(Transdanubia)^①的一个拥有20多个工人的国营农场的群体,这些人都来自同一个叫作跨蒂萨(Trans-Tisza)的村庄。就群体的内部结构来说,基本上都是由性质相同的人组成,而且群体具有严格的家长式作风。组长亲自组织群体成员,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用行政手段。他的权力的基础是一套强有力的集体主义规范,这种规范在许多方面都是非人的、严格的,排除了任何个性的展示。然而,在关系紧密

^① 跨多瑙河地区(Transdanubia)是一个地理术语,一个传统的匈牙利地区,指的是位于多瑙河(Danube)和匈牙利西部疆域之间的匈牙利地区。字面意思是跨越多瑙河。——译者注

的环境下坚持这些规范,给群体成员提供了安全感,并保护他们抵制各种令人不满意的外面世界的影响。群体规范决定了他们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和娱乐。他们的工资被节省下来给他们的家庭,他们一起做饭,食物很简单也很传统,他们彼此之间也很热情。没有任何政党和工会组织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在大多数地方,新的组织规则已经代替了这种传统的组织规范,这些新原则不但没有为公社经验提供任何替代品,而且分化了工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使工人听任行政机关的摆布:

100 “我喜欢以我们过去习惯的方式工作”,一个劳动者说,“常常8或10人一起工作。不像今年这么大的群体”。另一个说:“让我不安的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哪些人一起工作,他们派一个人来,你必须一直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不对的,这对塑造一个好的集体主义会产生影响。”

问题是这一梦想是否可以通过创造能够超越原始共同体的新形式而实现,新的人道化共同体既不保存旧有的生活方式,也不阻碍个人寻求发展。另一个问题是这种组织形式是否适合现代企业。

然而,经过我们仔细地研究和考察,几乎所有的现代劳动管理都包含这种组织类型(从现在起,我们将称它为企业协会)的某种尝试。

一种尝试是由一组电话线修理工组成的。这会引来有关目前讨论的组织形式的一系列冲突的观点。这种工作类型要求公社式的生活。一组8到10个成员,离开家整整一周,并暂时住在宿舍里。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是受别人支配的,到达和离开目的地的交通工具是由企业提供的。这里

有一些工作规范,根据个人的表现分发报酬,但是不能超过平均工资。群体应当作为一个组织来承担工作,负责工人的食物和居所,并以他们自己的节奏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这种选择看起来很明显。因此,接受全部的工作将代替持续的监管和指导。

这种选择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利的,因为这将使企业的导向简单化,而且缓和了劳动力的短缺问题。但是工会严重反对这种做法。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忘记工人的报酬很低,他们将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们的劳动力被剥削,他们将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并增大工作强度。另一些人认为,通过这样的工作选择,人们可以用2到3天完成一周的工作。同时,他们反对这种观点,工人应该得到钱而不是食物和居所,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将包含一种标准上的降低。

一些反对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但是它们没有触及变革的本质,即使这种形式的否定方面被减少,这种剥削也仍然存在。首先,人们或许会说,其他类型的劳动力组织形式也是以健康的损害来剥削劳动力的,或许在官方的工作时间不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在这之外仍然存在。真正的休闲概念在第一代工人中还没有形成,这不仅因为物质上的原因。工作以外的时间不能做任何事情,要满足纯粹的生理要求;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尤其是那些经济贫穷和有一些特殊需要的人群。我们始终要牢记,这些年不同的消费需求在匈牙利出现相当大程度的增长。 101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经常努力拓展自己的工作地点,却想尽可能地花费少的能量,在正常的工作之外努力干活(经常以他们的健康为代价)以增加他们的收入。非官方的劳动力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的事实也是一个促成因素。例如,一个建筑工人,在国营企业工作一小时,得到的报酬是

12 到 13 福林,而小商人却给 25 到 30 福林。因此,可获得的消费品与国家和社会收入之间的矛盾就会出现,这不仅引起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现象,而且导致了各种腐败。这种联合体模式将鼓励这种情况,允许增加工作强度,但是在正常的劳动时间内。尽管这本质上并不能阻碍自我剥削,但是看起来,在这方面的结果要比工会建议的控制规则好得多。然而,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需要普遍的变化,它可以为人们提供其他的对象,而不仅仅是获得世俗的商品。

通过研究塞克萨德(Szekszard)国营农场,我们能观察到多年经验的结果,也可以从费伦茨·丰萨波(Ferenc Funszabo)所做的现场研究中获益。第一组被组织到耕地上工作,他们在那儿仍然工作得非常成功。适于耕作土地的 1700 到 102 2400 个牛轭被委托给 11 到 14 个人。不仅土地而且连必要的机器和化学品也供他们使用。管理只是控制对先前决定的行动的执行。原则上,最近也在实践上,小组自己决定做什么工作、在哪儿和由谁来做,以及谁离开了或谁没来,什么时间离开的。工作过程不能由管理来计量或标准化:仅有的标准就是生产的数量。他们根据预先决定的费用产生的价值来得到报酬。这保障了最低的收入。成员们自己决定如何在他们组的成员中分配收入。原则是根据每个人工作的天数按比例平等地分配。既不考虑专业的技能、力量,也不考虑职位和资历。这并没有引起特殊的问题,因为这些群体是由大致相同的人员组成。合同草案每年重新谈判。

第一个复合型的种植队在 1964 年建立,第二年又建了两个。到 1967 年,这三个队耕作了整个种植区的四分之三的面积。这种劳动力组织形式在葡萄园和动物饲养业也存在,而且正开始传播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的国营农场,它们从这种类型的劳动组织中获得利益。

在工业领域发展这种形式存在较大的困难,因为工业劳动分工较细,而且生产过程被分成许多部分。结果,这种联合体发展缓慢。伴随着消费社会提供给人们愈来愈多的选择,城市生活较大的个体化和工业本身的内部结构是产生这种困难的两个主要来源。除了劳动分工以外,最有特色的就是强烈的等级化。尽管这种联合体没有达到我们以上讨论的程度,但是它们仍然是建立公社形式的努力。最基本的形式是用群体表现的报酬代替了个人表现的报酬。这创造了群体的利益并满足了工作场所共同体的发展。

在工业发展研究中,条件要更好些,在那儿,工作的本质要求人们进行大量的技能合作。通过许多方式形成的工作队类似于我们称之为企业联合体的组织。在这一领域实行的每项研究计划都显示了不断的尝试,人们要在实验室和相似的地方自由地组建团队,代替那种以前以官僚的方式建立的团队,并尝试把它们从企业的官僚作风中解放出来。这种趋势的增强是促成研究效率增强和发展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被所做的调查和实践经验所证实。所有这些让我们得出结论,企业联合体或许会很好地适应较高发展的劳动组织类型。尽管事实上,这些实验都不是由任何致力于集体主义态度的组织类型来促成,而是由各种企业利益,比如劳动力短缺和缺乏利润(和因此缺乏效率)来促进的。事实上,这也从实践的观点证实了时间使它们成熟这一点,在那里,工作的阶级类型和劳动组织将逐渐地被正在增长的各种工人组织类型所代替。

当各种社会主义团队形成,问题就以更加扩大的方式表现出来。起初,人们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的社会一直以来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反对以前的个人竞争,所以现在把重点放到了集体企业身上,这种重点也被理解为

覆盖了工作之外的生活。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对这些团队的记录研究显示,这些尝试存在大量的形式上的结果,它们并没有成功地产生真正的运动,甚至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团队也经常隐藏准共同体的特征。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的团队中,或者在与这个主题针锋相对的组织中,这些尝试的主要目标不是为工人具有真实内容、可以自由地选择或接受的集体主义联合体创造机会,而是为了尽可能地包括大量的工人,即使是纯形式上的。这经常与直接的经济刺激相联系:这特别令人沮丧,因为通常认为,最初的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团队中,没有任何物质鼓励就能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和更快乐的生活方式。

促使社会主义团队纯形式化的是这一事实,即它们明显地被整合到企业的等级体系中。工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指示清楚地指出“竞争社会主义团队职位的领导人将由其成员选择”,但是调查显示,作为一个规则,他们都已经是在较高水平上被选出的副职,即使他们并没有彻底地解除体力劳动的负担,但是他们本身已经在行政等级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在这次活动中得到服务费。

被包含在官方结构中这一事实,其本身是增强团队的联合的和共同的特征的充分的障碍。我们称之为人道化共同体的组织预先假定了某种自发性:没有它,运动的特点就不能被保持,它必然会被正式化、被转变成一个组织。

根据我们的解释,一场运动是为了超越目前的事情状态而为进步所做的持续的斗争。为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更新,参与者应承担的责任程度不是由他们的特殊兴趣所决定,而是由他们正在成长中的集体来决定。因此,他们的运动区域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能来自于外部。

这种人道化共同体必然与真正的社会控制运动相联系。

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它不能是,而且必须不能成为一个组织,因为它的目标不是掌握行政权,而是把它放到大众的控制下。因此,目标不是建立某种新的状态,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控制的动态的增长过程,产生一系列社会条件,在那里,人们持续地,不只是在偶尔的革命形势的过程中参与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并决定自己的命运。

尽管我们考察的主要是工作场所的人道化共同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所有有利于集体化的进程都不能脱离社会本身,也不能在一个孤立的企业单位实现,甚至不能在经济的一个部门来实现。它们是影响社会改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有效地得以实施。

七、自由时间与劳动分工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会发现两个可能扩展人类自主性的概念轮廓。其中每个概念都找到了自己的大批拥趸者，它们仍然活跃于如今的社会科学思想中。根据第一个概念，自由的王国只能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假定劳动分工所施加的影响限制)达到。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以个体能够在不断扩展的范围内利用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方式来增加和使用自由时间，以便使个体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发展可能性之间的差距不断地缩小。根据第二个概念，根本的任务是劳动的人道化。因此，社会必要劳动领域本身必须做出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要摆脱劳动分工所产生的限制，然后再发展所需的真正的社会控制形式。如此才能创建使每个人得以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想证明的事情之一是，自由时间的世界与工作的世界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仅在一个领域，而不触及另外一个领域就做出意义深远的变革是不可能的。

经验表明，将“自由王国”的达成完全限制在工作之外

的时间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除“正式”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不会完全地被那些可能有助于实现个体及其个性的活动填满,而是可能被用作以各种方式赚钱。因此在自由时间里¹⁰⁷进行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都是生产组织的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它们既受到劳动分工也受到现有工作机构的负面影响。已经从其幻想中解脱出来的社会学研究和经验,同样证明了“闲暇时间”的增加,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改变除了人们既定之外的生活方式,充其量,它可以为拓展现存的活动,以及引进新的活动而提供机会,这将有助于在既定生活方式内满足最迫切需要。第二个概念同样遇到了巨大障碍。劳动分工将人束缚在特定的职业或专业上,通常直至全部生活。而且,这些职业通常是由劳动者本人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决定的,这些限制很少能为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可能性。为了发现走出困境的方式,我们需要分析横亘在上面提及的两个概念之前的陷阱。

(一) 用于赚钱的自由时间

如果我们从自由时间的增加所带来的希望开始着手,一个最明显的因素之一(其本身,一个无条件的积极因素)就是“正式地”摆脱工作的时间总量在工业发达国家大幅地增长。这可能很容易引导我们得出结论,真正的闲暇时间正在以同样的比率倍增。然而,在实践中,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在正式工作时间之外用于赚钱而花费的时间也大幅上升。[这已被波兰社会学家达内茨基(J. Danecki)^①的著作详细地记录在案,它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

^① J. Danecki, *Jednosc podzielonego czasu (The Unity of Divided Time)*, Warsaw: 1970.

数据。有关英国工人的详细证据在茨威格(F. Zweig)^①所指导的研究项目中有所体现。]目前,这主要是男人的事实,由于承担相对而言繁重的家庭负担,女人确实几乎没有任何闲暇时间。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即使正式的工作时间不断地减少,因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机械化往往只是让家务更轻松,而不是缩短完成它所需的时间。除了这点之外,文化需求的总体水平的上升却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富拉斯蒂埃(Fourastie)^②预测,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西方的强制性工作时间将被减少到30个小时,但是干家务所需的时间将是40—80个小时,这取决于家中需要照顾的儿童数量。与此同时,这些家务责任也是经济压力下的活动(并不总是赚钱,但无论如何也将节省它),我们所说的有关被迫的劳动分工中的每件事也同样适用于她们,而不管涉及到谁。(当然,这是不正确的,尤其对自由选择此类活动的那些人。)

我们很难准确地为“正式”工作之外花在赚钱上的时间定级。这里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兼职或加班的活动,通过分配或者家务,到人们以补充收入,或者至少是物质储蓄的可能性为动机的职业。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能更愿意通过正式工作时间之外的赚钱活动,而不是他们的基本职业来证明自身,如果做这个工作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他们一般会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这通常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状况。即使我们提供不了与此有关的汇总数据,各种研究项目的结论以及大量的详细信息也可以表明,随着正式工作时间的减少,在上文所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花费在“赚钱”上的所谓自由时间的部分会

① F. Zweig, *The Worker in Affluent Society*, London: p. 253.

② F. Zweig, *The Worker in Affluent Society*, London: p. 272.

有所增加(匈牙利情况也是如此)。最近的有关城市工业工资与工资收入者度过他们闲暇时间的方式的社会调查表明,布达佩斯重工业区 17% 的工人,县级城镇 15% 的工人,以及偏远地区城镇的 24% 的工人的加班时间已上升。男性技工的 18% 以及领导地位的 26% 的专业人士经常拥有**固定的兼** 109
职工作,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在这两个方面,有**不固定的补充**就业。带薪休假的方式也应该是情景的一部分。有相当部分的工人利用带薪假期工作,或者根本就不去度自己的年假(或只是部分地度假),这或许不是一个罕见的事例。

结果,没有多少时间剩下来(尤其是如果我们也考虑社会财富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同时相应地扩大对个人开放的可能范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没有完全被直接的生产性工作所吞没,而是(保持)享受,保持休闲,以致它提供了自由活动与发展的范围……,它不能被决定——如劳动那样——通过必须被执行的外部目标而施以强迫,执行的是‘自然必需’目标或者,如果你愿意,是‘社会责任’”。因此,问题出现了:是什么迫使人们将自己的自由时间花费在赚钱活动上呢?

(二) 在自由时间里工作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力量之一就是“体面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获得。在匈牙利当前的发展水平下,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阶层人群的问题。当然,当我们面对它时不得不考虑到“体面的生活水平”标准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然而事实在于,被认为是基本生活条件一部分的某些物质(例如公寓,或者某些其他耐用消费品)无法以今天的平均基本工资获得。这只是强调更多自由时间需求被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超越的事实,虽然工业正在生产越来越大量的物质,然而还是由于国民收入的既定水平而不能被大多数工人所获得。“占有欲”的增长也会受到不断增加的比如信誉消费的影响,或者甚至受到对需要的操控的影响(例如,通过不断增加的广告,其目标在于利润)。

既获得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准”也获得差异化需求,甚至信誉消费,这在那些正在组建家庭或者日益变得独立的年轻人中间表现为特别强烈的冲动力。他们要面对的是为一种独立的生活而创建物质基础的必要性(开始是公寓,通过日常生活必需物质得以改善,到能够养活额外的人像妻子或孩子等),他们也是那种其个人差异化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个性化的人。满足这类性质的需求的努力常常干扰甚至可能阻碍文化的发展以及在其最好的意义上是由学校开始进行的自我教育进程。正是在这些年轻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额外的工作与加班正在不断地进行,同时,正是在这里我们频繁地发现人们交替轮班工作,或者连续上夜班,而且这些通常是应他们自己的请求。虽然这通常是日益独立和将组建家庭期间的人们被迫屈从于他们的生活,包括使用他们的自由时间来赚钱,但是,这在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中也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不断增加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需要,以及其数量和用以满足之手段之间的巨大差距,既是挫折的来源,无疑也是人们为增加工资而工作的刺激。原则上,应该为提高发展速度提供机会。但是在生产领域却很难提供这种可能性,因为企业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为那些生产出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的个人支付更多的报酬。而更大的物质利益却几乎专门地要通过领导层内部提升才能获得。然而,这条道路不仅是一种受限制的途径(那就是说,只有一些工人可以提升,比如,

提升到工头的位置),而且它也扭曲了社会后果,因为它不提供任何激励机制来提高工作中的最大性能,而是开发标准化的成功模式,这并没有使将个人的天赋与才能予以考虑在内成为可能。有些人不能或者不想采取这条路,因此他们的需求(无论是基本需求还是个性化需求)会迫使他们尝试并获取更大的收入;他们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他们的一部分自由时间用于赚钱。¹¹¹

(三)社会的后果

上面我们已经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什么迫使人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去赚钱?现在我们不得不找到市场赖以吸收劳动力并就此使其专心于此的机制,特别是因为它似乎发生在比那些“官方正式”所属的工作时间对工人更有利的条件下。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国有企业和合作社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与能力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口需求的差距。与此同时,在官方正式工作时间之外,对技术工人有一个持续增长的需求,这些工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然而却是以一个高于官方报酬的价格来做。这不仅意味着私营部门在扩大,也意味着在其工作时间之外以合法形式(许可证)及非法形式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这往往会扭转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写的趋势,即“工厂从小规模行业储备中招募技术劳动力,换句话说,它让后者培养劳动力,当培训完成,它就将工人从中撤出”。]为了使社会有可能支付这些服务,从“正式”工作中得到的工资普遍不够,因此,剩余的收入需要以其他形式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只能通过牺牲自由时间来获得。于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因为这是一个在扩展了的范围内复制自身

非理性的过程的开始。近年来,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价格总体上比工资上涨得快,今天在许多行业它已经达到比工资高两倍的水平(例如,建筑工人的官方工资过去五年上涨了25%,而这个行业的工人的自由市场价格已经涨了超过两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更高的自由市场服务的价格水平,更低的管理费用和税费,更好的组织以及更密集的工作——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是对其后果的评价却是更困难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影响劳动强度。尽管用量化的数据很难证明,但它可以在逻辑上被假定并且为在较低的劳动强度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劳动力的官方价格与自由市场价格之间差异的日常经验所支持。经常被提到的劳动纪律的懈怠大多数情况是对绩效的有意识的限制,因为工人在工作中接受的计时工资只有他在自由时间做等量工作所得报酬的一半,所以他会以节省力气的方式工作是很自然的反应。马克斯·韦伯对此描述为“低工资不能等同于廉价劳动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工资上涨都将导致劳动力变得“更贵”或者导致在非管制价格中产生那样一种消极后果。然而,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低水平的劳动强度迫使企业在其内部构建一个劳动力储备,这加剧了长期的劳动力短缺情况。因此,国有企业和合作企业不仅要尽量保持比合理条件下更多的人员,而且他们自己以其自己工人自由时间的买家身份出现。只有在这种情境下它才可能被理解,不管所有的努力及所有的限制性措施,既不管加班的程度也不管兼职数量以及辅助工作的减少。

在加班的地区产生的情况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情况。以工人利益的名义,工会正在利用其所有的力量来减少甚至消除加班。同时工人,特别是在那些为自由市场出售其劳动力

提供有限机会的行业,考虑到他们的可获收入,只是在收益辅以加班工资的时候。(在我们已经提到的著作中,茨威格提到了英国工厂的一个类似现象:在他看来,大量的并且可能是定期的加班是劳动力持久需求的一个表现。)在某些企业中工人自己创造,以有组织的方式,使加班成为不可避免的条件。例如,他们都不愿做某些工作除非他们收到了足够数量的加班作为回报。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体现得特别清晰,合作农场已经成为吸引劳动力的中心,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支付更高的计时工资,还因为他们不受限制加班的影响。正是由于我们给出的这个理由,它尤其影响到年轻的工人;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以更充分的理由断言,在某些大型金属加工业企业工作比在经营良好的合作农场工作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存在一个上升趋势。 113

我们先前描述的这个恶性循环包含着一个几乎持续高速率的劳动周转,并且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情况几乎很难被行政措施改变。总之:经验证明,如果官方工作时间的减少随后不跟着一个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的话,如果对真正的空闲时间的另外要求不能有利于发展其中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它就只是提供了一个自由增加的错觉。工人们实际上会想方设法将他们自由时间内的劳动出售。

自由时间变成了一种商品,这使得人们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纯粹与自由时间的增长和重组相关的期待变成一种幻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社会学研究表明,工作的具体性质——也就是劳动分工的地位——决定了人的一生,包括他度过自由时间的方式。然而,当前的劳动分工形式构成了工作自身领域内人们实现自主性的严重障碍。一方面,大多数工人从事的是一种无论从职业或者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均缺乏一种目的论功能的琐碎的劳动。另一方面,人们将整个一 114

生绑定到一个特定的职业上,通常是一个特定的工作,几乎从孩提时起一直到退休与接受他们的养老金时为止。这是目前的生产组织的最保守的特征之一。为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对生产组织进行的适宜改造将会提出两个主要问题。在劳动分工体系中什么改变是必需的?我们前面提及的镣铐怎样被消除,或者至少被放松?

在不低估第一个问题重要性的前提下(即我们面对的是“共同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这里应该集中精力在第二个问题上,因为它对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篇专论不研究的那方面的问题通常被称为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但我们却更愿意称之为生产者的社会控制的问题。)

劳动社会分工的主要分支对人的安排在今天主要由教育系统进行。就是在那里开启了将人们一辈子束缚在一个特定类型的工作,可能是专门的职业上的进程。学校使学生准备自觉地形成自己的生活,它仅仅让他们填充一个狭隘的职业或工作。我们目前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映射出了从十四岁开始的三种生活模式。这些生活模式不仅彼此不同,而且清晰地彼此隔绝,它们保护当前的社会结构并且通过这个系统传给子子孙孙。普通中学提供领导阶层和知识阶层储备,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副产品)也提供中低管理阶层储备。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培训学校的目的则倾向于适应最为广泛的低、中等水平的技术人员中的技术工人阶层的繁衍,最成功的学生成为中、低等层次的技术人员。最后,那些
115 除了小学而外没有继续其学业的人构成了我们的社会中声望最低的非技术及半技术工人中的大多数。

(四) 技术工人的培训

从我们研究的观点来看,正是培训技术工人的系统才是特别重要的。今天也许正是这个阶层受到劳动分工纽带的最强烈约束,无论是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是那些非技术工人相比。为了能够更加紧密地分析这个问题,首要的是要简要地概述一下这一领域在技术进步影响下的主要发展趋势。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草率的概括往往难以在整体上理解这一进程。通常这种多方向发展进程的诸多方面只有其中一个因素被强调,并且,基于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幻想,被期望的技术进步的积极后果就是被高估了的技术进步。如果我们分析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发展趋势。

(1)最重要的变化,在其影响最大量的工人这个意义上讲,持续地表现为体力劳动不断被机械化替代。这个过程开始阶段可以追溯到纺织和金属加工行业出现的时期,但机械化现在仍然是一个在许多领域内(例如农业,仓储和码头,地下及地面建设等)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体力劳动不仅被技术劳动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被半技术劳动力所替代,这里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工人培训。

(2)与第一个过程同步,旧的传统行业不断失去自己的行业特点并且承载了半技术工种的特点。由于技术的进步,许多工作都缩减下来并且必需的活动成为一种常规。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一个这种程序并不适用于此的传统行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技术工人培训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需要不会出现。 116

(3)技术进步创造了相当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尽管有

其官方分类,但是其中大多数在性质上依旧是半技术性的,例如自动或半自动的机器运营商,打卡机运营商等),但是它仅创建少量的新行业(如电视装配,或自动化机器的维修人员)。后者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的行业,首先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需要更少的手的灵巧度,而需要更多的是更为通用和更为专业的技术知识。

几乎所有行业和职业的技术基础都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通常是深远的,会使先前的实践片刻就成为基本过时的和多余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均衡过程,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对技术的、半技术的及非技术工人种类的维持提出了挑战,同时建议精化新培训体系。在匈牙利,技术工人的培训学员数量在1953年和1965年之间增加了近四倍。这几乎不可能证明技术进步要求的合理性,因为在瑞典这个上升率(从1958年起)只有27.6%,在奥地利是44%,在意大利是46.5%。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的事实得到合理的解释,即这种形式的培训导致了小学毕业之后不再继续学业的学生数量的明显下降,并且帮助培训年轻人参加工作。另一方面,调节其志向使其适应目前的劳动分工水平,引导他们进入合适的学校,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儿童陷入沮丧。这一现象的最不利影响被发现存在于那些一开始就处于弱势的年轻人之中。目前技术工人的培训系统,无论是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它不适合技术进步的变化需求),还是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角度来看(它把人们变成耗其一生的行业或工作的奴隶),都遭到了公正的批评。

117

(五)目前的矛盾

我们的技术工人培训系统的突出矛盾之一就是,虽然技

术进步要求特定职业需要的知识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普遍意义上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获得,但是,很多半技术性职业因为工资政策和其他原因(特别在轻工业、商业和食品行业),已经被归类为技术工作,尽管这些职业中所要求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或者如果它们改变了,也更多的是在所需知识和技能受限的方向上的改变)。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提供了较高的积极目标——例如,在其他方面,提高有关职业或行业的声望——但事实上很少达到这种效果(例如,只要考虑一下技术特点是否实际上已被添加到妇女在纺织行业中的职业上,就能看出问题)。一般情况下,它甚至在一些的确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业中也减少了技术劳动的价值。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一个技术工人通过一定程度的努力所获得的技术资质证明,越来越把他同工作的某个具体领域联系在一起。

已经出现一个在缺少“技术行业”的地方调用任何形式的半技术工作的明显趋势。此外,在这些领域里适合技工培训的学校数量是不足的,一种所谓“提高水平”的教育被引入。例如,食品行业销售人员的培训就以“提高”水平进行,尽管事实上假定其具有适当的一般教育水平,那么满足工作要求的所需知识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并且重点应该放在为销售人员提供持续的信息(有关新商品的属性,有关如何使用它们,有关新的商业方法等)上。这个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其工作中有经验的“非技术的”工人与那些拥有技能培训的资历,却经验很少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多数有关的行业及工作而言,与一定的个人能力挂钩的实践,往往比在职业培训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更有价值。 118

我们已经在上面概述了技术发展的趋势导致的一个事实,尽管技术工人培训学校存在着比较大量的时间可用于学

习贸易和获取技能,但教育并不是足够有效的,因为它无法遵循实践。如果在培训上优先考虑给予教育技术工人以一个比受限的专业化更广泛的基础,尽管这显然是一种积极努力,但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匈牙利,大幅减少了交易量。)这意味着在培训熟练工人上,重点在于从获得特定技能转向更一般的技术知识;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两方面都未能寻找到合适的标准化教育,学生经常抵制理论科目,因为他们与这类学校的期望格格不入。因此可改变的目标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操作。技术工人的培训学校,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完成二次学业的证书的学校,有一个巨大的任务,即提高学生的一般文化水平。这将有助于防止他们的职业生涯缩小,但是在实践中,一般的中学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存在着一个很深的鸿沟,后者的学生的主要权益是在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学院继续他们的学习,因而是相当理论化的,并且在实践中这种可能性只对那些杰出人才开放。劳工部于1970年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12.3%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原本就想学一门技术职业。

也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社会不仅要求年轻人在他或她的自主性于大多数情况下还完全只是一种幻想的年龄就选择一个职业,而且要求年轻人把对于如此“选择”的职业的信心作为自己一辈子的理想,激励人们如此做,并且甚至在不少的情况下强迫人们采取这样的行为,将不信奉习俗的行为描述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偏差。这一点与一种计划相关联,并且被它所支持,这一计划考察各种不同的行业,甚至是精确的工作职业的预期的工人数量,从而编制相应的明确的招聘计划。从这个角度来看,“退职”(dropping out),例如离开一个岗位,被认为是一种必须予以斗争的消极现象,既要采

取行政的方法也要用心理 - 技术和社会经济 - 技术的方法。然而,一些退职的行业正在如此广泛的规模上发生,以致把这一现象定性为偏差的做法本身变得可疑。例如,劳动部调查已经表明,农业行业内的学生辍学率是 42.4%。那些受训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在其行业之外找工作,如同相关的文献所强调的厌倦的程度。此外,年轻的技术工人之间的工作变动率也是相当高的,因为它经常包括对熟知行业的放弃,许多人基于上述理由都把它视为一种予以谴责的现象并且要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制止。

我们所提及的事实广为人知,它们使得职业培训中存在的危机现象非常显著。然而,对这种事实的承认可能引起,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引起,许多解决它的不同建议。尽管有各种各样被制定并提上日程的建议,我们仍可以区别两种主要的趋势,这不同于基于学校培训与劳动专业分工之间关系的观点。

(六) 一个新型学校

那些关注学校培训的人们主要受到的批评在于他们对于目前学校系统的最薄弱环节方面的判断(这些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中被提到),并且他们的建议包括大量值得关注的观点。当然,他们不能改变当前的现状,因为他们并没有触及根本,触及将人们一生束缚在特定工作上的那些特点。

120

相反,我们认为,发展一种既能组织生产又能组织学校培训的联合系统是可能的,这并不将一个人的位置一生都附着在劳动分工上,而是允许他不断朝着发现自我及他的特性来确定他自身目标,从而为工人创造可能性,甚至激励他在

其人生的任何阶段改变他的职业或者行业。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存在于一般的学校培训系统与工作领域之间的机械关系必须首先予以打破。

提供一般教育的学校系统首要任务就是教育人们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不得不适合劳动分工的工人。换言之,它的任务是使人们准备好控制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及不断地塑造他们自己的命运。按照这种模式,在重要的经济可能性与既定的价值的情境之内大量地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一般性知识,应当在标准的学校中加以提供,这种学校不仅宣称而且实际实施消除各种歧视隔离。各种各样水平与形式的职业培训系统,都应该与此截然不同。与前者相比,后者必须真正地提供参加到劳动分工的某种具体专门领域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按照概念,专门的学校将与小学联系并且使其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成为可能。这些学校中一些会提供特定的基于不同水平的基础的职业知识及能力,而这类另外的学校则对特定职业或特定的工作的培训拥有资格。这些专门的学校应该被设定为可以达到让任何一个拥有一般或基本的职业知识的人完成他们的学业成为可能。方案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远远超过劳动所能提供的可能性:它也包括正在克服的必要性,在实践的意义上,以及处于较差地位的人们目前所面对的社会障碍。

121 不管我们认为一个平等的起点与社会大体的透明度多么重要,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改变将仍旧处于自由幻想的水平。没有结构的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主线将被复制,并归根结底将被保存。这些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超越行政权力的社会控制的建立。然而,这种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种大幅的较高的一般教育水平,而很多人甚至认为目前的教育水平也过于雄心勃勃了。很难否认,那些完成了中

学学业的工人一般更多地期盼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更多,而大多数体力工作岗位无法满足这些期望。但是社会可能从中所得大于所失,因为它可能引发组织劳动内部各种不同的有活力的变化。

(七) 目标:实施过度教育

我们所提出的系统自然伴随的是在双重意义上进行过度的教育(overeducate)。一方面,在这种培训系统下大多数工人将获得比他们为完成其喜欢的具体工作所直接需要的水平更高级的一般教育。另一方面,将存在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拥有能使其完成特定工作的职业培训的工人。对这种意义上的过度培训的恐惧成为社会思考的一个阻碍,也是建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产组织方式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的想法是一种现代化形式的劳动组织,假定一个特定的技术水平,提供给个体工人以更大的自治、责任与决策能力:工人不是接受以一种命令形式出现的任务,而是相反地,对明确的职责功能负责。有更大要求的受到更好教育的工人会督促引进技术变革,包括那些从经济角度来看并不简单地或并不主要地是重要的技术变革。一个于此甚至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随着相对更多的工人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并且随着工作一般标准的提高,一个崭新的工人阶层将会发展起来。这将可能要求和实施对行政机构的真正的社会控制。与此同时,这个阶层的成员将拥有更多的个体流动机会。 122

通过过度培训而使人们获得一个更高水平的一般性教育,这在原则上可能不会有任何异议。那些提出保留意见的主要是基于实践的论点。首先他们感到担心,被更高的文化水平所唤醒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足,将成为不

满的根源。其次,存在着对经济的考虑,根据这一考虑,不能在社会生产中直接使用的任何教育输入都是不适宜的。当它是其他形式的过度培训时,那就是,如果更多的人去了解某个特定行业而不是某个特定时刻所要求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这前两个疑虑,即有关不满和经济学浪费,在这种情况下被两个似乎是相当重要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论据所补充:结构性失业的恐惧,以及无计划性现象的恐惧。因为这确实是对那种通过确定各种工作与行业的精确比例而试图在生产组织与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之间构建和谐系统的一个否定。

但是如果我们主张一个真正的开放的社会,那么在个人行业和职业的过度训练就是一个在现存的劳动分工内找到最适合他们的个人自由权范围扩大的重要前提;并且不仅如此,它也是动态的结构变化的必要前提,确保各行各业的人们是最适合从事那些特定任务的人们的必要前提。换言之,这也是创建个人能够从诸多行业、职业和工作中进行选择的条件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组织也拥有从这些申请中选择合适人员的机会。这后一种事实本身已经在官方正式工作¹²³时间内增加劳动的强度。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将有助于去创建这样一种条件,在那里更多的没有用于工作的时间将成为真正自由的时间,并且能够消除我们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概述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工人由于其低工资而在其正式工作时间内以较低强度从事他的工作,并且用官方正式工作时间之外的工作来增加工资收入。我们已经提及的过度培训的形式,在另一方面,可以为人们更加独立地选择行业或工作提供激励,并且能够使人们为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而更明智地利用他们的自由时间。

以我们的观点,正是在这里,自由时间问题与生产组织

中所预期的(以及早应完成的)改变之间,以及在职业教育和一般教育之间的合理的联系才能得以建立;人们将因此能够在他们的生活领域更加自由,从而增加其自主性,并且作为人的存在而实现自我。

八、社会主义国家中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走势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即使在其开端,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断地提出并试图解决一系列被科学的分析视作构成了社会学对象的问题。上世纪末这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所开展的讨论中引发了一种以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混合方式进行解释的倾向。这种视角基于社会学应该从事“自然科学”真理的研究的观点,而排除了基于伦理学的所有的价值判断。

在这很值得商榷的解释背后形成了一种尝试,要立足于马克思建构一种社会学,要从马克思主义里面消除有关革命承诺的价值判断,并且提高其科学的层次。这个概念很快就显露出自己是修正主义的偏差或者纯粹的修辞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依旧存在并且发挥着影响,它在价值问题上尝试着采取保持科学的态度与批判的和革命的态度相统一的观点。这不仅承诺而且实际上暗示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复杂的局面,即以简单化与庸俗化倾向加强为标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长期转变。早期的自由活泼的讨论逐渐消失:理论的立场,转化为官方

的意识形态,并被补充到教条主义和辩护的位置。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过程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斯大林时代的一般社会学。它不断地宣布其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科学,它拒绝面对有关社会现实的理论,并且不承认社会理论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的必要性。125

这些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经出现的社会变化(在这我们不能详细地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过程可以被定性为“双重运动”,借用卢卡奇的表述:说到方法论,回归马克思;说到问题意识,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当代社会现实的解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我们不仅意指马克思历史与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意指它的被庸俗和扭曲的版本,这一版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并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经济教科书中仍旧占据着位置。)一方面是返回现实,另一方面是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传统,这自然会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而复兴。

虽然这个过程在其自身来讲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获得了有机的的发展。社会学因此被用于证明与批判和社会主义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地位,这种位置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确立了。

然而,在这一决定性趋势中有两种倾向。一方面,存在着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源于政治的考虑)的公理化主题的倾向,以及反对意在从任何的道德取向中解放社会学,赋予其科学性的倾向。它否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一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倾向正在显现。这种倾向强调有必要借助基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分析和不断面对社会现实而构建理论的立场。这些立场将能够对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给出解答。

我们简要介绍的这些主要倾向尚未被明确地阐述与定义,并且没有将自己视为拥有详尽的概念体系与理论立场的流派。目前的分歧主要在于社会学的定义及其社会位置的问题。这个阶段可能已经看到这些不同方法正在融合如同正在变得日益分化。然而,在我们看来,具体存在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存社会条件倾向于强调这种分歧而不是相反。

在这些国家,一个相对广泛的,虽然不是同类的阶层已经形成了,其成员,或以某种真实的或想象的 personal 利益之名,甚或以所谓的“集体利益”之名,将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目标视为对已构建的理论立场和机构及盛行的控制和管理形式的捍卫。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拥有严格术语意义上的党性,并且期望他们主要履行一种辩护的职责功能。这种态度的起源无疑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获胜的新的社会条件不得不在一种困难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标准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武器库履行了这种带有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捍卫”功能。今天,在其僵化的形式内,它不再能够完成这种目标了。因此存在着各种努力以使之提高和“现代化”。

作为一个规则,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材料”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它运用那些没有出现威胁其基本概念及其自己设定的目标实现的社会学观念来加以填充;继而用实证的社会学调查来加以补充,这些社会学调查本质上更多的是要说明已经采取的理论立场而不是去面对这些关于现实的立场,并且通过实验对之加以证实。因此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统计学展示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在费奥多谢耶夫(Feodoseyev)院士的一篇文章中被典型地阐述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必须获

得应对具体现实的社会学研究证明。”

正是这种倾向的总体特征总是将社会主义所获得的结果与过去的资本主义所获得的那些结果相比较。因此,任何历史变化似乎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的历史现实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真正对抗被忽略了。127

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揭示社会文化水平或其每个阶层如何被发展起来,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文化价值的增长;这比经济发展更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基于马克思关于必须通过人们的行动而不是人们的言论来判断他们(这个主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对的,但是在此处扩展绝对是时尚)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在采集社会学信息时最初并没有采纳所谓的主观的方法,只是通过规范和其他经济指标的实现来衡量人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这自然导致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首先,由于经济指标必须使用批判性思维,作为统计数据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频繁分歧的结果(例如,一个高修养的规范可能表明的不仅是强化的劳动而且是规范的降低);其次,因为导致这些发现(例如规范的实现)的行动可以由不同的动机引起——以任何方式赚钱的渴望,工作对社会的有用性意义,工作的鉴定,等等。

这种倾向当然不可避免地尝试解释社会主义所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犯罪的各个方面,工作纪律的违反,等等)。然而这种解释又一次不是依据社会条件的分析而是根据一个意识将滞后于现实的普遍性假设,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残余”生存于社会主义政权里面,存在于人的价值体系与人类行为规范中。因此成就了研究意识的时尚;尽管最初具有巨大敌意,但是所谓的主观方法还是得以发展。但是尽管更加“社会学化”了,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表明其本身不能满

足关于具体社会现实的日益增长的知识需要。我们已经提
128 到的,这种需要首先很大程度上出现在理论层面上,就如同
相对于社会主义(它经常宣称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达成)的理
论立场与现实之间存在对抗的必要性一样。

当组织机构与控制方法的合理化趋势最后发展到几乎贯穿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时,对社会学及其所能提供的社会-技术援助的更大的依赖需求将会被感觉到。这导致社会学家不仅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而且也要支持那种拒绝先验地关注自身价值观的倾向。根据这一倾向社会学的目的纯粹是没有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专门的实证研究。因此,实用“经验主义”,我们指的不是经验的社会研究,而是指这种倾向,它仅仅包含以客观性、合理性与精密性的科学化标准作为唯一价值的一种非理论化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面对如此设想的社会学的经验主义的态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最初的彻头彻尾的敌意之后会来到一个其被或多或少容忍的阶段。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经验主义的存在,这就排除了价值观的取向,是最方便的公式。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那种把人的自由限制在人的行为之上的决定论的一般观点,与那种依据自然科学模式来建构社会学的经验主义,的确很容易调和。就社会学的经验主义倾向并不把价值的选择与监督当作自己的任务而言,实际上它可以给予历史唯物主义很多以帮助其维护社会现状,也就是说不仅维护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维护其主导形式。

不仅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而且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鼓励经验主义远离任何意识形态,因为后者的拥护者常常要求社会学的活动应该被限制于仍然是处女地的实证主义研究领域。他们因此阻止社会学渗透到其他学科以及用

批判精神解决它们。他们基本上赋予它一种完全的辅助功能——为他们提供“原始材料”。 129

最近在这一倾向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被观察到,尤其是在苏联和波兰。大量“没有价值取向”的社会学代表人物正在放弃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他们通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关心重要的社会问题(总体上把自己的研究限定于描述和短期的判断)。他们将自己的兴趣放在完全的方法论性质的问题方面。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可以完全独立于重要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而得以阐发的幻想。这部分地意味着他们正在拒绝面对这些问题,或者至少他们认为它们可以被精心的完善的技术流程所解决。然而,实证的倾向绝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它并没有挑战它自己的理论基础。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进程的路径正在被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并且它的出现是因为一个集中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表达和反对为已建的机构做辩护的一种反应。将自身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种承诺要求真正地分析当时的关系以便未来发展的积极路径能够在此基础上加以选择。在我们的国家,特别是目前这种局面使得对基于既定计划的集权经济体制进行批判性分析成为可能;从此起步,一种新的模式可能被阐释。然而,上述提及的社会学的倾向不符合这种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本质上就承认机构的存在,理论的立场及过时的管理方法被捍卫;它因此阻碍进步。至于说到经验主义倾向,它充其量有利于对现有的关系和机构进行批评以及追求最佳效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种倾向必然出现在社会学里,它不否认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承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由于这种倾向,理论不但构建现实存在 130

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制定发展的假设的可能性路线与表明各种社会目标和后者隐含的本质关系之间的可能性选择的一种方式。它不认为实证研究是一门单纯的社会技术，而是一种能够使现存条件基于我们选择的价值观体系获得实质分析的一种科学方法。

依我们看来，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并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基础。然而，这种倾向还不是一个发达的理论。它区别于先前的倾向更多地是通过社会学中特殊的社会角色概念而不是通过同类理论体系的详尽阐述。今天我们会遇到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这种概念，但是如果产生于这种概念的成就被检验的话，它们显然主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不同倾向有关联，它们开始于非常不同的理论原则。因此对于某些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而言，例如，社会学的社会角色概念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解释。在某些苏联和波兰的社会学家中，它与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等元素的利用有关。

就本文作者而言，这种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本体论”倾向密切相关，这依赖于相同的社会力量。但是无论哲学的主要功能是否是确定或证明价值选择，社会学的任务都是对在此基础上的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案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并且预见不同变化的社会后果。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我们发现的第三个倾向来自这样的论点，即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存在后续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为发展而做出的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取决于人民。因此，社会学不能纯粹地成为

131 一种精确地预测未来的“客观的”科学，因为一个人接受的任何的描述与预测的立场组成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学类型的价值取向与基于对问题的

纯粹实证的方法相比缺少客观性或缺少科学价值：首先它通过对现有机构，以及社会内部发生的进程与在一种有意识选择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来发展的可能过程的批判性分析来定义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是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换言之，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的最优化也包括人道化的考虑。因此，这种社会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首先，它试图制定一个足够现实以便给予人们对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有更广阔选择可能性的社会模式；正是这一事实有助于社会关系的真正的人道化。其次，它把现有的机构和社会关系与发展的既定假设做比较。它试图通过它们的运动，它们的矛盾，它们的转化，自觉选择的语境视角去研究它们。这种倾向并不证实社会经济技术的研究和方法的有效性与实用性；在应用时，它不要求它们支持已做的选择，或者要求它们有助于后者的实现而不是产生一个相反的效果。

正如我们上述尽力表明的那样，不同的倾向对于在社会组成的限制范围内社会学的对象与功能均有它们自己的定义。根据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它可以前行的步伐，它们的兴趣中心会有或大或小程度上的变化。假设这些倾向中每个倾向研究同样的社会现实，它们肯定会彼此不同；每个倾向必须回答其他倾向提出的问题（即使问题完全“外在于”它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挑战它自己的论点与方法，偶尔甚至是挑战整个思想体系。对近些年来发生的争论所做的一个简要检视可以使我們更加具体地展示倾向所描述的方法的独创性。如果这些辩论被放在个体的层面上去展示观点的分歧，那么就无法被理解。为了更明了地分析它们，不仅这些倾向基于的思想体系，而且它们分配给自己的社会角色都必须被掌握。从异化问题而产生的争论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以哲学争论开始，但后来他们

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对于它们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所持有的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概念。虽然异化显然是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理论的主要范畴之一,但是这一概念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发展中,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完全消失了。只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异化才再次得到认可;然而,关于这种过程的原因的分析已经超出本文的框架。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基于如下主题,即经过短时间的过渡期后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一个社会,这一社会当然毫无疑问能够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但基本上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在这个制度内根本没有异化或人道主义概念存在的地方,社会已经被认为是人道化了。然而,就这种倾向在争论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现实而言,在使用异化术语去指责无可争辩的缺陷的时候,这种术语大多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后者无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找到有利的土壤,它们更无法产生异化的形式。

例如,L. 韦列谢京(L. Veresh)认为,“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内部不存在异化。社会主义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它们的来源在于经济系统的不平等水平或者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比匮乏情况下的发展,在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实践失误,还在于残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33 即使这个引证可能表现为一个有点极端的定义并且那些持有此立场的人经常于此更加巧妙地表达自己或者做出重大的让步,它仍然是一个符合他们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废除了私有制同时废除了作为结构性现象的异化观点的陈述。

这种观点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有一个直接的和值得考虑的影响,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引导社会学家在现象的表面领域

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是探究它们的结构原因。相应地,这一倾向尝试着从给定的机构选择的框架中发现消除否定性现象的方法。作为社会学的技术,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矛盾,但是它既不便于清理过时的形式也无法用新的形式来替代它们。与此相反,它有助于维持它们。

由我们试图定义的第三个倾向所带来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它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社会主义革命对私有制的废除,开启了一条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但是这只是为新型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条件以使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能够发展。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社会的不断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很多方面,这样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这已经定性了。为了使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真正地能够独自地保证那些已经设定为目标的社会条件的实现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样有必要使它甚至能够对自己新创立的机构进行持续的批判分析。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分析以这种倾向来看指导着应对最新发展的设想的选择。它有利于社会实践并且使社会能够衡量其达成目标的程度,以及评估其必须设定的未来目标。

这完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人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那么任何产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失调”现象都不会被认为是与这一制度完全无关的主观的或者甚至是客观的错误的结果,或者是偶然的缺陷。相反,他必然会达到对这些现象的结构原因的认识,并且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具体的异化新形式。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这一倾向与我们还没有专门讨论的观点是一致的,那种观点仅通过单纯地与个人相关来分析异化的倾向,把异化仅仅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用以解释任何冲突的情况,从而将异化的概念转化为一种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现实的魔法和超历史的

公式。

因为在具体的关系和条件研究中,异化和人道主义概念充当了理论指导方针,研究相似的社会结构的现实与模式是十分必要的。并不意外的是,与异化概念密切相关,在近十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没有什么问题像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结构问题一样得到了如此多的讨论,包括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讨论的主要主题已经成为如下所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社会阶级吗?不同组织在物质财富、名誉与权力分配中能参与多大比例?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如何可以被认为是开放的或封闭的?

历史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区别是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例如,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 J. 布拉什科维奇(Janos Blashkovich)在他有关工人阶级概念的问题一书中写道:“对于说到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意义是否已经消失了的问题,回答必须是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没有’。”这两者越走越远是事实,他评论道:“虽然解释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不同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财产的双重形式,这两个阶级在他们与财产的关系上来说是完全相同的。”然而,正是基于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之间的不同,两个重要的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被区分开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假如像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异的其他结构特征被认为是根本存在的话,那么与上述提到的所有制差别相比,这些因素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或依赖性的。

这种倾向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定义工人阶级的概念,有关于此的讨论已经在国际范围持续了一段时间。它自身造成的主要问题是把技术的、经济的和管理的干部整合到工人阶级之中的问题。以社会主义观点看来,这种整合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第一,这个阶层的干部从根本上是来源

于工人阶级。第二,他在国有资产中拥有与工人一样的份额。第三,他与好的熟练工人相比在收入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他的管理活动并不与工人对立,因为干部不是资产阶级企业家的代表。他占据他的生产管理职位仅仅是因为劳动的技术分工而已。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点认为,整个企业管理层组成工人阶级的部分,那就是说,它没有与从事标准意义上的体力劳动的工人不同的利益和目标。这种倾向的代表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从工人阶级进入管理集团的人们,包括达到最高权力地位的那些人。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那些强调财产关系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的根本作用的人所提出来的观点,他们认为,农业合作社中的工人形成一个独立的“一般农民阶级”,“农业知识分子”也被类似地整合在这一阶级之中。这个概念来源于被私有财产制度分离的农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转变成为一个单一的合作社工人阶级的事实,但是它却将合作社成员通过他们各自不同角色而造成的不同忽略了。十分清楚,通过“扩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种观点消除了“知识分子”,并且在极端的情形中,使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从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136

这一观点在由我们已经引用过的《社会评论》(*Tarsadalmi Szemle*)所组织的讨论中,被阐述如下:“逐渐地知识分子范畴将不得不得被抛弃,因为,标准地说,它的重要性不大。”

这种方法最成问题的方面就是它企图在阶级社会范畴内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的结构。虽然列宁的阶级定义并不适合,但是,为此目的,一个特殊的非敌对阶级的概念创立了,虽然它被认为“就其本质而言不再是阶级了”。

这种概念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若无它们则无法捍卫权

力这种概念的事实获得了解释,当我们讨论官僚主义时对此将会进一步详尽地探究。

这种方法的第二个后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不是表现为终结而是表现为自觉的共产主义社会条件的转型的必要的变革开始。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紧要关头这个概念把存在于男人与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处地位之间的社会差异作为其标准——尽管有“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权力、收入与声望的不平等分配。

这种认识开辟了社会学分析的广阔视角,并且使得揭示那些社会科学学说虽然很熟悉然而往往被否认的那些冲突成为可能,冲突的来源在于结构,基于劳动分工的结构。这种结构产生了社会主义拥有个人利益和目标的人群和阶层。同样地,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分析那些重要的如社会流动程度或者缺乏流动的结构性问题,权力和统治的问题,以及此类的其他问题。

137 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概念中随后会有两个彼此对立的观点,关涉未来发展前景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人强调区分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意义的话,那么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强调这样的情形,即如果这种区分不存在,换言之,如果集体所有制被推广到“全体人民”水平的话,那么一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的诞生的首要的条件就将得到满足。对于这种倾向而言,在结构创建中将对劳动分工中人们的地位产生重要的作用,当这类或那类工作不再自动地决定一个人为其个性发展所做的选择以及限制其个人自主性的时候,新的、质的社会状态将会出现。

上述显示当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两种倾向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概念相关。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对于此问题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

论点(这在他们看来毋庸讨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机构都服务于共同利益,到目前为止它是工人阶级控制下的工人的国家。黑格尔的幻想会重演,但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层面,在其中它不再指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是指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一说法既被科学观察,也被日常经验不断地证明是错误的。

管理机构的个人利益,部分依托国家本身为了提高他们的效率,会以一些不受欢迎的形式证明自身,其中最常见的是主张个人利益是集体的利益,管理组织内部以斗争形式解决的和公众不了解的那些问题的秘密特性,对等级制度的捍卫甚至不惜以牺牲合理性和效率为代价,即使取得了一致,也要试图垄断专业人员的实际知识,如通过自我批评防范公共管理犯错,等等。

138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当然可以研究国家机关的结构以及负面现象与冲突的原因,但是为了做到这些就不得不在其初始公理上添加一种新的论点,其声称权力结构的消极现象的出现应归因于一种主观性质的因素,即摆脱了权力约束的个人的错误或者客观条件,但不能归因于控制和权力原则本身。然而,这种假设缩小了社会学调查研究的领域,并且降低了那种寻求与背景有关的社会现象的结构性决定因素的社会学方法。充其量,这把研究限定在关于问题的社会心理学观点上。

尽管有这种处理权力结构研究的狭隘方式,但社会主义实践都迫使对这样的事实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推动其实现,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机构不仅代表公共利益,而且间接及直接地代表个人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对整个社会而言通常被看作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官僚关系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机器内形成。正

如我们已经表明的,这要归因于结构性现象而不是客观性错误。认识到这一事实大大地拓宽了社会学分析的应用领域,允许对国家机器进行真正的机构研究,国家机器被认为是不同社会阶层利益体现自身的地方。分析也可以被施加到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已建的机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允许整个社会调控权力机构的权力,对直接生产的整个社会而言,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如何能够实现。

我们希望再次强调,我们这里已经审视的倾向没有一个是同类的。进一步审视将允许追溯其中每一个的分歧的观点。然而在我们看起来,似乎强调存在于这些倾向之中的对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随后发展被认为是合理的话,那么有关它们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缺少这些,很难避免无原则的妥协和这种无法带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重生的主义。我们在这里故意忽视了那些显然是资产阶级的倾向,这些倾向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每天都不得与它们斗争。这个问题本身就单独需要一篇完整的论文。

九、价值在分配与消费的 长期规划中的作用

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越来越经常地询问,这些国家已经历史地形成的消费结构的特性是否能继续保持在一个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的语境中,或者是否允许转变成为一种更适合于将会发生的较高水平的模式。在后者的情况下,它将可能遵循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抑或将必须寻找到更适合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

这个问题在匈牙利表现得特别典型。它主要影响工业生产领域的新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其他社会生活方面变化的需要。它们集成于社会转型的全面计划之中,一个长期的分配与消费模式是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也是必要的前提条件。接下来要研究与此任务有关的大量问题的社会学方法。

(一)与分配和消费的长期规划有关的 若干方法论问题

会存在两种威胁消费和分配的长期规划的极端情况,就如同它们对所有其他的社会经济规划所做的那样:

141 (1)唯意志论(voluntarism),或忽视真实情境,是一种包括不断地参照社会规律的态度。它往往与这样的观念相连,即认为,社会进步就像自然过程一样,是受基本独立于人的意志的规律支配。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必须做的规划就是发现这些规律并使之成为有效的。但是以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律只能运用最普遍的术语来加以表述,而且这种表述本身是任意的,因此,这一概念为一种不考虑现实的计划制定敞开了大门,甚至它本身成为这种规划制定的意识形态基础。

(2)作为反对唯意志论规划方法的一种反应,一种“科学主义”规划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成型;这一方法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它依赖于丰富的经验数据,而不是对所有问题的实用的分析,不是对目标本身的科学分析。它认为制定宗旨和目标是政治学的事务,并且规划的功能是有限地阐述那些最适合实现这些预先确定的目标的方案。我们当然不否认宗旨和目标的确定,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政治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某些特定的狭隘组织的特殊利益在此进程中实现了决定性作用的话,这种政治行为必须受公众舆论的控制并且它也必须服从于社会科学的分析。

这种趋势将导致相当多的精密仪器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并且它因此就更能有助于把规划提高到一个比以前人们讨论过的更精确且更科学的水平。不过,因为它并没有准备承当既是一个自觉的价值选择,又是一种科学的目标分析的角色,所以它也会使规划变得贫乏枯竭。

这些当然是极端的情形。在实践中它们很少以这样纯粹的形式出现。实际上近来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的是,上述提到的两种规划制定方法中的第一种方法,已经开始使用一定

的精确的数学方法,然而,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出发,即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一个较宽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总是有自觉选择的余地。就我们而言,未来因此不是可以提前发现的某种必要事件的系统或链条,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制约,但却不是完全被决定的。142

因为这个原因,长期规划的本质不能降低到以假设方式来概述各种经济领域里,或者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里,什么是从长远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它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阐述那些作为社会变革纲领组成部分的目标,即把适当的经验数据分析与自觉的价值选择结合在一起。这些目标必须依赖现实并且因此是可实现的。长期规划(包括社会变革目标)以这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手段,以及勾勒出预期后果的预测,形成为社会规划进行精化的基础,包括因情而异的变化。

每一个社会的预测在本质上依赖于两种方法:外推法(extrapolation)和插值法(interpolation)。第一种是建立在个别国家过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并把它们运用于未来。换言之,它意味着一个特定的社会当其勾画未来时必须利用其过去的经验。后一种插值法是基于在那些比制定规划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中识别到的趋势,换言之,基于社会的经验而不是这些社会被预期的未来。由于建立在外推法和插值法基础上的预测科学(prognostics)按其本质保持在过去历史经验的框架内,因此它们自身无法为针对现有社会条件转型的一种长期规划制定基础。

外推法和插值法,以及依赖于它们的预测科学,必须服从基于被选定的价值体系的批判,以建立被勾勒出的发展趋势的有效原因,以及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确定的变化的方向

143 **与成本**。只有基于那样一种批判性分析,规划,也就是具体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才能得到详细说明。

规划的做法因此导致长期计划通过批判性的预测评估。这些规划项目是在具体计划形成的时空背景下得以表述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原因,一旦唯意志者的规划方法被认为过时了,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外推法就会被给予优先考虑。这受到如下观点支持,这种观点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新的社会条件已经建立起来,可以进一步发展而无须额外的根本的社会变革。按照此观点,导致基于外推法的规划不确定的唯一因素就是人们不能可靠地预测技术进步的事实。它通常是在这个基础上才造成了毫不含糊地确定与仅用一定量的概率进行预测的那些现象之间的区分。但是这仅仅是确定利用外推法的局限性因素之一。

更加重要的是被外推的始终是一种现有的结构,使用现有的比例与趋势,并且外推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被人类活动明显改变的可能性——活动进程并不是被某种一般规律预先决定,而是自觉的价值选择的结果。这一切当然并不意味着,当选择可选方案时必须牢记在心的是既不存在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外推法的局限性也不能由于这样或那样既选目标的利益最优设计而明显扩大。的确,模拟模型也有助于减少外推法的缺陷,它主要通过允许去除各种不现实的方式来实现。匈牙利的规划做法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例子。

外推法的机械运用最有可能在一些地方产生严重的失
144 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失误的特点表现为结构缺陷,或者表现为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水平相比较的过度欠发达。住房情况可以提供一个例子:匈牙利建造住房的速度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情况。

过去也提供了很多由于对外推法的不加批判的运用所导致的严重失误的例子。因而由于战后重建期间的自然增长速度之快,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毫无根据的长期预测产生了。

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关人士除了使用这些外推法而外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插值法。这源于确信存在着一种适用于落后国家发展的文明模式。假定正常发展,比较流行的是这样的论据,即认为可以说类似的经济水平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彼此很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因为,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水平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水平。

确实发展中国家——并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倾向于采取经济发展更为先进的国家的文化的经济消费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效果部分取决于社会表现出来的开放程度,一种由大众传播的快速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产生自己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包括真正的价值观和文明成就,但与此同时不采用西方消费模式的操作已经产生的扭曲。

根据经验,那种宣称上述效应首要的就是不断地增长的诉求,构成了已经被人们充分讨论过的收敛理论(theory of convergence)这样的理论的基础。还有严格的经济理论也指明了这一方向。插值法的方法应用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受到结构分析理论及同构理论的极大鼓舞,既被控制论详细阐述也被社会科学所应用。 145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插值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且这自然会对经济理论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层面还

依旧保留着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必然有分歧。持这种意见的那些人都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出现了平行发展的现象,都达到了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就我们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表明这种倾向的事实存在,而在于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接受这些作为必要且不可变的東西。毫无疑问,技术进步本身产生了一系列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以相同的方式来解决。在我们看来,创建一个文明模式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创建一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它。换句话说,我们设想的分歧不在于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而在于计划,即目标。

上述已经讨论的两种预测方法为规划提供了必要的數據,但是它们回答的唯一问题是“如果……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规划制定者必须在可能性的范围内建立目标。他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应该发生什么?”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能够在确定方向上引导选择的价值体系。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总是将科学的预测与为实现基于既定价值体系所展望的目标而进行的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如葛兰西所说:“在现实中人们可以科学地预测的只有斗争,而不是其具体时刻。它们只能是连续的¹⁴⁶运动和无法定量表达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果……实际上我们能够‘预见’的只能达到我们可以做出有意识的努力的程度,从而在实践中导致‘预见’事物的出现。”

正如过去几年所明显地展示的那样,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严重地影响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式,因此预测经常被证明是

错误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观念被推入前面应批判的那种庸俗决定论的规划实践的背景之中。今天以价值为导向的思考——“价值”被视为哲学意义而不是经济学意义的术语——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价值体系差异的规划的基本难题之一是指向经济优化和那些旨在朝向社会生活人道主义的目标之间频繁的分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落后和孤立,强调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发展重工业,而且这导致了一种状态,在那里优化的问题以及人道主义的问题都被推到背景之中了。然而,战后重建期结束后,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真实的经济发展和由政治制定的,实际上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的,发达国家生产水平所达到的那种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出现了异常尖锐的矛盾。

这些目标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最可能做的就是去超越类似发展水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的差距。然而,如果不解决不同种类的问题,那么这一点本身肯定无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其中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根据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个性,并且在其日常生活中实现它,而且不但是在其工作¹⁴⁷中也在其休闲活动中。

很多人使这些人道主义的任务和目标附属于经济效益,并且机械地使后者与生活水准的提升等同。这种观点的普及得到了声称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条件的意识形态态度的支持,而这些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有时

不能有效地出现,人们归咎于经济落后。经济发展速度自然会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施加明显的制约。但是,与此同时,一种相同的经济水平会允许关于社会关系的人道内涵问题的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看来,正确的优化和人道主义目标的整合形成了长期规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我们之前说它有可能发展一种社会主义的文明模式时,我们的意思是给予人们更多,也许并不是通过一个经济效益上的快速增长,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更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必要性,目前这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它至少在类似发展水平上应当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当然不是被看作某种面向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之路,由不可改变的社会规律预先设定,而只能被看作一种历史可能性的实现的选择,但是它只能作为社会各方面力量斗争的结果而出现。

(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平等 与社会分化的倾向

因为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配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差异的适宜的或可允许的程度与性质。¹⁴⁸

收入差异通常部分地被意识形态使用众所周知的按劳分配原则而证明是正当的,并且部分地被实践所证明,目的是为更高的绩效提供激励。然而,在实际中差异的出现既不能正确地被这些观点中一个也不能被另一个证明为正当。这在涉及收入的“阶层”差异时更是特别如此(例如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分工立场),这种差别在欧洲社会主义国

家趋于增长。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并不认为这种差异是正当合理的。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收入差别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官僚制扭曲的危险。这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将会产生直接的民主自治形式并将使之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密切相关。然而,这条路被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相反,在每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单独的专业管理机器不断地增长。为确保其专业性和有效性,一种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必须分配给那些负有更大责任的位高权重者。然而,差别的比例在许多情况下一方面被歪曲为过分强调阶层差异的结果,另一方面则缺乏高收入及其实际表现之间的联系。例如,这些扭曲在1968年企业利润分配时变得非常突出,虽然我们刚刚开始引入新的经济机制,分配的关键造成了三组预定人员之间的一个相当大的差异,只有执行的风险和责任才可能证明它是正当合理的,因此它们的有效性,已经按比例地增长了。(我们不想暗示新机制自身创造了这些差异,只是一方面,它明显地强化了它们,而另一方面,这给它们带来了公开化,顺便说一下这本身就是积极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社会依据阶层水平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它也有其他的形式,这经常被伪装起来,因此最难以控制。首先这与商品和利益有关,这些商品和利益是社会通常认为所需要的,但是却供不应求。它们的分配有时以一种优惠的方式发生并且成为社会的某些阶层特权的一部分,这导致相当大的不公平。例如,在住房分配中某些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群体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取得了一个特权地位。其成员发现它更容易获得住房,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分配大致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五年及十年之间的工资。这是特别值得关

注的,因为在早期——并非没有基础——就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在这一领域根据平等的原则分配已经成为事实。正如某些社会学研究表明的那样,由权威有组织地进行的分配有利于收入较高的职业群体。高标准、低租金的国家住房,无须事先支付,分配给收入较高的群体住房以相当大的比例高于收入较低的群体。后者,为了提高从一开始就比较糟糕的住房条件,通常被迫去建造或购买一套房子。各群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不仅出现在获得分配给他们的住房机会上,也出现在他们无法免费获得的住房条件方面。

根据塞勒尼(Ivan Szelenyi)与康拉德(Georg Konrad)的调查研究(1969年),不同收入群体为补充住房需求而花在住房的资金汇总情况如下:

	福林(匈牙利货币)
上层	51000
中上阶层	47000
中间阶层	69000
中底阶层	82000
底层	73000

150 这两位作者指出:“这种趋势是如此强烈,以致愿意承担物质负担去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的意愿显示了按照置业群体进行分配的类似情形。”

虽然高收入群体住房花费明显少,但是他们的住房条件却要好得多,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住房的设施和位置。

住房分配仅是分配中的阶层的、非工资的差别的最突出的特征,但是还远不是全部差别。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某些群体会享有优势,比如当涉及到购买或使用汽车,获赠到度假胜地的资助,购买建筑用地,等等,当人们审查收入差距时通常并不考虑这些。

通常看起来似乎提供这些特权有利于企业的利益,或者

甚至是处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例如,通过使用住房——分配,有利于招聘到合适的人员),但在现实中,这仅适用于这种情况的一小部分,即使那样,公开地表达这一点,例如,采取货币补贴的形式,或许更好一些。以这种方式民意会在一个更好的位置去评估现有的分化程度。

当阶层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很夸张,好像为了弥补这一点,在相同层次上形成了极端的平等,尽管中央竭尽全力地应对这一问题。根据表现并不存在一个适当的差异,虽然这是一个更有活力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与表现情况相一致的区别对待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企业,因为是被新的经济机制所预先假定的。更盈利的企业会对同样的工作支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这是一个影响工业必要的结构性变化和以更有效的方式利用劳动力的先决条件,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果各种新经济体制被持续应用的话,企业之间的差异分化将会逐步形成。另一方面,根据任何一个个体企业的表现形成的差异将会进一步形成,当且仅当企业内部发生重大的民主化进程时,那就是说,如果工人集体能够获得一个真正有效地控制各级管理的机会。这是杜绝工人的合法性恐惧的唯一方式(这种恐惧成为系统实施按照表现情况区别对待方式的主要障碍),这种恐惧就在于,工人担心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不是基于他们的真实表现,而是基于个人关系和考虑,所以这种类型的区别对待将意味着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151

从上述来看很显然,我们没有办法怀疑对区别对待的需要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是阶层分化的进一步增长,那就是说,分化根据等级。相反,我们提倡的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要产生一个相反效果。这似乎是更合

理的,因为高收入产生这种分化的结果并不总是导致有关社会团体的一个较高的消费水平,有时因为缺乏相应的需求,有时因为有用物品的供应不足。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这些群体不断地卷入到各种投机活动中的现象(扩建,囤房,等等),在可控条件下必须严格地保持必要的社会差异,必须竭力地确保它们不被继承,更年轻一代的机会能尽可能少地受制于其父母在分工体系中的职业地位,以及在物品分配中的更好抑或更糟的地位。

(三)与社会主义的需要及消费模式有关的特定问题

为了表达我们对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观点,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私人的消费,基本的和个性化的消费,其不会把社会主义社会卷进同样的义务中。

我们所说的“基本消费”意指随着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的¹⁵²一种最低消费,并且必须可以确保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这种为每个人提供的最低保障必须是一种社会目标,即使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还没有形成相应的需求。

我们所谈论的差异化消费在生产水平与消费形式允许的情况下——至少对于某些个人、群体或阶层而言——是一种比不同于标准的基本需求的满意方式或者基本水平更进一步的消费。

两种类型的消费都是动态的。它们基本上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特定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既定的价值体系,并且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我们在基本的消费和差异化的消费之间才能做出区分。

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在国民收入和经济生活活力的

现有水平下,可以被认为是基本消费的是确保一种健康生活方式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无论家庭财政状况如何都要使自己和家庭受教育的机会。至于后者,不仅仅是一种最低标准,适用于食品、衣服和住房的,而且必须被认为是基本消费品的组成部分。它必须包括一个免费的和无限的受教育机会(在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这由个人的能力与雄心所调控。拥有一套价值体系当然不足以在特定社会里构建具体的基本消费的标准与结构。必须做大量的经济计算以核定目标和机会。

必须考虑确保每一个人都达到基本的消费水平——除了不断扩大的差异化的消费外——这是社会主义消费模式一个不可缺少的特征。

保障消费的基本水平从年轻人角度来看尤为重要。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额外责任。不仅是年轻人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保障,而且还必须创建越来越多的满足差异化消费的机会均等的那种条件,所以他们的差异化需求,以及满足他们的方式和可能性将不会纯粹地由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决定。只有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塑造社会主义消费模式,才能抵消社会对年轻人的结构化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为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年轻成员明确地指明不同的起始点和不同的生活可能性。 153

基本的消费品不可能仅仅通过可能的赚钱获得保障,因为一个人总是可能将金钱作为一种交易的一般方式,花费在满足并非基本的需求方面。这很难养活那些还不处于决定金钱收入花费方式的地位的人(孩子,没有赚钱的家庭成员,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减少以实物补偿的利益的利益的努力引起关切,这也像那些把自己束缚为养家糊口者,并且实际上将之转化为一种额外的工资的人们所关心的那样。

一个人不可能仅仅使用货币的分配方式保障年轻人有平等的起点,例如,通过提升家庭津贴的方式。必须创建新的福利形式以及扩大现有的福利形式。因此幼儿园和寄宿学校的网络必须全面发展,并且学校的书籍和某些文化机会必须免费提供。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接近普通教育的问题。在享受类似的国民收入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应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为了确保起点平等的机会,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均等小学的教育水平。依然盛行于其中的显著差异进一步减少了那些属于生活于财政和文化处境匮乏家庭中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由于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必须扩展寄宿学校系统,同时,另一方面,在分配现代教育手段(电视,视听技术,等等)时,要特别考虑优先用于智障者学校。

154 就提高离校年龄而论,这是一个我们从长远看完全同意的计划,我们认为目前创办一年或两年的更普遍更可利用的幼儿园可比增加花在小学的大量时间更重要。(这项建议,以这种方式,已经被制定在国家规划局的长远规划工作中。)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学生还年轻时教育机构的均等效果是最高的,正如相当多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童年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化差异在后天是很难克服的。

人们通常认为,普通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社会的不满,因为它能促使人们提出要求,认为无论是其工作类型还是其在既定的社会分工和国民收入的水平上的一般社会地位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几乎是真实的,但是这种不满情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变革——在劳动分工方面,在技术方面,等等——这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一致的。提高教育的一般水平,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

有利的,因为它使个体更加快速地适应技术进步。(这些日子里,我们往往将太多的时间,尤其在训练熟练工人时,花在让人们学习陈旧的知识,或者正在迅速成为陈旧的知识上。)

或许更重要的是一般文化层次的上升促进使社会更加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它允许其成员理解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不只是为个人提供向上流动的动力,如同在过去的二十年经常发生的那样,而是确保那些直接涉及生产和服务的人都可以在社会控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可以部分地弥补来自在眼前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其特性而不被满足的那种雄心。

导致今天的不满的因素,还有就是那些拥有高于平均教育水平的人(即高中毕业生)仍旧有少数处于声誉较低的工作中,但是这种情况将随着一般的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得到缓解。 155

紧接着教育,住房是当今基本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加快住房建设的速度。在这方面要求(远非今天意识到)我们应该建造比拥有同样的人均国民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住房也似乎是完全正当的。只有住宅数量有一个显著增加才可以保证足够的住房,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满意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而无论其家人的地位如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生活在这些标准的条件下,差异化需求存在着,而且也在这个领域中不断增长,社会也必须努力满足它们。)这也关涉到前面提到的要求集中社会资源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新一代的成员以平等的起点。这要求彻底的改变,尤其在住房方面。由此可以推论,鉴于住房满足的只是基本需求,它的租金还不必从目前的低水平提高到一个足以胜任市

场的条件。它们应该达到的最高水平是涵盖维修成本(也包括一定的上升幅度)。市场条件应该仅仅与满足差异化需求的住房有关。当然,这意味着满足这样的需求的国有住房的房租可以,而且应该以这种方式提高。这一原则也必须适用于住房的分配:满足基本需求的住房应该免费分配。另一方面,至于满足差异化需求的那些住宅,额外的建筑成本应该由新租户承担,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对那些私自地或者合作地建造自己房屋的人(假如这真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住房需求),如果他们把所建的住房交由国家安排,那么应该给予补贴直到国家建筑的标准成本的水平。

156 虽然这种制度会减少某些团体与个人的没有理由的获益,它们仍旧必定会继续,直到每个人都被满意地安置为止。

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在接下去的二十年里所做的长期计划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必须创建所有人在其中都能获得住宅至少能够满足我们称之为基本消费品要求的一种环境。这应该是一种国家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应享的权利,他不应受制于高昂的租金。

因此我们不同意那种已经变得相当普遍的观点,即由蒂博尔·蒂什卡(Tibor Tiska)做出的最引人关注的表达的观点:“如果人们获得一份包含上升租金在内的较高收入的话,那既是国家也是个人的好事,因此这种体现市场形势的租金可以予以支付。”

以货币形式补偿更高的租金“与家庭的大小和收入相称”并没有解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几乎维持,甚至增加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住房状况甚至低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而进一步分化。

教育和住房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如同食品和衣物一样的基本需求。尽管如此,我们强调它们,因为在我们看来它

们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国民经济资源必须关注它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食物和服装不再是某些社会群体的一个问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贫困问题已被解决。

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那些穷人的数量,在今天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关注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应优先得到计划的重视的话,那么它的数量可能会增加。这个问题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在吉普赛问题上。他们的亚文化将他们卷入一种并非“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想进入细节,但是人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制定财政所需的相关计划,而且也在于应当重新审视机械地运用同化政策的实际结果。

为了对抗贫困的利益起见,继续补贴基本食品是必要的——至少要直到能够确保每个人在上述讨论的意义上都能满足其基本需求,即使价格取决于市场关系。这个问题将会由学校和幼儿园膳食的扩展,以及公共餐饮在文明情况下的合理价格的蔓延而得到加速解决。 157

我们在上面强调的是满足基本需求,这仅是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一个方面,虽然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最重要的一个。然而,从长远来看,差异化需求的扩张和适当的满足将有一种不断增长的重要性。

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激励人们工作的首要动力就不再是满足基本需求的必要性,并且也不是由于对饥饿和贫穷的恐惧,而是由于希望满足他的快速增长的差异化需求。这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可能把基本需求的满足排除在激励制度之外,那就是,使它们不受劳动供给的支配。

就因为这个,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用适当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差异化需求,以便充分落实其功能以此作为激励。

差异化的消费不仅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允许个性的多方面发展。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差异化的需要及其满意都有这种效果。也有那种我们所说的身份消费,也就是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相连的消费,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并且首先就是提供被操纵的需求的满足感。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按照是否有助于发展个性或者仅仅满足特定地位或声望就分割消费品和服务。它们中的一些在这方面是完全中立的,更为重要的是,同样的消费对象在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中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不希望在本文中详细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158 如今匈牙利的现有消费模式的首要特点仍然在于真正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这一事实。虽然在某些社会群体里人们可能已经注意与地位和声望消费相关联的现象,但是这些消费至今仍不可能被清楚地从差异化需求的满足中辨别出来,因为它首先被指向这样的物品和服务,虽然人们还不可能普遍地得到这些物品和服务,但是对它们的广泛需求已经存在了。

我们强调要求差异化消费主要服务于发展个性,这并不反对以一种集体方式满足特定的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朝向个人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以商品为中心的态度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明显了,包括在匈牙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针对过度集体主义的态度反应,很大程度上源自贫困和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特点。真正的问题出现在需要既可能以集体主义也可以个人方式满足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已经被纯粹的经济动机证明是合理的,但通常它的选择要获得其他重要因素支持,例如,事实上

以这种方式,一个特定的服务,或一种商品,变得有效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成为新生活方式形成的一个因素。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提倡强迫一种集体主义的人口消费类型。我们讨论的是,我们必须创建真正的可以选择的有关生活的方式,此外,以这样一种方式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也应该享有一定的经济优惠。这些天可以注意到一种相反的趋势:在许多情况下几乎不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并且需求通常仅能以个人主义方式获得满足。生育津贴在这方面是最有意义的。它对于那些不能找到任何方式照顾她们的孩子的妈妈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重要的帮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伴随着婴儿托儿所的建造速度的放缓,那么它将迫使母亲终止她们的就业,除了那些收益非常高的人之外。

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工¹⁵⁹会的扩展和企业的度假与放松机会的扩张并没有跟上需求的增长;诸如自动洗衣店,共同活动室或电视室等,在规划新屋建设的时候尚未被提及。

以推进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为背景直接推动了这些具体的有西方生活方式特点的趋势的形成,诸如社会家庭的扩散,一个非政治态度的形成,以及物质的夸张的承诺。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在于,是否可能影响一个社会的现有需要的范围和特点。另一个问题在于,在哪些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没有供应限制的消费品?当然,限制了进一步的供应有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个相当大的不满。

需求的变化当然是具有这样性质的一个持续的过程,即使有意识的、精细的影响力不在其中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也会产生。需求的“社会生产”首先是由诸如技术进步等因素决定的,它产生了新的需求,或者可能使旧事物

以不同的方式获得满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在本质上决定了消费可以上升的一般水平；具体确定社会中不同阶层和团体消费水平的分配比例与分配关系，通过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分配结构。社会整体或者其中某些群体所接受的传统、习惯、规范、价值系统的角色，也远非无足轻重。它们在一个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决定着被认为是社会理想的消费模式，以这种方式它们也影响着需求。

同样是最重要的，需要谨记在心的是，那些真正成为人们日常活动一部分的元素被证明是需求结构中最持久的元素。它们的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活动的性质。

除了关注上述技术和经济因素间接地影响需求的塑造的160 的决定事实而外，国家有两个其他的处理方式，借此可以直接影响需求的形成：意识和价值体系的有意识的形成（在学校、成人教育的帮助下，并且通过大众传播形式），以及对某些商品的广告宣称。虽然这两者都是必要的，但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并不具有平等的价值。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的利润导向，第二方式（即广告）是更被强调的方式，尽管它本质上是一种操控的方法，因为它的旨趣并不是提高人的选择能力，而是——在保持一种选择的表象的情况下——去降低人们的选择能力。另一方面，价值体系的直接影响，虽然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来看是绝不能忽视的，但是具有相对狭窄的范围。我们不能给人们灌输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不相关的价值观，那就是说，不能灌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具有重要性的价值。

因此，为了在需求结构方面产生变化，我们必须首先改变人类活动的领域，而在同一时间确保新兴需求可被满足。因此如果一种社会机制可以真正允许工人有发言权，并且能够对生产和分配的决定行使控制权，那么这对于一般文化水

平的提升,以及在同样的方向上对消费的改变,会比任何无论多么强的宣传形式,都提供更多的具有文化价值的激励。

“有意义”的消费只有伴随着有意义的生活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文明模式因此必须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生产到消费。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一转变的速度还根本不够快,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不得不满意这一问题的部分解决。但即使如此,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勾画一种发展的前景,以确保具体的实际解决方案将在这个已然确定的方向上发生,并且它们将不会产生一个相反的影响。

161 十、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评： 现实性与必要性

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①

——马克思

(一) 欧洲社会主义变化的本质

在不足十年半的时间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到文化。对于它们所有的多样性而言,一个常见的核心可以在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已经表达的新形式中被发现,这些形式已经引起很多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译者注

讨论甚或是误解,而且仍在持续进行着。这个经常与突出的高度矛盾的新社会现象相关联的核心是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也因此被作为理解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于改变的动力和真正的机能我们可以仍然坦言难以理解,除非我们认识到并承认,欧洲社会主义社会在其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即便不是同时地和在同等程度上,但是已经或者正要达到的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对这些形态的内部分析——即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评”——在历史条件下,不仅已经变得可能,而且变得必要。 162

这一绝非完善的社会进程的最终结果将一劳永逸地超越这样的状态,在其中对社会主义的“内部的”认同有义务捍卫在任何时候反对“外部”批评的盛行形式——这些批评经常获得武力支持。这一立场变成彻底的辩护的时代即将到来,其客观的功能,与其说是对承诺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达,不如说是为旨在维持已经被社会发展超越了的形式的特定利益的一个顽固捍卫。

为了能够理解当前形势并且意识到上述这种变化的历史必要性,我们必须简要地回顾社会主义国家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产权关系的存在和出现。我们所讨论的是经历了一个非凡的短暂时期之后的阶段,在那里针对这个体制的任何调查分析的方式都是被强制禁止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恰好克服这一事态。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否定,必然引领了相信一个能比资本主义创造更好和更多的人类条件的社会能够并且必须建立起来,它的条件在各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的截然不同,而且相信,这的确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做到。

最初被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会发生在最发达的国家并且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坚定信仰所强化,这个信念能够在当时的通行条件的科学分析中找到支持。可是,它并没有考虑到一个新的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将在世界的一个相对落后部分并且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
163 信仰证明了,至少暂时地证明了这是虚无缥缈的(并且它主要是出于那些我已经为社会主义的最初概念所做的解释的历史原因),但是不可否认,它通过发达的新社会观的确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因为这些强化了为创建一个新的,更加人性的社会秩序而进行的斗争。

1917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俄罗斯的胜利,使这些概念能够以理论术语形式去面对在实践中还无法达到的现实。

当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达到以后,就会出现——当然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甚至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一种情形,它使得对新社会的真正分析,即自我批评,都是不可能的。在面对“外部”的批评时它仍固执地捍卫旧体制,战争灾难后在欧洲最贫穷和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本质上僵化的,我们可能说这是必然的,被当作无可争辩的信念。

任何想推翻关于新社会的这套幻想的尝试,即使在次要的问题上,无论主观意图如何,在实现胜利的新关系的第一阶段似乎是一个致命威胁;至于说到那种尝试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一反应并非没有根据。产生于苏联幼年时期的历史条件,一定程度上也是欧洲民主国家存在的早期阶段,在那个阶段任何客观条件都被认定是对那种勇于牺牲以反对旧制度的意愿的破坏,或至少似乎要那么做,因此,这些客观情形就不得不被视为“隐藏”的反革命。所以,当新

关系胜利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口号就必然上升为不仅反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对抗革命性变革的人，而且反对那些要求对事实做出更多的研究，对新产生的社会条件做出真正分析的人。

列宁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基本选择：“每个人 164 必须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另一边。试图采取骑墙态度的任何人都将一败涂地。”这种二分法，在列宁的时代是真理，后来成为对个人的选择自由的一种异常限制，因此它对如今通常被称为“个人崇拜错误”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它完全符合历史情况，因为推动历史事件的社会力量在革命后的基本问题的确在于：要么维护政权，要么放弃政权；除此之外，所有其他的有关新制度的优化和人道化问题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这种情况不仅提出了古怪的难题，即直接的任务是加强中央集权制和快速发展的管理还是扩展民主权利，而且它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抉择。以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tadt rebellion）^①为标志，这种两难困境成为苏共十大最危急或许是它的最悲壮的一面，一段时期内就如何前进而言的问题仍旧是开放的：它的部分原因是苏联领导人经历了受无政府主义者误导的士兵叛乱的结果，所以他们被迫限制了民主权利。虽然，在列宁的建议下，强调了这些措施的临时性，但是它们后来还是变成一种被视为将继续适用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规定。

在这方面相对迅速地产生了“理想类型”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这一类型的形式要素就逐渐压倒实质要素而占据主导地位。列宁死亡事件使得这一

^① 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是俄罗斯的一个港口城市，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tadt rebellion）是指1921年一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士兵及其平民支持者所发动的反对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起义。——译者注

过程进一步加快。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在这几十年中变得僵化,成为无可争辩的法律。由于这一切合乎逻辑地出现了计划指令体制,基于工作规范的个人表现体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对处于全权负责位置上的领袖的尊敬——这些现象都被宣称对于社会福利而言至关重要。除南斯拉夫而外,所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
165 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把这个作为一个现成的模式。

当然,很快变得明显的就是,社会主义胜利后产生的体制形式是非常不同于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时期作为关于未来的预测的概念。去纠正已被证明是虚幻的概念的大胆尝试,可以看出这是列宁在1917年后已经做的尝试,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下都黯然失色。然而在初始阶段,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一切在服务于捍卫体制方面具有真正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并且,至少在这一背景下以及在这一特定的时间点上,这一进程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新型关系的捍卫的历史必然形式。

(二) 关于社会主义的幻想的 变化了的作用

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上述过程。当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人们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那些形成于胜利之前关于“新秩序”的概念,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奋斗过程中,这使得他们的概念僵化为纯粹的教条。然而,当面临实践时,这其中的部分思想必然要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如果没有设想为构建一个比现实所允许的更好,更优,更人道化的秩序而斗争,那么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产生。即使有意识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加并且因此也有了更准确的预测的可能性,但由于存在各种可能性,事物在未来很可能

会有所不同。除了这些“事后诸葛亮”之外，有什么人今天能够承担一切责任去质疑那些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开辟社会发展的崭新道路以及巩固胜利的新秩序而开展的斗争中产生的幻想的进步作用吗？特别是支撑着为胜利和新秩序的巩固而必须做出的常常是超乎常人的自我牺牲，那些其果实往往只能由后来者品尝的自我牺牲的幻想。

166

但是历史经常看到的是，随着新秩序的巩固而来的便是比较快地被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所逆转。这些幻想不再与未来相连，不再涉及参与其中者正在寻求达到的秩序，而是涉及已经实现的秩序。因此，它们现在开始履行一个根本不同的功能，一段时间后停止去支持任何积极参与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它们不再为巩固新秩序做出贡献，而往往用自然的辩护来服务于当时的条件下的僵化的制度形式，辩护日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对新秩序的幻想甚至在后者“胜利”后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在他们继续帮助获得胜利的“新秩序”加强巩固的一段时期。但迟早，这一段时期必然会结束。当新秩序巩固了，这种态度日益成为反动的并且越来越阻碍进步，时间与此同时也接近了幻想与现实的对抗时刻，那就是说对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部分析”，成为现实并同时是历史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熟了的新要求，必须予以制定并且采取斗争实现它们。这场斗争反过来将受到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幻想的影响，但是这种幻想现在将再次被导引向未来，不再导向已经实现的东西上。

但是陈旧幻想的进步作用转换为对进步的阻碍——角色的悲剧性变化往往发生在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无法继续进行，直到年轻的大力士（Hercules）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就像黑森森的树林里孤独的旅人的口哨一样，幻想不断增强

力量,并发挥着进步的作用,尽管这种力量还不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然而一个孩子的命运就是长大:有一天他会到达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作为成年人,将只会维持¹⁶⁷以幼稚的行为及婴儿的态度为代价的以前旧观念下的世界,在这个阶段,日常的需求和经验将迫使其旧观念面对现实。

即使在个人生命中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困难,成人的现实比孩子们设想的世界整体上更加乏味和更加荒芜。这个阶段在民族和国家的生活中更加困苦,在那里“失去幻想”与真实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就社会而言主要经过艰苦的社会斗争而获得。新秩序胜利后,社会团体形成其兴趣,或者在于维护真实的社会状态,或者在于克服这些幻想。

当掌权或弃权之间的选择已经让位给那种新系统的优化与人道化的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任务时,一旦社会主义已经巩固了自身,既免受内部也免受外部的反对,这种变化作为一个真正的和必要的任务才能被提到历史的议程上。要做到这一点,关系的巩固必须是到目前为止如此发达以至于重建旧关系的任何努力已成为空想的,回到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道路被切断,而且工厂、银行和地产财产实际上也不可能再返还给其最初的所有者(因此所谓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级的复辟,无论如何设想,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反动的社会举措已经失去了其繁殖地并且代表的无非是小教派的盲目信仰时,决定性的关系才能走向主流形式,无论是从历史上成熟的新困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的优化和人道化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换句话说,批评植根于“新秩序”。

此外,有一个条件必须存在,它对于整合新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即稳定的发生是基于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只要这个条件不满足,任何客观的分析都显现出受到个人的激

发,以及真正的目标的实现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是获得了 168 个人的某种变化。在初期阶段稳固特定个人的地位的目标与既定形式的捍卫融合在一起;而后者似乎直接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利益。作为这种虚假认同的双方面结果,对既定形式真正分析的任何努力遭遇了异常强大的阻力,甚至当它有意识地完全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时。社会科学以特别显著时尚的方式说明了这个反应,也许被——或至少被认为应该被——最好用以发现一个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的解答。

(三) 社会科学的两难困境:分析抑或操控?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已经勾勒出来的上述那些因素导致一个被归因于检验我们时代的问题的那些科学研究的单一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代表当时的政治实践的宣传,是种“合法”的形式。任何人违反本规则就会把自己控告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和捍卫者。即使当全心全意致力于社会的进步时,在这种历史关头任何科学的“客观性”,都似乎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而必须可用全部法律的严谨性予以起诉的敌对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狭义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很快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看似绝望的境地。它的发展暂时停下来,其中许多被僵化成教条,并且被神秘化地发展的、看似绝对的意识形态论点所欺骗。(孤立的而且极大迷惑的标语口号,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的新事实或者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有关的其他科学流派的新发现相比,被证明能更好地适合于捍卫既定形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首先正是在意识形态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关联中,上面所描述的社会转变留下了它们

169 的印记；事实上人们常常得到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被固化为教条，将思想障碍置于创新之路的最前沿。

但在这里我们也必须避免仅仅是从表面上掌握现象并且以与历史无关的术语思考它们。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甚至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保卫社会主义和中央管理的发展方面，都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作用。这个社会角色同时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如此这样才能符合其特定要求，尤其是在两个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变形。这种情形阻碍了意识形态和科学发展之间的交锋（confrontation），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交锋，并且在某些特定时期使任何这样的交锋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没有比试图把这种状况理解为应当归于某一个人的主观错误更加错误的了；也不能站在更高级的科学逻辑分析的角度把这些问题归因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典型特征：这两种解释都没有在历史条件下分析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中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符合科学的洞察力也符合社会的现实，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像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一样，具有客观的基础，只是如我们上面所分析，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将自己与科学发现和日常生活的事实隔绝。现在社会发展利益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素质能够有所突破，而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和特殊利益为转移。

社会主义条件的自我剖析最引人注目的和特征性标志之一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关注于“今天”和关注承认其真正社会功能的“官方的”承认的“社会科学”的表现上。这标志着那种认为在面对现行的幻想时，文学是唯一能够将真正的问题带向社会的“舞台”上的力量这个阶段的结束。在最近数十年来，这方面的十分重要的角色由社会

学所扮演，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获得了日益的发展；这门¹⁷⁰学科在过去已经引起了很多讨论，肯定会在未来再次如此。社会学，与处理当代问题的其他学科一起，在科学的生活中扮演着角色，可以这么说，它呼吁其公民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期间，使这些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看到对其自身条件的分析成为社会现实。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由那些研究现实问题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所激发的讨论才可能被正确地评估。因为社会学的以前的整体发展证实了，这门科学似乎一方面是自我批评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代表社会的最直接的科学仪器获取其自身知识和使社会条件进行实时分析的社会科学的分支。因此它既是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的产物，与此同时也是推动发展进一步前进的工具。同样对所讨论的变化有所贡献的是那些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难道这个新重生的，已经时髦的科学的工作是提供信息和数据（操作）以维护既定的形式，或者通过批判地分析它们（分析的功能）以帮助克服这些形式吗？

在矛盾的社会势力的斗争中，这种二分法看起来往往晦涩难懂，难以相融，进退维谷，好像应对当代问题的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被迫在两者之间选择而不能同时承担两种功能。欧洲社会主义部分国家的自我剖析的程度已经成熟为一个历史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这使得科学没有必要迷恋于这种使人麻痹无力的选择；即使在今天这种观点可以毫不含糊地被归入虚假困境的范围。

（四）新经济改革：社会主义 “自我分析”的成果和考验

从社会主义前途来看，这个发展阶段的意义几乎不可能

被夸大,因为它不仅导致了科学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活力(它持续发挥作用),而且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导致了社会条件的形成。它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历史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它,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贯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可能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欧洲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内部分析”的结果的“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使体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过程而开始运行,也就是说(借用控制论的表达),它正在成为更加的“超稳定”,从而完成一个比现在更具活力和多方面的发展。

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的自我批评是分不开的。例如,匈牙利所采用的饱受批评的进程,或最起码设置了一套疑问,一系列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组织和控制形式。内部的批判性分析的光芒已经澄清了与计划指令体制一样重要的问题(有利于间接的价格调控,信贷等方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行政机构确定的价格(现在逐步被经济定价所取代),以及工业的最大集中(现在正在被努力寻找最佳比例的工厂所取代),等等。按照旧标准,新经济体制似乎是一种对永恒规律(我们所认为的)的极其大胆、固执和无意义的反抗,但在现实中它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内部分析”,带着被认可的正在成熟的社会需要及其产生的后果。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这些现象,即使经济改革模式的制定及其执行是应当权者要求,但是它仍需要更多的个人勇气,真正地致力于社会进步并且无视那些特殊利益。

新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制定(我主要指匈牙利的公式,是我最熟悉的一个)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是基于挑战以前被认为是“需要保护”的形式的科学分析,还因为它综合了对

社会的经济子系统的框架的分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目标和社会标准已经设置了行动和发展的路线。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就社会主义而言的分析或“自我批评”,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只有当它不是停留在局部分析和部分建议的水平上,而是刺激到更深远的、更全面的概念时,它才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样的发展会比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更自然并且同时也是更可行的,基于社会主义的内部分析,就是更进一步涉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广泛的领域的更加全面的社会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呢?

这种变化自然行进在不断更新的社会冲突中,由于克服现有的系列条件的企图导致了旧形式的捍卫者与新形式的倡导者之间的对立。然而,这样的对立,当改革开放中经济改革设想已经实现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少在国家规划中被表达,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被局限于特殊的工厂,当地政府机关或其他机构。这种变化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使得系统所做的自我分析变成社会中央指令的机构和组织的活动中日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殊利益将阻碍这一进程不易形成两极化,对现有的体制的维护将逐渐让位于努力帮助社会主义发展占主导的基本方面。

(五) 一些误解:被附加在“自由化” 上的希望与恐惧

173

发展的前景表明,我所一直在写的涉及的是一些新东西的开端而不是某些已完成的阶段;因此很多人既对革命论者不解也对反动阵营不解——尤其是在西方——在面向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事件时。带着惊喜和激烈冲突的感受,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分析,这些分析并没有受到教条的或意识形态的观念和偏见的污染,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出现的已经保持几十年僵化的机构的分析,以及一般情况下对现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分析,这种分析伴随着适应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代条件的热忱努力。这些误解所形成的混乱的灌木丛可以通过外国的声音对于在1956年后匈牙利国内政治的基本的积极的发展的回应方式看到。如果本文范围允许,在这个时刻对这些外国的反应给予适当选择是很有用的。

许多人已经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解释了新时期的外在表现,并且已经试图制造一个工具以促进他们自己从社会主义的“自我分析”与“自我批评”得出的目的,以及他们基于上面所提到的历史的条件所强制做出的陈旧的推论,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动机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自由化”是关于这种误解的特有的术语。公开反对社会进步的人认为,恰恰是社会主义所宣称的成熟和活力是其弱点的一个证明。而其他人与此同时则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恐吓那些从事对社会主义事业所承诺的条件做真正内部分析的人,或者那些使其日常活动遵行这一目标的人。那些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自由化的人,以及那些歇斯底里地担心的人,似乎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悲剧的共同平台。它有时呈现的是在这两种力量的相遇地方,一个无助的创新精神在恶习之中被发现,它往往好像是强大的力量冲突中的一个不由自主的玩偶。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地、满怀希望地,而不是夸张地、乐观主义地认为,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更加成熟的条件,并且在几年前仅是以雏形表现的地方现在赢得了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幼苗。

然而如果我们不想成为我们自己幻想的受害者,或者成为已经被驱散的,但却经常持有的悲观情绪的受害者,那么

我们必须意识到,就新制度而言的“自我批评”既不是某种“知识分子的背叛”,也不是由外部的反动阶层所引起的“干扰”,而是一个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性。今天的欧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这种进步,现在是历史的机遇,它应该成为有效的并且得以实施。进步的知识分子可以有助于“大众”的愿望和利益的表达,但他们不能成为他们中独立的人。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注定要失败。

当然,如果我们相信外国和反动界、社会进步的公开的敌人将袖手旁观和消极地观看欧洲社会主义“内部批评”的出现,那么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但在我看来,中部欧洲主要的困难将不再来自于无情的反动派活动,而是来自于对这些问题的误解(也就是以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盛行于那些主观上致力于社会进步事业的人中,误解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利益支持的。本文强调,正是在今天那种基于欧洲社会主义的内部分析对于更快地发展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既是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优化),也是对人的需要的社会条件更紧密的调整(人道化)。

我尝试证明,就欧洲社会主义而言的“自我批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动力产生的过程,并且至少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历史必然性使然。但是如果认为这整个问题局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它可能不会错误地说这个问题将成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人类进步的关键问题,因为这当然有必要去澄清最近刚刚过去的问题,以便阐释未来的发展过程。 175

欧洲社会主义“内部分析”借以开展的过程的缓慢和“难产”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这主要要由两方面的条件加以解释:一个事实是,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首先出现在苏联

的历史舞台,并且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另一个事实是,新的条件的满足,不仅在苏联的条件下而且在其他地方,也都是在其生产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的国家中发生的。由此而来的是,在未来必然出现的,并且将消除建立在这些具有发达生产力的私有制基础上的旧制度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不必遵循这样一个暴力的过程,因为上述这两个历史因素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作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出现。因此,欧洲社会主义的内部分析也将使“西方的”社会进步力量能够发现用以克服资本主义的有利形式。对这类创造性工作和相应的政治活动发展的许多倡议正在出现,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那里。

欧洲社会主义的内部分析有助于社会主义既在理论方面也在实践方面发挥一个彻底的革命影响,不仅在当时,通常是偶然的形式,而且也因为这样的分析使社会主义已经有可能揭示自己的本质方面。

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本表中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

- Alienation 异化 29, 31, 33 - 35, 36, 37, 44, 50 - 51, 72, 73, 132 - 134
 Aquinas, St Thomas 圣托马斯·阿奎那 69
 Austria 奥地利 116

B

-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娜·德·波伏娃 87
 Bebel, August 奥古斯特·倍倍尔 40
 Belgium 比利时 81
 Bernstein, Eduard 爱德华·伯恩施坦 16
 Blashkovich, Janos 雅诺什·布拉什科维奇 134
 Britain 英国, 不列颠 107, 113

C

- Chernyshevsky, N. G. 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 35
 Children 儿童 9 - 10, 13 - 16, 20 - 21, 23 - 25, 33, 86, 87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1, 33 - 34, 38, 53, 58, 64
 Cohn-Bendit, Daniel 丹尼尔·科恩-本迪特 52
 Communes 公社, 社区 19 - 26, 74

Community 社区, 共同体 49 - 51, 54, 56, 74 - 75, 91 - 105

Co-operatives 合作, 合作社 101, 111, 134 - 136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81, 171

D

Danecki, J. J. 达内茨基 107

Democracy, socialist 社会主义民主 18, 26, 55 - 56

Denmark 丹麦 10

Divorce 离婚 10, 21

E

Education 教育 114, 118 - 123, 153 - 156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8, 40, 64

F

Family 家庭 7 - 26, 54, 76, 85 - 86, 88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2, 42

Feodoseyev (Academician) 费奥多谢耶夫(院士) 126

Fourier, Charles 夏尔·傅立叶 20, 41

France 法国, 法兰西 81, 175

Free time 自由时间 54, 101, 106 - 123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2, 33

Funszabo, Ferenc 费伦茨·丰萨波 101

G

Germany, West 西德, 联邦德国 53, 81, 93

Goethe 歌德 48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葛兰西 18, 145

Guevara, Che 切·格瓦拉 52 - 53

H

“Histmat” “历唯”(历史唯物主义) 124 - 129, 132, 137, 138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69

Housework 家务劳动 76 - 77, 80 - 83, 107, 108

Housing 房屋, 住宅 144, 149 - 150, 155 - 156

Hungary 匈牙利 79, 81, 83 - 85, 87, 93, 95 - 96, 99, 101, 108, 109, 116, 140, 143 - 144, 152, 158, 171 - 172

I

Income differentials 收入差距 26, 148 - 151

Individuality 个性, 个人 19, 23, 25, 38 - 41, 43 - 51, 52, 91 - 105

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 知识界 59, 136

Italy 意大利 63, 116, 175

J

Jacobinism 雅各宾主义 64, 72

K

Kierkegaard, Sören 索伦·克尔恺郭尔 53

Kolakowski, Leszek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94

Kollontai, Alexandra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17

Kosik, Karel 卡莱尔·科西克 42

Kronstadt rebellion 喀琅施塔得叛乱 164

L

Lefebvre, Henri 亨利·列菲伏尔 42

Lenin, V. I. 列宁 52, 163 - 165

Liberalisation 自由化 173 - 175

Lukács, Geörgy 格奥尔格·卢卡奇 42, 73, 91n., 125

M

Makarenko 马卡连柯 17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42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34

Marriage 婚姻 10, 21, 35, 39 - 40, 83, 88

¹⁷⁷ Marx, Karl 马克思 7 - 8, 15, 28 - 29, 40 - 41, 43, 45, 51, 55, 60, 64 - 67, 72 - 74, 90 - 91, 106, 109, 124 - 125, 127, 132, 162

Mayo, Elton 埃尔顿·梅奥 98

Mills, C. Wright C. 怀特·米尔斯 9, 53

Myrdal, Gunnar 贡纳尔·米达尔 81

N

Needs 需要 58 - 75, 157

O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17 - 18, 124, 162

P

Peasantry 农民 134 - 136

Planning 计划 140 - 160

Plato 柏拉图 69

Poland 波兰 80, 81, 129, 130

R

Racine 拉辛 35

Reformism 改革主义, 改良主义 16, 62 - 63, 70 - 71

Reforms, economic 经济改革 171 - 172

Reich, Wilhelm 威廉·赖希 12

S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52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93

Schiller 席勒 50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16 - 17

Selden, Bjorn 比约恩·塞尔登 93

Self-criticism 自我批评, 自我批判 138, 161 - 176

Self-management 自我管理, 自治 8, 93

Sexual relationships 性关系 11, 27 - 41, 53 - 54, 87 - 88

Shaw, George Bernard 乔治·伯纳德·萧 35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 124 - 138, 141, 145, 168 - 170

Soviet Union 苏联 81, 95, 126, 129, 130, 163 - 165, 169, 175

Sparta 斯巴达 18

Stalin, J. V. 斯大林 43, 124

Sweden 瑞典 10, 116

Szelenyi, Ivan 伊万·塞勒尼 149

T

Taylorism 泰勒主义, 泰勒制 98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55,66

Tiska, Tibor 蒂博尔·蒂什卡 156

Training 训练,培养 115-118,119-123,154

U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 80,81,83-85,87

V

Veresh, L. L. 韦列谢京 132

Vietnam 越南 55

W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111-112

Women 妇女 10,30-31,33,34,76-90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23,42,73-74,97-103,106-123,134-136,149-151

Y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130,164

Z

Zweig, F. F. 茨威格 107,113

英文版编辑说明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最初发表在下列匈牙利杂志：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共产主义和家庭), *Kortars* no. 10, 1970

The Futur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 (两性关系的未来), *Kortars* no. 2, 1970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Everyday Life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日常生活的革命), *Kritika* no. 4, 1970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uman Needs (从人的需要的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 *Uj Iras* no. 1, 1972

Women and Work: Emancipation at a Dead End (妇女和工作：走入死胡同的解放), *Kortars* no. 2, 1970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ity (共同体与个性), *Kortars* no. 12, 1970

Free Tim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自由时间与劳动分工), *Kozgazdasagi Szemle* no. 10, 1971

The Main Tendencies of Marxist Sociology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走势),
Kortars no. 12, 1968

The Choice of Values in the Long-Range Planning of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价值在分配与消费的长期规划中的作用), *Kozgazdasagi Szemle no. 9, 1969*

The Self-Criticism of Socialist Society: a Reality and a Necessity(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评:现实性与必要性),
Kortars no. 7, 1967